汉学发达史

莫东寅 著

上海书店出版





漢學發達史

莫東寅著



上海書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敍言

歐西之漢學（Sinology）研究，由來久矣。彼土文獻上早有東方之知識，關於中國者，西元前後，有二系統：一曰賽里加（Serice）、賽里斯（Seres）之系統，由於阿爾泰語絹字之轉音，傳自陸路，賽里加指中國地而言，賽里斯指中國人而言。一曰秦（Sin）、秦尼（Sinai）之系統，由於秦政統一中國後之名稱，傳自海路，秦指中國地而言，秦尼指中國人而言。六七世紀，又有二稱：一曰陶格司（Taugas），始於北魏拓跋本姓，傳自陸路；一曰秦尼斯坦（Chinistan），仍始於秦字，傳自海路。

自七世紀初至八世紀，阿拉伯人隨回教之興盛，東西伸張其勢力，因國土廣袤，郵驛完備，聖地麥加之巡禮，陸海通商之旺盛，更促進其地理學之進步，於是中國知識，乃輸入焉。直至十二世紀，東方知識，久爲阿拉伯人所專有。

十三世紀，蒙古勃興，亞歐交通復開，東方事情，乃再傳於歐西。復因歐洲盛傳極東有景教君主，遂引起歐人東方旅行之興趣，西人之東方知識，於焉一新。

蒙古勃興之後，至十四世紀中葉，東西交通猶盛，東方知識，仍傳播於歐西 及蒙古內閧，漸近衰微；明初排擊西教，加以中亞西亞回教復興，東西因有阻隔，然間接傳聞，未嘗絕也。

從來歐人關於東方知識，多得於旅行之見聞，或事業之報告，至十六世紀，東印度航路發現，耶穌會士東來，於東方文物，始進於研究之域。十八世紀，儀禮問題發生，遂提高歐洲本土之極東探索，各教士皆爲擁護本派，詳細研究中國禮俗，其報告論戰，甚刺激歐洲宗教界，東方研究，因而愈盛。

東來教士及歐洲本土學者相偕並進，至十九世紀，漢學於焉確立。科學思想日益發達，殖民政策日益拓展，迺有大學之講座，專門之學會，典籍之巨量庋藏，定期不定期之刊物，名家輩出，討論益臻精詳焉。

寅不揣譾陋，述其發展過程及其近況，考其原始，探其背景，輯成一書。倘希並世學人，有以正之，是所幸矣。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癸未春日莫東寅謹識。

目錄



漢學發達史

一　一世紀至六世紀

——秦漢六朝時代歐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東西交通與文化之交流，蓋遠自有史以前。據瑞典地質學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等之研究，新石器時代後期，華北各地與南俄脫里波留（Tripolije）地方、多惱（Donau）河下流方面之間，已有文化之交流（註一）。

然文獻上最初記載東方知識之歐洲民族爲希臘人（註二）。據希羅多德（Herodotos A. C.484頃—425頃）所著史記（Historica），紀元前七世紀時，自今黑海東北隅頓河（Don.R.）河口附近，經窩瓦（Volga）河流域，北越烏拉爾（Ural）山脈，自額爾齊斯河（Irtish R.），而入阿爾泰天山兩山脈間之商路，已爲希臘人所知；其後紀元前三世紀至二世紀之地理學者，多以裏海（Caspian）爲海灣，而希氏已知其周圍爲陸地。希氏嘗赴波斯，波斯極東之州印度，爲彼所知世界之東端。彼於印度，雖僅知印度河（Indus R.），但知印度人數，多於其他民族，以爲印度河流域之東，沙漠地帶爲人住世界之邊境。至於區分世界爲亞細亞（Asia）歐羅巴（Europe）一事，希氏雖謂以地中海黑海爲界，然不詳其所由來，足徵二洲區分起源之早。並記當時詩人阿利斯梯阿斯（Aristeas）之有關於天山南路住民伊勢頓

(Issedon)與北蒙地方作民阿利斯棉斯比亞(Arismaspeid)之知識焉。

希羅多德(Herodotos)之後，記述東方之希臘人，有克泰夏斯(Ktesias)，據云為歐洲人士最先記述中國者，克氏之作，約在紀元前四百年(周安王時)，謂賽里斯(Seres)人及北印度人身體高大，達十三肘尺(Cubits，每肘尺，由肘至中指之末端)，壽命達二百歲。印度海中有島，島人皆有長尾，所言荒唐無稽，恐為後人僞託，未足信也。

亞力山大(Alexander)大王之遠征(A.C.334-A.C.326)使希臘人地理上之限界，顯著擴大。大王深知學問之價值，在其軍旅中，嘗參加有記錄征服者之進路及功績之歷史家與蒐集地理學自然科學新資料之學者，然此等歷史家之遠征史，既不足信；學者之記錄，亦不足媲美於希羅多德(Herodotos)云。賽流柯斯一世(Seleukos I)為調查既經希羅多德解決之裏海地方地理，所派之巴特路克爾斯(Patroclus)，僅踏查其南岸，謂其北部接連大洋，此等見解，直至羅馬時代，猶支配希臘學界。斯時，賽流柯斯一世(Seleukos I)遣梅格斯太內斯(Megasthenes)於支配印度恆河(Canges)流域之旃陀羅笈多(Tshandragupta Sandrakottos)，為駐華氏城(Pataliputra)大使，梅駐其地五年，考問風俗政治組織及文明事業，皆有詳細記載(ta Indika)，為現存希臘文獻中關於印度報告之最詳確者。亞力山大遠征所得之地理資料，旋於埃及之亞力山大利亞成一體系，其中最值注目者，為德克阿爾克斯(Dichaearchus)之說，謂亙亞細亞大陸全體，有東西連亙之大山脈，隔絕

南北。

羅馬時代，於東西交通史上，有重要意義。隨羅馬之勃興，希臘文化光被之諸地方，統一於羅馬政權下，希臘羅馬文化擴大於西歐結果，造成東方（Orient）一概念，蓋與希臘羅馬世界卽歐羅巴世界對立之特殊世界也。此意義之東方，始見於羅馬之著述家，同時亞細亞一名，爲表示位於阿非利加歐羅巴以東之世界。然對於裏海，猶未嘗確立正確之概念云。

略記中國位置住民物產之文獻，蓋始於西元前後。當時關於中國名稱，有二系統：一曰：賽里斯（Seres）賽里加(Serice)之系統，惟一傳自陸路者，時代較早；賽里斯（Seres）指中國人，賽里加（Serice）指中國之地。一曰秦（Sin, Thin）秦尼（Sinai, Thinai）之系統，主要傳自海路，時代較晚；秦（Sin, Thin）指中國之地，秦尼（Sinai, Thinai）則稱其住民。Seres Serice 二字乃出於希臘羅馬稱中國絹繒之 Serikon Sericum 。此字又係由阿爾泰語轉訛。中國名產之絹，早爲歐西社會所喜，古來經索格德那（Sogodiana）安息（Parthia）之商人輸往西方，商人之獲巨利與希臘羅馬士女之珍愛絹繒，歷史上著名事也。遂因絹而呼其產地，名其產出者焉。Sin Sinai 系統之字，胚胎於秦政統一六國後之帝國名，後百餘年隨漢武帝劉徹之遠征，乃傳諸邊遠之地，其名稱起源，僅能溯至紀元前二二一年，而絹貿易之存在，則可溯至遠古，茲所推測，並非過當也。（註三）

斯脫拉波（Strabon A.C. 63—A.D. 25）之地理書（Geographica）爲確記賽里斯

(Seres)一名最早文獻之一。是書成於紀元後一世紀初期，斯脫拉波者，希臘之地理家也。嘗周遊四方，有遊記之作，亦有同於克泰夏斯之記載。據云，借自俄內錫克力突斯(Onesi-kritus)，而俄則爲馬期頓亞歷山大大王部將，卒於西元前三二八年(周顯王四十一年)。上述記載，縱爲僞托，而其時期亦必甚早，當在秦政統一中國以前也。斯脫拉波之書亦以裏海爲海灣，又記拔克脫利亞(Bactria，中國人稱之爲大夏)諸王事情曰：“諸王拓其疆宇至賽里斯及佛利尼(Phryni)國而止”。此一節爲眞確史事，蓋希臘王朝在拔克脫利亞者，漢朝文景之時，已爲大月氏所滅，月氏人勢力一時頗振，其疆宇東至葱嶺，與漢之西域都護所轄境域相接，斯脫拉波乃沿用拔克脫利亞之舊名，以稱月氏人也。唯賽里斯(Seres)賽里加(Serice)之名稱，未必以斯脫拉波爲初見，徵以紀元前一世紀羅馬詩人馬羅(P. Vergilius Maro A.C.70—A.C.19)等人作品中之屢屢引用可知。

羅馬一代，以博學洽識著聞之白里內(C. Plinius Socundus A.D.23—A.D.79)其所著之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關於中國之住民及其特產絹織品等，有所記載；且錄賽里斯(Seres)賽里加(Serice)之名。有“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後，乃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賽里斯人和厚可親”云云。

紀元五十年前後之著(？)梅拉(Pomponius Mela)之地理書(De Situ Orbis)謂“亞細亞極東有印度人、賽里斯人(Seres)、西梯亞人(Scythians)。印度人處極南，西

梯亞人處極北，而賽里斯人則居中部。賽里斯人誠實，世界無比，又善於經商。唯交易時，不以面相視，而遺貨於沙磧中，以背相對也。」

西元前後，又別以秦（Sin，Thin）秦尼（Sinai，Thinai）之名，稱中國及中國人焉。愛脫利亞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從來謂爲二世紀前半希臘史家阿里諾（Arrianos）所著，實際乃出於無名作者之手，年代甚古，大體可視爲紀元一世紀末（註四）。愛脫利亞海，爲紅海之義，其範圍較今紅海闊大甚多，所指自波斯灣，亙印度洋，迄錫蘭島附近。謂秦尼國（Thinae）爲愛脫利亞海即印度洋航路之終點。其地產生絲、絲線及絲所織成之綢緞。

一五〇年時（漢桓帝劉志時）有拖雷美（Klaudios Ptolemaios）者，通天文曆算地理諸術，其地理書（地圖製作法指南（Geographice Hyphegesis）即於是時著成，向推爲古代之鴻著。書中記述裏海四周有陸地環繞，賽里斯國西界西梯亞國（Scythia），在伊毛斯嶺外，北東兩方皆界無名地帶，（Terra Incognita），南界印度恒河（Ganges）東岸地。秦尼國北界賽里斯東部。東及南皆界無名地，其西界印度恒河邊地，大海曲，泰利俄特斯海灣（Thetiodes）及秦尼灣。秦尼灣畔，有黑人，專食魚。更記黃金島克力勢（Chryse）及加其嘎拉（Kattigara），或謂爲今馬來半島及河內，未足信也（註五）。秦尼（Sinai．Thinai）之部分錄自地理學者馬利奴斯（Marinos）之著書，馬利奴斯又基於馬其頓商人梅斯亦名梯家

奴斯（Mais, Titianos）之所傳，梯家奴斯屬下商人常赴印度一帶，其所見聞，頗足徵信，所傳似得自中國南海岸方面之知識。據拖雷美（Ptolemaios）所述，秦尼（Sinai）人北隣賽里加（Serice），故秦尼（Sinai, Thinai）之國似即指今之華南。

馬爾基阿奴斯（Markianos）爲希臘地理學家，紀元四〇〇年（東晉隆安四年）時，編東西兩洋志二卷，相傳參考多數古籍，但關於中國方面，不過爲拖雷美之脫胎換骨耳。彼亦以賽里加（Serice）與秦尼（Sinai）爲不同之地，以爲前者在北，後者在南，南北異稱，同諸拖雷美云。

但此等名稱，旋絕跡於希臘羅馬學者之間，而印度一名，多誤用以指尼羅河以東之地。蓋以紀元五世紀時，歐洲地理學日見衰微所致。揆其原因：三世紀之初，波斯薩贊王朝（Sassan Dynasty）興，東羅馬帝國勢力不易東伸，因之頗難裨益其新知識，一也；四世紀基督教成爲羅馬帝國之國教，學界興味，集中神學，殆無暇顧及其他學問，二也；又因北狄馬其頓，東夷芬之侵寇邊境，集議對策，日無暇晷，致無從事學術研究之餘裕，三也。但於此有二三例外，自海陸兩路傳入兩種新知見焉。海路之代表爲科斯麻士（Cosmas）；陸路之代表爲梅南賓（Menandros）及席摩喀塔（Theophylaktes Simokatta）。唯斯時也，前代之中國知識，亡佚殆盡，此際傳入之知識與前代之賽里斯（Seres）賽里加（Serice）乃至秦（Sin）秦尼（Sinri），毫無關係。然此時中國知識自海陸兩方面西傳之理由，果安

在哉？前者乃因薩贊朝波斯英主獎勵東方航海，中印海上貿易頓盛；後者則因西突厥興於中亞，土耳其民族與東羅馬帝國間起直接交通故也。

科斯麻士（Cosmas Indicopleustes），本名曰安谷（Antiochia）之君士坦丁諾斯（Konstantinos），希臘人，初似爲商人，航於紅海、波斯灣、依梯俄皮亞海灣（Ethiopic Gulf）、印度洋，且似乎達於錫蘭島。嘗將獨自之地理學說施於所得見聞之上，著基督教世界地理（Christianike Topographia periektike pantostou Kosmou 基於基督教教說之世界地理之意）一書（註六）。乃其成基督教僧侶後自五三○年（梁中大通二年）至五五○年（梁太寶元年）間撰述於亞力山大利亞者也。渠稱中國爲秦尼策國（Tzinitza），又爲秦尼斯達國（Tzinista）。書中並未詳述中國，錫蘭及兩國中間之地理，然特述及二國相去甚遠，其間有丁香國，因盛產丁香故得名。由中國及中間地，運至錫蘭之商品中，有絲、伽羅木、丁香、檀香等。其記述中國全據真正事實，已脫離古代半神話之作風，記載雖不詳，較之昔人，已屬大進步矣。波斯人與他國人之通商貿易，古來專依陸路，對海上發展之冷淡，亦其國民性之一特徵。但薩贊朝第一傑主哥士婁一世（Khusrau［Khosroes］I）之立也，東與突厥合力，破嚈噠；南於海上大展國力，領南部阿拉伯，遠及錫蘭，此波斯史上空前絕後之偉績，其結果由科斯麻士（Cosmas）之書可窺見焉。

波斯王哥士婁一世（Khusrau I）滅嚈噠後，索格德那（Sogdiana）沃地，全歸突厥

。旋突厥與波斯失和，五六八年（陳光大二年），沙鉢略與東羅馬連和，夾攻波斯，擴張領土。此時歸突厥領之索格德那（Sogdiana）商賈，從來販賣中國絹於波斯，及至新領土與波斯相爭，乃另覓販路於東羅馬帝國。經突厥許可，遣使於比散丁（Byzanz），東羅馬皇帝哲斯丁二世（Justinianus II）允其通商，並東派使節，蔡馬庫斯（Zemarchos 598頃）等至突厥領內，謁可汗，甚蒙優遇，又參加可汗征討波斯之役，伴突厥之答禮使及四周諸小國之使節歸比散丁（Byzanz）。此蔡馬庫斯（Zamarchos）之奉使紀行載於梅南竇（Menandros Protoktor）之史記（註七）中，因此，東羅馬使節直接見聞之突厥風俗習慣，乃詳傳於西人之間。

自此東羅馬與西突厥驟加親密，祈合力以禦波斯，曾數次交換使節，并加之以聯盟。其後東派使節之見聞，雖不幸後世無傳，但此時與突厥之交涉頻繁，比散丁（Byzanz）人士有往來其地者，關於中國之知見，雖極空漠，而經突厥傳入歐西一事，則頗堪注目。載紀之者爲席摩喀塔（Theophylaktos Simokatta）之莫利斯（Maurice）皇帝大事記。席摩喀塔五八〇年（陳太建十二年）生，爲埃及出身之史家，初承家學，習法律，後乃竺志史學，六三〇年（唐貞觀四年）前後歿。莫利斯（Maurice）以五八二年（隋開皇三年）即位，故於六〇二年（隋仁壽二年）。恰與席摩喀塔同時，故其所記，多係親自見聞，否則亦基於正確之官府文書，後世論比散丁（Byzanz）文學者，皆推此書爲最良典據，有由然也。其書

中指華北曰陶格司（Taugas），其都市曰庫伯丹（Khub（m）dan）。其國有大河二分之，嘗相抗爭，今已歸於統一云。是正爲中國以長江爲界分南北朝事，今歸於統一者，則指隋唐。故所謂陶格司（Taugas）者，傳北魏拓跋本姓者也。（註八）

是後東羅馬帝國關於中國之知識，并無顯著進步。此則因東羅馬與突厥長年戰爭，兩皆疲弊；而東西洋爲阿拉伯勢力所遮斷，極東事情西傳之機緣於以失却故也。

（註一）石器時代中西交通之議論，始於安特生（Andersson）之發現彩色土器，參看 1, J. G.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V, 1, 1923）. 2,——,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London, 1934, 3, V. G. 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ondon, 1925.

（註二）Classical writers 之傳記，參看 Pauly-Wissowa 之 Realenzyclopädie d. Altertumswissenschaften. Biographie universelle. O. Seyffert, Lexicon der klassischen Alterthumskunde. Laipzig 1882。此書增訂英譯之 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 Myth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Art, 3rd ed., London 1894, 及 Lippincott 之人名辭典。

希臘羅馬書籍關於中國之記載，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New Edition by H. Cordier. Vol 1: 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

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 London 1915. 蒐集甚多。欲更求完璧，可參看 G. Coedès,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ême-Orient. Paris. 1910. 爲原文法譯對照。

（註三）關於中國名稱起原之諸說，Yule-Cordier 曾介紹於其所著之 Cathay, I. P. P. 2—7。

（註四）研究此書，可據 W. H. Schoff,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New York 1912. 英譯附詳註。

（註五）參看：M. L. W. Laistner, The Deca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the Decline of Exploration, A. D. 300—500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 edited by A. P. Newton, London 1930) P. P. 21—22.

（註六）此書，以 J. W. McClindle,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an Egyptian Monk. (Hakluyt Society Publication, 98) London 1897. 爲最便。Yule-Cordior; Cathay 拔萃其必要部分，乃譯自希臘原文。極東部分之法譯與原文，皆見於 Coedès 之書，德譯則載於 K. Dieterich, Byzantinische Quellen zur Länder-und Völkerkunde. (5.—15. Jhd.)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Erd-und Kulturkunde, Bd. V.) Leipzig, 1912。

（註七）梅南竇（Menandros）書之殘篇，不見於 Coedès 之書，但 Yule-Cordier 之 Cathay I 有英譯及註，K. Dieterich 之書亦有德譯註釋及 Theophylaktos 關於中國之條。

（註八）據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史學雜誌廿二之一。

二　七世紀至十二世紀

——唐宋時代阿拉伯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自七世紀至八世紀，阿拉伯（Arabia）人之勢力，隨回教之興隆，東西伸張，跨西亞北非南歐之大薩拉森（Saracen）帝國，於焉出現。但勃興之初，尚遠距開明之域。及國家結成告一段落時，以敘利亞人為介，以釋成敘利亞語者為基礎，開始翻譯希臘圖書；又得波斯人之助，注意於印度著述之迻釋，是蓋始自八世紀中葉哈利發穆沙（khalifa Mansur 754－775）之治世，先進諸國之思想技術流入混融於阿拉伯學術之造端也。阿拉伯地理學受希臘之影響感化亦甚多，如謂人類生息地域，自南向北區劃為七地帶；又謂世界以東西連亙之一大山脈分為南北兩部，皆與拖雷美（Ptolemaios）無稍異者，是其例也。甚至保持歐洲既已廢絕之理論，亦其缺點。然阿拉伯地理學，決非完全抄自希臘地理學，知識之豐富正確，實其特色，而非希臘人所可望其向背者。其成於阿拉伯學者（註一）手之薩拉森帝國內地方志

都會志等，既無不翔實精審；而國外事情之記載，亦愈加詳密（註二）。蓋其國土廣袤，驛遞制度完備，聖地麥加（Mecca）之巡禮，陸海兩路通商貿易之旺盛，實有以促成之。巡禮與信仰之告白、禮拜、斷食、喜捨爲伊斯蘭（Islam）五基，回教徒除身體衰弱及經濟困難者外，一生有一至麥加之義務焉。當時波斯、阿拉伯方面與印度、印度支那、東印度羣島以及中國方面之海上交通甚盛，從來東西交易，均以錫蘭島附近之地爲媒介，今則發生直接關係，波斯阿拉伯商人自中國南海岸諸港，往來居住於長江沿岸商埠者甚多，中國船舶亦多出現於波斯灣內諸港，故東方知識，盛行流入；陸上關係，亦匪淺鮮。波斯阿拉伯商人自陸路商販於長安洛陽涼州迤東方面者接踵。怛邏斯（Taraz）河畔之戰（751）也，敗高仙芝兵，俘多數中國軍士；安祿山史思明之亂也，從軍中華，參與戰事，於是關於中國之知見，自陸路方面亦輸入焉（註三）稱中國爲Sin，或稱Tamghaj Toughaj．語原同於比散丁史家所傳之Taughas，更進而知交通西藏之路，傳入額爾齊斯河（Irtish R.）上流地方之知識，自海路傳聞新羅倭國之名，足證阿拉伯人地理知識之廣汎正確，遠過於希臘羅馬之著述。（註四）此阿拉伯人之中國知識，後世歐西甚注意之，爲後代西人知見之寶庫焉。

名地理學者中，嘗記述中國事蹟者，尤首推依賓庫達特拔（Ibn Khordādbeh），氏又名阿伯爾喀錫姆烏貝德阿拉（Abu'l-kasim ubaid-Allah），約生於八二〇年（唐元和十五年），至八二〇年（唐太和四年）間，卒於九一二年（後梁乾化二年），哈利發麥塔密

德（Khalif Mutammid）在位之世（866—885），嘗入仕，爲笈巴爾省（Jibal）之郵務長官，著有省道記（Kitāb-al-Masālik Wal Mamālik, 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一書，（註五）書中記各站之名，及各站相距里數，有時亦加詳註。是書之記中國南海岸揚子江岸貿易港也，自南數之曰龍編（el-Wakin, Loukin），廣府（Khanfou），泉府（Djanfou），江都（Kantu），且間叙及風物物產，此數港者，今之河內、廣東、泉州、揚州也，與當時中國記錄一致。（註六）氏又謂過中國爲何，無人得知，與江都相對者，有高山聳起，諸山皆在錫拉國（Sila），蓋謂新羅（朝鮮音 Silla）（註七），暗示朝鮮半島之存在焉。更記中國之東有瓦克瓦克（Wâk Wâk）國，富黃金，有奇木，或指日本（註八），是則記載日本最早之西籍也。書中所引[illegible]爾拉姆（Sellām）之長城紀行，盛氏旅行萬里長城之所記也。

其次當推麻素提（Abu-l-Hassan Ali-el-Mas'udi），氏，阿拉伯著名之史地家也，自幼年，即周遊列國，所至甚遠 九一五年（後梁貞明元年），至印度錫蘭占婆及中國沿海諸地，後又至柴巴基國（Zabaj）及中央亞細亞土耳其斯坦各地，卒於九五六年（周顯德三年）。著有黃金牧地（Murūj al-Dhahab, Les Prairies d'Or=Meadows of Gold）一書（註九），述歷史地理以及其他各學。關於中國，所記亦甚多，但大致與阿布賽德（Abu Zaid）之印度中國紀程相同、黃巢之亂，麻素提亦有記述。且記回教紀元二五五年（

869，唐咸通十年）有依賓哈拔兒（Ibn Habbar）者，來遊中國，亦頗多記著云。

阿布賽德哈散（Abu Zaid Hassan）之印度中國紀程，中國之部，素負盛名，東方學者間甚重視之阿拉伯史料也。是書實成自獨立之二部分，並非一人著述。第一部爲撰者不明之印度中國事情志，僅第二部爲阿布賽德之印度中國傳聞集，第一部爲某氏選訂蘇烈曼（Suleiman）及其他佚名之中國見聞記，與本身之印度見聞，撰錄於八五一年（唐大中五年），第二部則阿布賽德以自己傳聞之中國事情爲綱，附錄以印度雜事及巴斯拉市人依賓瓦哈伯（Ibn Wahab）之長安遊記。編述於九一六年（後梁貞明二年）時（註十）。第一部記廣東之市街貿易及回教徒，凶年之開公倉，對貧民之施藥，政府之經營學校，官制之整然，行政之嚴明，官吏階級職掌之複雜，又謂事務皆以文書，其文辭形式皆有嚴格之規範，貨幣無金銀而專用銅錢，人死後埋葬延期或至數載，對旅行者加以極有組織之保護，以及陶器之製造，米穀之釀酒，茶之飲用，宗教（佛教）則來自印度，崇奉偶像，兩國皆信輪廻之說，惟略有不同。所記頗有虛譚，而事實亦不尠。第二部作者阿布賽德開始卽謂蘇烈曼書成後六十餘年間，中國內部情形大變，亂事四起，全國無主，中國之威力，完全消滅。是蓋傳唐末五代時大亂實況；尤其詳記僖宗乾符年間黃巢亂事，頗足珍貴，往往流傳不見於中國記錄之佚聞。此外，第二部附載依賓瓦哈伯（Ibn Wahab）之僖宗皇帝謁見記，亦頗足珍。依賓瓦哈伯於黃巢大亂以前，嘗由廣府北上，行兩月至克姆丹（Khumdan）京城，覲見唐僖宗

李儇，有長篇記述與李環之談話，其眞確性，毫無可疑者。

十世紀中葉，有阿位伯人，名依賓麥哈黑爾（Abu Dulaf Misar Ibn Muhalhil）謂嘗旅行中國，著有遊記。依賓麥哈黑爾留於布哈拉（Bokhara）波斯薩曼王朝（Samanidae）那斯里（Nasri Bin Ahmed Bin Ismail）王廷時，有中國國王喀拉丁（Kalatin-bin-ul-Shakbar）之使者，抵那斯里王之廷。喀拉丁乃夏克巴（Shakbar）又名夏克黑爾（Shakhir）之子也，使者來意，欲聯好兩國，結秦晉之盟，喀拉丁有女，欲配那斯利之太子奴亞（Neah），奴亞後繼其父君臨布哈拉，中國大使於九四一年（後晉天福六年）回國，依賓麥哈黑爾乘機與使者東遊。其遊記全文已散佚，雅庫忒（Yakut）喀資維尼（Qyzwini）二人常引其文，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有德國人施樓秋（Kurd de Schlozer）者，嘗將雅喀二人書中所引之麥哈黑爾遊記摘出而理成連續文體，譯成拉丁文（註十一）。讀其文，見使者踪蹟，遍於突厥韃靼等國，由黑海邊以至黑龍江畔，不知該使者，爲何若是其浪遊也。中國都城曰新達比爾（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訛傳之印度城名，如康達比爾（Kandabil）山達伯爾（Sandabur）等，中國無如斯之城名也，其最近之音爲成都府，馬可波羅遊記作新的府（Sindifu），乃四川省之首府，五代時，爲蜀國之都城。其所言中國王名，夏克巴或夏克黑爾之子喀拉丁，在中國史上，亦無相當之人，故其遊記，是否可信，尚難確定。但原文已佚，今所讀者，乃斷章不全之補綴文。踪跡無定，忽然在此，忽然在彼者

、補綴之功未精，亦未始無因也。

厥後，約隔一世紀，一〇五〇年（宋皇祐二年），格兒德齊（Ibn Duhak Gardēzi）之記載（Zain al-Akbar）（註十二）有數頁專論中國，十九世紀末，俄國東方學者巴拖爾德（V. Bartol'd）首認定其價值，其所傳較依賓麥哈黑爾正確可信多矣 通過路程自今吐魯番（Turfan），經庫麥爾（Kumul，今哈密）、巴格許拉（Bagh Shura）、沙州（Sha Chau）昔謂之敦煌（Dun Chuan）、安西府（Ngan-Si fu）、肅州（Sukhchau）、甘州（Khanchau）、姑藏（Kucha），渡大河（黃河），以抵中國京城克姆丹（Khamdan）。沿途有驛馬，可以換乘。克姆丹者，與見諸比散丁史家席摩喀塔（Theophylaktus Simocatta）書之庫伯丹（Khubdan），爲同一語之訛，自古波斯指長安之稱也。藉其所載地名，且可考知當時之發音焉。

阿拉伯地理學，以十世紀爲其黃金時代，至十一世紀以後，除一二例外，皆不過九、十世紀著述之拔萃或重編，增補新知見之部分甚少。故中國知識，亦不過前代之彙類豐說，反致事實之錯綜誤解。但九、十世紀遺書今完本少傳，藉此可窺原書面目，推想當時知識。故學者因此，對十一、二世紀以後晚出之書，亦相當尊重之。

愛德利奚（Idrisi）地中海中西錫利島（Sicily）人，受島王羅哲二世（Roger II）之命，著地理書（Muzhat al-Mushtāq）（註十三），書成於一一五三、四年間（宋紹興二十

三、四年）。所述中國及其他亞洲東南部如印度等地，皆甚略，且極紛亂，所舉各地相距道里，皆不免過小。至謂從來以中國都城著聞之克姆丹（Khamdan）爲河名，尤足曝露阿拉伯地理學末期之弊竇焉。

耶顧特阿爾陸密（Yāqūt-al Rūmi 1179—1229）其父母爲希臘人，生於東羅馬領內之阿拉伯地理學者也。幼賣爲奴隸，傭於報達（Baghdad）一商人，因經商，屢往來於波斯灣沿岸諸地，主人死後，業書肆，旅行於敘利亞埃及等地，著有地理大辭典（Mu'jam al-buldan）（註十四）。

阿伯爾肥達（Abul-Feda 1273—1331），當時著名史學地理學家也，其所著諸國地誌，爲阿拉伯地理學代表名著，氏生於蒙古混一亞歐之時，東西交通，極臻便利，然未得利用時機，多獲東方地理之新知識也。所著地誌，成於一三二一年（元至治元年）（註十五），關於中國者，雖亦不乏新材料，然大部皆自古書中搜羅而得也。

此時代紀錄中國方面知識者，不僅上述之地理學者，卽史家中亦殊不尠。其代表著作，如九、十世紀之他把里（At-Tabari），著有世界史（Akbār al-rusul Wa'l-mulūk 諸豫言者及諸王之史）（註十六），爲最古之阿拉伯史，又爲最初之阿拉伯語史記。薩拉森之勃興，薩賛朝波斯滅亡前後與中國之關係，賴是書傳於今日者不少。十一世紀阿爾比魯尼（Al-Biruni 973—1048）精通史學數學星學醫學，其印度史（Ta'rikh al-Hind）及古代

諸民族年代學（Al-Athar al-Baqiya 徵古資料現存紀念物）最著（註十七），頗有資於極東硏究。

七世紀至十二世紀極東知識殆爲阿拉伯學者旅行家所專有，歐西人幾無直接傳之者，有之，僅西班牙國土代拉城猶太牧師班哲明（Benjamin of Tudela）一人而已。班哲明於一一五九年（宋紹興二十九年）離鄉里，經法國南部至意大利，又至君士坦丁堡、小亞細亞、叙利亞、猶太等國，更至波斯灣計施（kish）港，於此得聞東方印度中國各地事甚多，一一七三年（宋乾道九年）歸國，著有遊記（Mazahoth 1543）一書（註十八），書中叙述錫蘭島後，叙中國曰：「由此（錫蘭）往秦國（Sin），須航行四十日，其國在東方。……」云云。

阿拉伯之回教教主國時代，惹歐人之注意者僅柏來斯丁（Palestin）。起十字軍以恢復聖地，爲歐人親觸回教文化之機緣，歐人始知羅馬教會希臘教會以外，又有其他基督教世界，有喀西但（Chalcedon）派，雅各（Jacob）派，聶思脫里（Nestorius）派。雅各派主要爲亞美尼亞人，聶思脫里派則行於波斯，此三派從來將陸上海上往中亞東亞之通商路皆利用於傳道事業，聶思脫里派及雅各派於回教威脅下，十二世紀以後互相妥協，此三派傳道成功之程度不明，但傳佈東亞最廣者爲聶思脫里派，今所存東亞基督教遺蹟之大部分，足以證明之。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七八一年建立），其著者也。十世紀時，基督教行於中亞

之回鶻人間，即聶斯脫里派也。聶斯脫里且因彼等之活動，使基督教盛行於蒙古諸種族間，基督教於成吉思汗以前，頗有勢力於西蒙之乃蠻族及東蒙之客咧亦惕（Keriet）族，爲支配的宗教焉。

（註一）關於阿拉伯學者之傳記著書參考：1. Cl. Huart, A History of Arabic Literature. New York, 1903. （Edmond Gosse 監修 Short Hitory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 之1冊）。 2. R.A. Nicholson,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Second ed. London 1914 （The Library of Literary History 之1冊）。 3. C. Brockelmann, 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 2Bde. in 4 Teilen. Weimar 1898 Berlin 1899—1902. 4. M. T. Houtsma,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yden 1903 ff.

（註二）關於阿拉伯地理學，於普通地理學上所占位置，參看 C. R. Beazley, The Dawn of Mordern Geography. 3 vols. London 1897—1906 第1卷。

（註三）參看 Sir A. T. Wilson, The Persian Gulf. An Historical Sketch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1928. 桑原隲藏，唐宋時代に於けるアラブ人の支那通商の概況殊に宋末の提擧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蹟（東京，1935），波斯灣頭の東洋貿易港に就いて（東西交通史論叢 1933）

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 1926.）

（註四）拔萃阿拉伯人著述中之極東記事，附以法譯者，有 G. Ferrand, 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êograp hiquas arabes, persans et turks relatifs a l'Extrême-Orient du VIIe au XVIIIe siecles. 2 vols. Paris 1913—14.

（註五）有C Barbier de Meynard, Livre des Routes et des provinces par Ibn Khordadleh. Paris 1865 法譯本， De Goeje 校刋之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第六卷，收其原文及法譯， Sprenger, Die Post-und Reiserouten des Orients. (Abhdlgn d. deutsch. morgenländ. Cesel., Bd III) Berlin 1864 有關於中國部分之德譯。

（註六）參看：桑原隲藏之イブン＝コルダードベーに見えたる支那の貿易港殊にジャンフウとカンフウに就いて。（東西交通史論叢 1933）

（註七）參看內田銀藏之シラの島及びゴーレスに就きて（藝文六之三・四・八・十；七之一・四・九；八之一，四，八；九之一。）（未完）

（註八）扶由（De Goeje）謂：“瓦克瓦克（Wâk wâk）來自倭國（Wa Koku）之廣東土音”。見 Arabische berichten over Japan. Amsterdam. 1880.

（註九）原文收於 De Goeje 校刋之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第

八卷（1894）。先此，C. Barbier de Meynard 與 Pavet de Courteille 出版 Macoudi, Les Prairies d'Or. 9 vols. Paris 1861—72 原文法譯合璧本。

（註十）一七一八年，法人雷腦多德（Abbe Rusebius Renaudot）始譯成法文，輸入歐洲，題曰：九世紀回教二遊歷家印度中國見聞錄（Auciennes Relation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de deux Voyageurs Mahometans qni y allerent dans le IXieme Siecle），所譯原本，以後遺失，不知所在，故當時英法評論家，竟有謂全書皆為偽造者。一八四五年，法國萊奴德（M.Reinaud）復重譯之，併詳加考證。譯本書末，又將阿拉伯原文印出，全書曰：耶穌紀元第九世紀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國紀程(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la Chine dans le IXe Siéle de l'ère Chréinne, texte arabe imprime en 1811 par les soins de feu Langles, Publie avec des corrections et additions et accompagne d'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et d'eclaircissements par M. Reiuaud. 2 Vols.)

（註十一）Yule-Cordier, 1 附錄有英譯，G. Ferrand 之 Relations de Vcyages 第一卷有法譯，考證有 J. Marquart, Ostenrepäische und Ostasiatische Streifzüge, Leipzig 1903. 中之 Das Itinerar des Mi'sar b. al Muhalhil nach chinesischer Hauptstadt.

（註十二）參看 Yule-Cordier, 1, PP. 140—1 及 Bartol'd, S. 205，皆舉有參考書。

（註十三）Jaubert 譯本：Géographie d'Edrisi,tradvite de I'arabe en fraçais. Paais 1836—40.

（註十四）原文經 F. Wüstenfeld 出版，名Jacuts Geographisches Wörterbuch. 9 Bde. Leipzig 1866—70. B. de Meynard 之法譯本，僅收波斯及其附近諸國之部，名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e,historic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Paris 1861.

（註十五）有Reinaud, Géographie d'Aboulféda traduite be l'arbe en français, Vol. I. Paris 1848（東方地理總論），Vol. II. Pt. 1,2. Ibid. 1848—83 譯本。關於中國之部分，Yule-Cordier, 1. 附錄收有 Badger 之英譯。

（註十六）原文，De Coeie 校刊之，分爲九卷，名 Annales quos scripsit at-Tabari. Loyden 1877—92. 薩贊朝部分，Nöldeke 之德譯，名 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saniden. 1879.

（註十七）德國人 F. C. Sachau 皆英譯出版者，名 Alberuni's India. London 1884. （Trübner's Oriental Series 之一。）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Vestiges of the Past）. London 1879.（阿拉伯原文，有 Sachau 之校刊本。）

（註十八）參看：1, Asher, The Itnerary of Rabbi Benjamin of Tudela, 2 Vols. 1840. 2. Grünhut und Adler, Reisebeschreibungen des Benjamin von Tudela. 1903—04.

三　十三世紀

——蒙古勃興時代西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十二、三世紀之交，阿拉伯人徒反覆九、十世紀關於極東之知識，新獲知見，無顯著增加。當斯時也，蒙古驟興，捌大帝國於亞洲北部，伸張餘勢，遠及歐西，亞歐間直接交通再開，東方事情，乃再傳於歐人之間。是時，歐洲盛傳極東有治廣大領土之景教君主曰拍萊斯脫約翰（Prester John），此傳說亦多數歐人東方旅行之一素因也。歐西諸君主，嚮與西亞回教徒交戰，為恢復柏來斯丁（Palestine）聖地，屢遣十字軍；今又增一蒙古勁敵，益焦燥於其對策焉。一二四五年（宋淳祐五年），羅馬教皇英諾森德四世（Innocent IV）召集列國會議於里昂（Lyons），議防禦蒙古策。先是，教皇欲東遣使節，告以神怒之可畏，慫慂其早日歸依基督教，並偵察有無再舉西征之計。乃以高僧柏朗嘉賓(Plano de Carpine)為首班，授以親書，使往蒙古。

柏朗嘉賓（Plano de Carpine 或作 Pian di Carpina 1182—1252）（註一）意大利

人，於一二四五年（淳祐五年）四月十六日復活節日，以六十五歲之高齡，出里昂，上萬里征途。一二四六年（淳祐六年，蒙古定宗元年），二月抵窩瓦河畔拔都大王之廷幕，稍留，更東行。經波斯，行三月半，疲困萬分，以七月二十二日，抵喀喇和琳附近，親臨貴由大汗（KuYuk Khan）登極之禮。謁可汗，捧呈教皇親翰，但所請無成。至十一月十三日，携貴由可汗答書三紙西歸，途中再謁拔都，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蒙古定宗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抵教皇之廷覆命。携歸之答書三紙，一爲蒙古語，二爲拉丁譯，三爲蒙古人所稱薩拉森語實乃波斯語，拉丁譯爲其翻譯自蒙古語譯出者，其餘二者，爲蒙古側所製。第一第二不傳，第三近年始出現，學界珍爲希有史料。原本現存羅馬市加斯鐵陸文庫（Archivio di Castello）。其使命，表面歸於失敗，認貴由汗有再侵歐洲之意，對基督教國諸君主上言對策，頗副教皇期待之一端，東行之收穫也。而詳載其東往西還途上見聞事務之報告書（Libellus Historicus．小歷史）（註二）殆蔡馬庫斯（Zemarchos）以來數百年，傳親自亞細亞內地所得知識於久昧東方事情之歐西人士者也。其所述，往往有不見於中國載籍者，不獨增益當時歐人之知見，卽在今日其裨益於中國史研究者亦匪尠。記貴由可汗選立之忽烈而台（Khuriltai，大會議）及卽位盛儀，尤足珍貴，所論雖以蒙古漠北爲主，亦言及中國本部。其記中國也，稱以（Cathaz，Catai，是蓋 Khitai（契丹）之訛，此民族自十世紀初洎十二世紀初，據北方者二百餘年，蒙古民族在其故地，故其滅亡後，仍襲舊

稱，以指華北，更進而稱其土著漢人爲契丹人（Khitai pl. Khitat）焉。謂：「契丹國之一部，以在海中，負險自守，故至今尚未爲塔兒塔兒（Tartar）所征服也。契丹人崇信異端，自有文字。據云，亦有耶穌教新舊約，其國歷史記其祖先之傳記，國中有隱士，遁居山林之中，有專舍，類於吾國之教堂，備祈禱之用。自有聖人甚多，深信世間僅有一天主而已。亦禮拜崇敬吾教中之聖人耶穌基督也。又信靈魂不死之說，皆與吾人相同，唯無洗禮而已。吾教聖經，其人亦敬信之，禮愛基督教徒，好施捨，以濟貧乏，禮俗謙讓，爲人溫恭，無髭鬚，面貌與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寬，自爲言語，精於工藝，其技巧世界無比也。地極富饒，豐產五穀、酒、金、銀、絲、及各種養生之物。」文中所謂塔兒塔兒，蒙古人侵歐以來，歐洲對其所施之稱呼也。似起自其軍中之塔塔兒（韃靼，Tatar）族名，乃附會於希臘神話中之塔兒塔兒斯（Tartarus，地獄），謂其爲兇猛不逞之蠻民，如來自冥府也。其後歐人常指其住地爲塔兒塔利（Tartary），蓋源於此。所謂新舊約者，或謂儒家經籍歟？所記雖簡，實比散丁史家以後數百歲，親至亞細亞內地之歐人所齎歸之最初中國知識也。

一二四八年（淳祐八年，蒙古定宗三年）法國王路易九世於錫拍羅斯（Cyprus I.）引見歸自蒙古之聶斯脫里派（Nestorius）僧人，蒙古有力者之所派遣也。希望結成蒙古歐洲之同盟，以對抗回教徒，使節盛言貴由汗及其后之熱心基督教，路易九世乃遣二教團，第一

團長爲多敏我派（Deminico）僧人安德魯（Andre de Longjumeau）（註三），一二四九年（淳祐九年，蒙古定宗四年）發錫拍羅斯（Cyprus I.），爲歐人之最初至蒙古都城和琳者，但無何效果，一二五一年（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歸，且未留旅行記。第二團長爲方濟各派（Francisco）僧人羅柏魯（Willem de Rubruck【Ruysbroek】）。

羅柏魯（Willem de Rubruck【Ruysbroek】1215—1270）法國北部佛蘭寶斯省（Flanders）人也，受法蘭西國王聖路易之命，出使韃靼諸王之廷，其目的爲何，書中秘不宣布，僅託言傳教東行而已。其紀行書最有興味，表示著者爲人聰慧多識，眼光過人，文章亦極有條理。羅柏魯以一二五三年（宋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五月七日進入黑海，六月十二日，抵索爾對亞（Soldaia），八月二日，抵撒里答（Sartack）之帳幕，次至窩瓦河畔，見拔都大王。九月十六日，離拔都之廷，東行至和琳，見蒙哥大汗。一二五四（寶祐二年，憲宗四年）秋，西歸，繞道裏海西岸南行，以一二五五年（寶祐三年，憲宗五年）六月，抵敘利亞安谷港（Antiochia），其東派之表面使命，殆歸失敗，蒙哥可汗覆法國王書原本，今佚，大意詳載於羅柏魯書中，法國王初志未得貫澈，其副產物之收穫，並非絕無。蓋因此行而知：1，蒙古歷代君主爲基督教信者，且欲尊爲國教之事，不過風傳；2，彼等不過予以與佛教回教等同等待遇；3，蒙古人欲再侵歐洲一事，亦不過無根之風聞，令決無此意；4，此風聞，蓋爲對西亞細亞回教諸國出師準備之誤傳。故其攜歸之蒙哥可汗親書，雖言辭

傲慢，其勢實不足懼，歐洲諸國旣無蒙古來侵之憂，更欲利用之以控制他民族；知蒙古君民之改宗於基督教，決難期待，但伍於其他宗門而弘布之，亦非不可能也。一方欲利用其武力以牽制歐洲宿敵之回教諸國，是皆其東行偵察之所賜也。後者不待歐洲方面之策動，以蒙古方面自發的活動，不久而達成此大目的焉。其報告書，名羅柏魯會友遊記（Itinerarium Fratris Wilhelmi de Rubruk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 anno gratiae M. CC. L. III ad Partes Orientales）對路易士呼以二人稱，形式爲報告書，事實不外爲一種旅行記，叙蒙古人風俗習慣頗詳，記載蒙古領內行各種文字，如回鶻文字、西夏文字、西藏文字、漢字等，記蒙古首都（註四），記可汗帳幕，記當地之基督教、佛教、回教，記蒙古領內之歐人，記朝鮮（Caule），皆供後世史家以重要資料。更確認拖雷美（Ptolemaios）所謂之賽里斯（Seres）人卽中國人，裏海實爲湖沼，傳之歐人，但裏海不通大洋之地理的事實，竟未獲信於歐西人士。以契丹稱中國，而記之曰：「過此有大契丹國（Great Cathay），余意卽古代賽里斯國(Land of the Seras)也。蓋其地今代仍產絲，品質之佳，世界無匹，其人稱絲爲賽里克（Seric），其地有城市，名賽里斯，因而國亦名賽里斯。有人告余，其國有一市，城牆爲銀所建築，城堞爲金所建成，國境分割多省，有數省至今尚未爲蒙古人所征服。契丹印度之間，有海介之。契丹人身軀短小，言語中，鼻音甚多，兩眼上下甚狹，東方之人，大概如是。精於各種工藝，醫士深知本草性質，余親見治病以按脈診斷，妙不可

言，從不檢驗病人之尿，亦絕不知有其事。喀喇和琳城（Karakorum）中，契丹人甚衆，其人風俗，子必繼承父之職業，契丹人賦稅甚重，計每日須付蒙古人一千五百雅斯閣式（Jascot），或名科斯米（Cosmi），雅斯閣特為銀幣，每塊重十馬克（Marks），故每日之數，已達一萬五千馬克矣。此外更須貢絲、貢食、及各種徭役。……有僧人來自契丹國，余得遇之，訪問後，得悉由和琳城往契丹國，須東南行二十日即可至。……契丹國無酒，其飲料皆製自米，現今其人雖亦種葡萄，然不以製酒也。其人又告余一事，言之似確鑿有證，然余絕不信有其事也。其言云：過契丹國，有一地，人入其境，不論年紀若干，皆不致老也。契丹國濱大海洋，……契丹國通用之錢幣，皆為棉紙製成，寬長皆約一掌，其上蓋印紋，印類蒙哥大汗之玉璽，其人寫字用毛刷，猶之吾國畫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數字而成全字。」旅行記翔實正確，為中世紀行文學之白眉。

一二五八年（寶祐六年，蒙古憲宗八年）蒙哥可汗之弟旭烈兀陷報達（Bagdad）建伊兒汗國，蒙古與歐洲之提攜，更形進展，爾後，伊兒汗國之主權者數代通聘羅馬教皇、法蘭西王、英吉利王，更助長此傾向，因之東西交涉漸繁，文物互相交流（註五）。而伊兒汗國國都塔伯利賚（Tabriz），實東西文化之媒介地也。塔伯利賚（Tabriz）市街，有中國人街及歐洲人街，威尼斯（Venice）基奴亞（Genoa）等駐使臣於此，掌國際事務。當時爭地中海商業霸權之意大利都市之活動，頗堪注目。初則皮撒（Pisa）、威尼斯（Venice）基奴亞

（Genoa）相角逐，一二八四年（元至元二十一年），皮撒敗於基奴亞後，乃成威尼斯基奴亞之對抗戰，以至十四世紀。此間，威尼斯之財富威勢，常壓諸市，商人之東方活動，亦甲於諸市。威尼斯東方貿易者中，東方知識西傳史上最有名之波羅一家，尤其馬可波羅之出現，蓋有由來也。波羅一家，夙從事於東方貿易，一二六〇年（宋景定元年，元中統元年）尼哥羅波羅（Nicolo Polo）及馬飛波羅（Maffeo Polo）兄弟二人至黑海北岸之克里米亞營商，後向北行，至窩瓦河畔伯忽汗之廷，由布哈拉而至遠東忽必烈大汗之廷，大汗見二人大喜，乃遣之西歸通聘羅馬教皇。一二七一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第二次東來時，尼哥羅攜其幼子馬可（Marco 1254—1324）與俱，經帕米爾高原，一二七五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至上都開平府，朝見忽必烈。馬可學中國語，習蒙古回鶻西夏西藏等文字，甚得可汗之寵，且就諸種官職（註六），參與內外政務，在華凡十七年，其間屢請歸國，不許。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伊兒汗國主與蒙古一公主之間成立婚約，波羅一族以護送至波斯為條件，蒙允歸國。三波羅於是年之初，以十四隻艦隊，自泉州解纜，上海路西航之途，沿途行程頗不順利，勾留於蘇門答臘島海岸及印度南部頗久，閱時二年，乃得達波斯忽里模子港。及至伊兒汗國之都塔伯利資（Tabriz），阿魯汗（Arghun Khan）已故，其弟凱嘉圖（Kaikhatu）攝政，公主改嫁阿魯之子合贊汗（Ghazan Khan），合贊汗為波斯國賢君，多謀足智，善用兵，波羅等留於波斯王庭九閱月而後西歸，在君士但丁堡小

作勾留，黑海北岸索爾對亞（Soldaia）港，或亦曾繞道一視。一二九五年（元貞元年）還抵威尼斯故里，馬可波羅離家二十三年，至是始歸。旋威尼斯（Venice）與基奴亞（Genoa）間戰事起，馬可波羅爲艦中司令官，統帥爲丹多羅（Dandolo），一二九六年（元貞二年）九月七日，阿得力亞的克海（Adriatic Sea）中苟坐拉（Guizola）島海戰，敗北爲囚，投基奴亞（Genoa）獄中，三載，一二九九年（大德三年）赦回威尼斯（Venice），娶妻，其後行動，頗欠明瞭，一三二四年（泰定元年）以病去世。遊記之述作也，實在基奴亞獄中。在獄中不久，結交皮撒（Pisa）市人羅斯梯謝奴（Rusticiano），羅氏爲當時著名小說家，亦戰時俘虜，得聞馬可所述遠方異域之事，勸其速著一書，以傳其事，馬可爲自己省時免勞，兼爲獄中消度光陰之故，乃口述各事，而羅氏筆受之；依各種証據考之，老法文實爲遊記最初所用之文字也，馬可不知皮撒土語，而羅氏又不知威尼斯土語，故兩人當時用最通行之老法文也。一八二四年（清道光四年）巴黎地學協會（Société de Géographie）上梓之所謂地學協會本（Geographic Text）者，原稿今藏巴黎國民圖書館，與原本最近。爲現存諸寫本諸版本之祖本，逼眞於羅氏眞本，乃貴重之古寫本也。（註七）馬可波羅書，初疑其荒唐無稽，不爲世所重視，後漸知其可信，今竟爲研究元代事物不可缺之寶典。學界均珍爲貴重史料。科倫布（Columbus）讀其書，憧憬東方，因以發現美洲。書中於上都大都杭州之繁華富麗，以及泉州港中外交通之殷盛，均有敘述，並及日本（Chipangu）、高麗

（Cauli）、西藏、緬甸、後印度、南洋群島、錫蘭諸地。元代之瑣聞佚事，朝章國故，散見其中，可補史策之不足。書中稱華北爲契丹，稱華南當時南宋領土爲蠻子，蠻子者，北方通行之稱呼也。稱北京爲大都外，又稱汗八里（Cambaluc），此爲汗城之意，通用於蒙古人間，固自西域傳入歐洲方面之名稱也。呼今之杭州當時南宋首都之臨安，曰 Khinsas 卽行在二字之音譯。其元代史事，有：1，宗室乃顏叛亂之平定，2，姦臣阿合馬之被殺，3，永昌大戰，4，李璮之亂，5，滅南宋，6，攻襄陽，7，鎮江府基督教堂之建設，8，常州屠城，9，征日本等項。惟馬可漢語文之知識，殆甚貧乏，書中地名、民族名多襲波斯語。其記憶之誤，觀察之疏，有意之誇飾，均所不免，讀其書時，更宜辨別有著者目睹之部分；有基於傳聞之部分也。

十三世紀阿美尼亞人之中國知識，及十三世紀半至十四世紀初波斯方面編纂之成諸波斯阿拉伯史家之蒙古史，傳於當時及後代歐人之間，爲歐西人士東方知識之源泉焉。羅柏魯謁蒙哥可汗於蒙古幕營後，未久，詣此可汗之廷者，有小亞美尼亞王海敦一世（Haiton I. Hethnum 1201－1272）。先此，王見蒙古勢強，悟早日通欵訂交之有利，一二四六年（宋淳和六年，蒙古定宗元年），嘗由可汗登位時，海敦遣其胞弟仙拍德（Sempad＝Sinibald）赴蒙古和琳賀之，兼以聯絡感情，仙拍德離國四年，始歸。當在撒馬兒罕城時，仙拍德嘗致書於錫拍羅斯島（Cyprus Is.）王、后、廷臣等（註八），爲其兄辯護投誠蒙古之

故，蓋當時西方各國君主，頗有不直海敦，以崇拜基督教之王，降於蒙古也。內容簡單，關於中國所傳，甚多誤解，不足重視。謂中國（Chatha）全土之民，皆爲基督教徒，誤之甚者也。反之，海敦王之見聞記（註九）頗有助史家。蒙哥大汗即位，海敦王復親來蒙古和林賀之，兼欲取得保護証書，及某種權利也。其紀行書爲隨員吉洛廓斯剛德賽克齊（Kirakos Gandsaketsi）所作，剛德賽克齊，亦亞美尼亞人也，原書爲亞美尼亞文。見於旅行記者爲途上目擊之奇習異俗及傳聞之中國事務，尤其宗教情形，謂中國人（Ghotai, Cathai）拜Shakemonia（即 Sakyamuni 釋迦牟尼之訛）之像，又有 Madri（即 Maitreya 彌勒佛之訛）之像，蓋闢佛教信仰者也。後此五十餘年，其族人果利葛斯親王（Prince of Gorigos）海敦，本此以著東方諸國風土記（Merreilles des 罒 Royaumes d'Asi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Kingdoms）一書（註十），果利葛斯親王海敦身歷東方戰爭及政治甚久，一三〇五年（大德九年），自小亞美尼亞被流至錫拍羅斯島，削髮，充拉拍斯（Lapais）寺僧人。翌年末，渡法，居泡亦梯寺（Poitiers），受克萊孟第五世（Clement V）之命，口授東方諸國歷史地理於佛爾康（Nicholas Faulcon），用法文記之，名之曰：東方諸國風土記。一三〇八年（至大元年）五月六日，海敦歸至錫拍羅斯島，後又歸其本國，任警察長官，卒於一三一四年（延祐元年）。東方諸國風土記全書五卷六十章，記載亞洲地理，蒙古諸汗傳記，聖地及東方基督教徒情況，前十五章，皆記亞洲諸國，

爲古代記載亞洲諸國地理最佳之作云。

十三世紀後半至十四世紀初，成於波斯阿拉伯史家書籍中，有一部或全部爲蒙古史者（註十一）。自年代言之，首爲阿岐兒（Ibn-al-Athir 1160—1233）（註十二）之全史，（Kamil-ut-Tavārikh），記成吉斯汗麾下蒙古軍勢活躍於波斯美索不達尼亞等地之情形，事多著者當時親見，頗足置信。

成於波斯史家手之史書，與蒙古中國內地有關係者，以伊兒汗國之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Alai-eddin Atta Mulk Djuvêni 1230—1283）之世界征略家傳（Tarikh Djihan Kuschai=History of the Conquerer of the World）爲巨擘（註十三）。志費尼者，以地爲姓，系出名門，其父即法合魯丁，一二五一年（蒙古憲宗元年），受命佐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尙書省事，阿拉哀丁從其父至蒙古和琳賀蒙古大汗卽位；旭烈兀西征，從軍，主文牘，報達旣平，受命爲地方長官。世界征略家傳，脫稿於一二六〇年（宋景定元年，蒙古中統元年），記成吉斯汗末十年之事，阿母河北諸地及波斯之征服，皆甚詳晰。窩闊台及貴由兩大汗之事蹟，蒙哥大汗御宇初期之史，至紀元一二五七年（宋寶祐五年，蒙古憲宗七年）爲止，皆有詳細之記載。畏吾兒（Uighur）哈喇契丹（Karakhitai）及花剌子模（Khwarizm）諸國事蹟，亦載之。

火者拉施特愛丁（Khodja Rashid—eddin 1247頃—1318）（註十四）之史記彙編

(Djami-ut-Tawarikh=Collection of Histories)，（註十五）亦巨著也。拉施特歷仕阿八哈汗（Abaka Khan），合贊汗（Ghazan Khan）鄂爾介都（Oljaitu）不賽因（Abu Zaid），爲典醫，爲宰相，又以一代史家，名聲嘖嘖。一二四七年（宋淳和七年，蒙古定宗二年），生於波斯之哈馬丹城（Hamadan），謂其系出猶太者，乃反對黨之宣傳，然否殊有可疑。氏初爲阿八哈汗侍醫，於宮廷已相當有勢；及合贊汗時，爲宰相，頗著治績；鄂爾介都汗時，亦頗專寵；一三一五年（元祐三年）與同僚宰臣阿梨沙甲不蘭（Ali Shah Jabalan）因財政問題生隙，然終鄂爾介都之世，拉施特尚能維持其權位，一三一七年（元祐四年）不賽因（Abu Zaid）嗣位，遇讒獲罪，被腰斬，年七十餘，時一三一八年（元祐五年）事也。此一代名著，波斯學術史上乙部首位之史記彙編，初奉合贊汗勅，從事撰述，記蒙古勃興及伊兒汗國功業，合贊汗殂落後，奉鄂爾介都命完成之。依新汗之勅，增修以回教諸國爲中心之世界史，凡前後二卷，第一卷雖成於合贊汗故後即一三〇四年（大德八年）五月十七日以後，但依鄂爾介都之命，獻於合贊汗；第二卷脫稿於一三一〇年（至大三年）至一一年（至大四年）之間，爾後二年，著者努力於鄂爾介都治世之敘述，以作附錄。本書記載韃靼（Tartar）及突厥（Turk）諸民族，成吉斯汗及其先世，波斯諸汗，尤爲詳盡；鄂爾介都事蹟，亦有記載；又亞洲西部各國，摩訶末及其弟子事蹟，以色烈諸聖，羅馬歷代皇帝，西歐諸國君主，皆有傳記；印度及中國，亦皆有專章，對於日本（Tchépangou）亦

有記載。書末原擬有世界地理志一篇，而今無傳，蓋當時卽未著成也。其自序謂書之成功，得力於孛羅丞相　(Pulad Chingsang)　者甚多，孛羅奉大汗之命，出使波斯，居塔伯利資(Tabriz)城，人極博學，熟知突厥及蒙古各部興衰掌故，曠世無儔，嘗仕至丞相，爲全國兵馬元帥及行政長官，拉氏書中契丹一章，蓋皆聞之於孛羅者也。編輯時，合贊汗御用文庫中，所藏重要公牘，拉氏曾皆得參閱，又阿爾壇戴勃脫兒(Altan Depter)一書，猶言金冊，爲歷朝實錄，最爲寶貴，有大臣守藏之，拉氏亦曾參閱之也。

於此，應略記者，其爲瓦薩甫(Vassāf ul Hayret)之史記(Ta'rikh-i-Wassāf)歟！瓦薩甫乃徽號，其義爲皇帝陛下之贊頌者，非人名也。其眞名，爲阿卜圖拉(Abdullah)，法則爾烏拉(Fazel-ullah)之子也。曾爲伊兒汗國收稅吏，受知於拉施特愛丁(Rashid eddin)，以文學薦於合贊，一三〇三年(大德七年)獻史記前三卷，是書正名爲：邦土之分割與歲月之推移(Tajziyat-ul-Amsār wa Tazjiyat-ul-Aisār)(註十六)全五卷，一三一二年(皇慶元年)鄂爾介都卽位時，第四卷完成，又獻之，一三二八年(致和元年)，，記不賽因治世之第五卷完成，蓋欲續志費尼之書，起稿於一二五七年，(宋淳祐五年，蒙古憲宗七年)，擱筆於一三二八年(致和元年)，以伊兒汗治下波斯爲主，蒙古可汗之經營中土，成吉斯汗苗裔之中亞活動，亦有相當記載；唯文章過於琢磨，有難解之弊，史實次序亦多錯亂，難於領會，是其瑕也。

因數次十字軍之遠征聖地，東方貿易之發展，蒙古之西征，僧俗諸王之特使東派，亞細亞諸君主之使節西遣等，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初，歐洲對東方之興味，前此未嘗見也。東方事情，不僅依旅行者商人之傳聞，得以豐富其知識，且加以學術研究，精審把握東方事物之傾向，顯著擡頭。一三一一年（至大四年）至一二年（皇慶元年）之宗教會議，決定於羅馬巴黎等大學開設阿拉伯希伯來諸言語之講座，雖不幸未得立時實現，但事實歐洲之東方研究，日益進步，可蘭及其他多數阿拉伯科學書，於十二世紀中，已有拉丁譯之出現。言語之研究，與布教有密切關係，故實用方面之探究亦盛，可曼語古鈔（Codox Comanicus）一書，可謂十三、四世紀此種傾向之紀念塔，又為欽察部族之語彙，寫本今存，此書除語彙外，更含有基督教之福音書斷片，及其他二三教籍之譯文，蓋不僅為此民族語言研究之寶典，且廣用於阿爾泰民族言語之研究，而調查中國塞外諸族歷史文化者，亦屢引證焉。

（註一）柏朗嘉賓（Carpine）傳記，參看： Friedrich Risch, Johann de Plano Carpini,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und Reisebericht, 1245—1247. Leipzig 1930. D'Avezac, Recueil de Voyages, etc. 1839

（註二）Libellus Historicus, 並非原名，不過借自此報告原文一版本之 Hakluyt 一五八九年（明萬曆十七年）出版於倫敦者之表題。

柏朗嘉賓羅柏魯之詳細書誌，參考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nouv. éd., Vol

Ⅲ. Paris 1903 及其 Supplément（Ibid. 1922–24）與 R. Streit, Bibliotheca Missionum, Vol. Ⅳ Aachen 1928, 後者雖有失檢誤植，但成於一人之手，苦心勞力之成果，爲尠見之良書。關於羅馬基督教布教之文献目錄，現無出其右者。第四，五，六卷爲亞細亞之部，第六卷未刊。

柏朗嘉賓（Plano de Carpine）及羅柏魯（Rubruck）之旅行記，學者間有定評之標準良書，爲：1. W. W. Rockhill,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as narrated by himself, with two Accounts of the earlier Journey of John of Pian de Carpine,（Hakluyt soc. Publ.）London 1900. 2. C. R. Beazley, Texts and Versions of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de Rubruquis.（Hakluyt Soc. Publ.）-London 1903. 後者併錄拉丁原文；前者記柏朗嘉賓紀行曰 two accounts 者，因其報告書，原有二種 一爲歸里昂前，一二四七年（宋淳祐七年）三月至十二月之間，起草於旅途中之簡約者；二爲歸里昂後執筆之詳細者。而最便利之書，爲 M, Komroff, ed.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The Black and Gold Library 中之一冊）。New York 1928. 但其參考書目，頗駁雜不正確。

（註三）參看・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Chapitre II. III.–Andre de Lonju-

meau, par Paul Pelliot,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on, 3e Série, T.VII(xxvIII), Nos 1 et 2(1931—1932)P. P. 3—84.

（註四）關於蒙古和琳，歐人最初記之者，爲柏朗嘉賓，但未親履其地；始至此地者，爲安德魯；記述親睹者，以羅柏魯爲最初。柏朗嘉賓寫作 Caracorum，羅柏魯寫作 Caracarum，據羅柏魯所記，此都分二街，一住薩拉森人，一住契丹人。前者有市場，多商人；後者住民僅工匠，此地有寺院十二，其二爲回教，一爲基督教，都城圍以土壘，開四門，於東門售黍及其他穀物，於西門賣羊及山羊，於南門販牡牛車輛，於北門市馬匹。城壘之外，爲蒙哥可汗之宮殿，世界各地之人，聚於此焉。

（註五）參看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Amsterdam 1852. Vols. III—IV; H. H. Howorth, History of fhe Mongols, Part III, London 1888. Abel-Rémusat, 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et particuliélement les Rois de France,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VI—VII. 1821—1822. Pelliot,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Se'r III, Vol 3, Nos, 1—2; Vol. 4, 1924, Nos. 3—4。

（註六）馬可波羅敍嘗任中國官吏，Pauthier 以見於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四年二月丁

亥條，，任樞密副使兼宣徽使領侍儀司事，，之孛羅，爲 Marco Polo ；又元史姦臣列傳至元十九年三月，王著張易等殺阿合馬（Ahmad）時，世祖命樞密副使孛羅等誅王著之孛羅，亦爲 Marco Polo，題其譯註之馬可波羅遊記曰：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本書，實誤。此孛羅並非 Marco Polo，見田中萃一郎，元の官吏登庸法に就いて（史學雜誌二十七之三，1915. 3）P. Palliot, Le livre de Marco Polo⋯par A. J. H. Charignon. (T'oung Pao 1927—8)。（Pauthier 記孛羅曰博羅者，乃據弘曆改訂本元史。）

（註七）關於其古鈔本之種類所在等，詳 Yule-Cordier, Marco, Polo, II. 關於諸刊本，詳該書該卷及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2 meéd., Vol III. 或該氏之 Bibltoheca Japonica 1912.

其重要刊本：1, W. Mersden, Travels of Morco Polo, a Venetian,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eing a Descripti·n⋯⋯of remarkalbe places and things, in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1818. 2, G. Pauthier, 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ce⋯⋯; Fuc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 d'après trois manuscrits inédits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de Paris. Paris 1865. 3, 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tion,⋯Newly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Notes. London 1871. 2 vols. 3rd. ed. revised throughou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by

Henri Cordier. London 1903. 2 vlos. 張星烺譯，馬哥孛羅遊記一卷，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H. Cordier, Ser Morco Polo. Notes and Addenda to Sir Henry Yule's edition. containing the results of Recent Research and Discovery. London 1920. 其姊姊篇也。）4. A. J. H. Charignon, Le Livre de Marco Polo,……annoté d'a 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Tomes 1—III. Pékin 1924 26. 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四卷，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5. L. F. Benedetto, Marco Polo il Milione. Prima edizione integrale… Firenze 1928. 6, A. C. Moule and 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4vols London 1938——

（註八）詳 Streit, Bibl. Missionum, IV, S. 11, Nr. 14。Yule-Cordier, Cathay, 1, Suppl. Note, XIV bis. 自 Bouquet,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XX, Paris. 1840 中之 Grillaume de Nangis 撰路易九世傳，引其法譯全文。又本文之 P. 162, Note 1, 自 Mosheim, Historia Tartarorum Ecclesiastica, Helmstadii 1741 附錄．英譯其一部而引用之。

（註九）參看 Brets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1, London 1883. PP. 164 ff,

（註十）史家海敦書原文（法文）有數種，收於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

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II (Docum. latins et français relatif à l' Arménie). Paris 1906. 拉丁譯（增訂本）亦錄於該書。關於中國之部分，Yule-Cordier. Cathay. 1, Note XIV, pp. 260—262 引用之。且有自拉丁譯重譯之 Yule 英譯（pp. 258—9）。詳見 Streit, Bibl. Mission., IV, SS. 42—44.

（註十一）參看 1.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4 vols, Amsterdam 1852.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商務印書館出版。2. F. G. Browne,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under Tartar Dominion (A. D. 1235—1502) Cambridge 1920. 3.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4. 岩村忍，イラン文蒙古史の諸版本，蒙古史雜考，昭和十八年二月，白林書房出版。

（註十二）參考 Huart, A Hist. of Arab. Liter., PP. 26—7

（註十三）關於志費尼（Djuvéni）之史書，Browne 詳述於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Jan. 1904. pp. 1—17。此書最古寫本（1290），現存巴黎國民圖書館。

（註十四）詳傳，見 Quatremere 書之序說； Browne 之書，亦介紹有新資料。

（註十五）拉施特（Rrshid）史記彙編，歐文中，最佳之譯，當推 Prof. I. N. Berezin. (Sbornik lietopisei.—Istoriya Mongolov sochinenie Rashid Eddina.

「俄羅斯帝立考古學會東方部論叢 Trudy Vostoch. Ctdiel. Imp. Russ. Arkh. Obshch., V, VII, VIII, XV. St-Peterburg 1858—1888」）。貝氏取波斯文原書數種，謹愼校對，而後翻譯。貝氏又通東方中國蒙古諸文字，故翻譯更較易易。波斯原文，亦同時刊出。關於拉氏史記之詳細目次及其古鈔本之所在等，見 Browne, Journ. Roy. Asiat. Soc., 1908, pp. 17—37.

（註十六）原文五卷全部，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於孟買石印出版。第一卷附德譯（Hammer-Purgstall, Geschichte Wassaf's, Persisch herausgegeben und deuscth übersetzr. Wien. 1856.），行於世。

四　十四、五世紀

——元至明初西人關於中國之知識

自馬可波羅歸還威尼斯前後，羅馬教會之布教中華，驟加熱度，東來教士甚多，更傳新知見於歐人之間。最著者，厥爲約翰孟德高維奴（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 1247—1328）（註一）

一二七二年（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東羅馬皇帝邁克耳（Michael Palaeologus）爲欲聯合希臘與羅馬兩教派事，遣約翰孟德高維奴（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使

羅馬教皇格利高雷第十世(Gregory X.)之廷，約翰是時已充聖方濟各會(Franciscan)僧矣，事未成，約翰受命復往東方，至一二八九年(元至元二十六年)，復歸羅馬，報告基督教在亞洲西部盛況，其他君主及人民，皆願崇奉基督教，樂聞聖道；旭烈兀，(Hulagu)之孫阿魯大王(Arghun Khan)待教徒之寬厚，尤侈言之。教皇尼古拉斯第四世(Nicholas IV)聞之，乃派約翰往東方傳教，給介紹書與阿魯大王、小亞美尼亞王后、雅各會(Jacobites)之教務大總管、討來思城(Tauris)主教、忽必烈大汗及海都大王(Kaidu)等，皆請善遇約翰。約翰東行至塔伯利資城(Tabriz，即討來思Tauris)，至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始由該處起身往遠東，投遞國書於忽必烈大汗，据其第一遺札，約翰乃由海道東來，在印度馬八兒國(Maabar)逗留甚久，第一遺札，書成日期，為一三〇五年一月八日(大德八年冬或九年春)，書有〝余居此布教，無人輔助，幾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龍城(Cologne)僧人阿爾奴特(Arnold)來此輔助。〞由此推之，約翰居中國已十三年，其到中國日期，當在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也。書中又謂彼於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離討來思往印度，在印度勾留十三月，即使彼於一二九一年底離討來思，閱十三月，當在一二九三年一月或二月(至元三十年)，仍當元忽必烈未故前，故約翰必得見忽必烈也。一二九四年(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鐵木耳即位，約翰留此地者約三十四載，至一三二八年(天曆元年)逝於大都，專心於羅馬正教之布教。其事業，初極難，孤立無援，備嘗辛酸；一三

○七年春（大德十一年），羅馬教皇得悉約翰在東方勞苦功高，乃特設汗八里卽大都總主教一席，卽以約翰充之，給約翰權力比於教務大總管，總轄契丹蠻子各處主教（Bishop）、高僧（Prelate）等，直隸教皇，小事不報，僅須承認教皇爲宗師，及自教皇承領袈裟，與袈裟傳襲須得教皇允許而已。並派主教數人往遠東佐助約翰，約翰之活躍益盛，與新教堂建立於大都街衢，紅十字架高立房頂，讚美歌聲，洋溢人耳，新約全書，譯成蒙文，是皆其成績也。享年八十餘歲，逝於此地，知與不知，無不哀悼，亦足想見其德望也。約翰居華，遺書簡二，一爲一三○五年（大德九年）一月八日發自汗八里者，記旅程等；一爲一三○六年（大德十年）二月十三日發自該市與聖方濟各派總長，記自己布教事業，關於聖圖之製作，教堂之建築，青年之教化等，亦有所敘述；並言及中國印度等地事情，最後懇請增派僧侶，以資助理。此書簡，於東方知識，無所增益；但足徵當時基督教在華狀況，實極貴重之資料也。

約翰之外，此時代須特筆者，其爲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 1265－1331）（註二）乎？氏意大利福柳利（Friuli）州頗代儂娥（Pordenone）人也。少時卽入聖方濟各會在烏丁（Udine）寺內修道，以能節慾苦行著名。一三一六年（延祐三年），卽起始旅行，一三二一年（至治元年）留居印度西部，後來中國，居北京三年，考其時間，當在一三二二年（至治二年）至一三二八年（天曆元年）。鄂多立克之紀程，起始於君士旦丁堡，由是而至忽里模子（Hormuz），乘船泛海，抵印度西岸塔納港（Tana），更至俱藍（Kulam），

錫蘭島及聖多默墓地（St. Thomas）．今稱馬達拉斯市（Madras）；由是而再東，至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占婆，終乃於廣州登陸，再至泉州，由泉州至福州；由福州經仙霞嶺，下錢塘江至杭州、金陵；更渡江，由揚州沿運河北上而達汗八里（Khanbalik 即大都）、在汗八里居住三年之久，是時約翰孟德高維奴尚生存，惟年已幾八十矣。後離大都西行，橫斷亞細亞內陸，經波斯返國。所記經西藏拉薩者，如勞佛爾（Laufer）所批判，蓋據傳聞耳！（註三）隨鄂多立克同行者，有愛爾蘭大僧哲姆斯（Friar James），事蹟無考，爲可惜也

鄂多立克布教東方途上之見聞，使人代書，遺於後世，所謂鄂多立克紀行，東方塔兒塔利奇聞是也。原名無定稱，普通謂之鄂多立克會友遊記（Itinerarium Fratris Odrico de Foro Julii. Ordinis Fratrum Minorum, de Mirabilibus Orientalium Tartarorum. Foro Julii 亦稱 Friuli）（註四）鄂多立克在錢塘江上流，見漁人用鸕鶿捕魚，在杭州見婦人纏小足；富貴之家，喜留長指甲；大汗國全境，劃分十二省，每省有瓦細兒（Wazir 宰相之意）四人管轄，皆爲中國確情，中世紀歐洲東來旅行家，無有言之者，即馬可波羅遊記，號稱最詳，亦無此等記載也。

鄂多立克東方紀聞盛行之結果，生滿德威爾（Sir John Mandevill）東方見聞錄出現之機緣。英國騎士滿德威爾生於一三〇〇年（大德四年），初業醫，後自一三三二年，（至順三年）至一三七二年（明洪武五年）四十年間，歷遊亞細亞各地，自著一書，發表其見聞

，據其書，先訪柏來斯丁（Palestine）聖地，往埃及從戎，旅行亞細亞，觀光於印度中國各地，居汗八里者三載。似屬實見目睹，而實皆架空妄談；可信者，僅其一部分，足跡所至，不過埃及、敘利細，其他皆借貸於前人所記。蒙古中國本部方面，基於柏朗嘉賓及鄂多立克，其貸於鄂多立克者尤多，謂爲鄂書之脫胎換骨，亦無不可。然此書一出，洛陽紙貴，竟喚起東方趣味於歐西人士間焉。

約翰孟德高維奴，鄂多立克等之外，此時代布教僧之須特記者，其爲元末順帝至正間來居大都之馬黎諾里（Giovanni de Marignolla）（註五）歟？馬黎諾里個人歷史所可知者，僅於其著作中，略得一二而已 馬黎諾里之族，爲中世紀意大利佛羅倫斯（Florence）望族，馬黎諾里約生於一二九〇年（元至元二十七年）之前，嘗充小級僧人（Minorites），奉使東方之記載，在波希米亞史（Chronicle of Bohemia）中，全無次序，不能稱之爲遊記。一三三八年（至元四年）奉教皇命東來布教，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入汗八里，九月十八日（七月十八日丁亥）順帝引見於慈仁殿，納其所獻名馬，事見元史卷四順帝紀及歐陽玄圭齋集卷一。留汗八里者四載，一三四六年（至正六年）就歸途，過黃河，訪杭州泉州，海路西航，一三五三年（至正十三年），抵阿維南（Avignon）。遞呈大汗國書於教皇英諾森德第六世（Innocent VI），國書中敘述大汗崇仰基督教規，愛敬其徒，承認其基督教臣民可以服從教皇訓令，並請增派傳教師至遠東云。一三五四年（至正十四年），日耳曼皇帝察

理第四世（Charles IV）至羅馬城，行加冕禮時，得遇馬黎諾里。察理人品卑鄙，然聰明好學，在位時奬勸學術。至是聞馬黎奉使遠東，故招之，遂隨歸日耳曼，奉命著波希米亞史。

約翰柯拉（John de Cora）者，駐波斯國孫丹尼牙城（Soltania）總主教也。著有大可汗國記（The Book of the Estate of the Great Caan）一書（註六）。原書爲拉丁文，在其早時期，卽有依勃雷（Ypres）地方高僧長約翰（John le Long）譯成法文。近代各書所傳者，皆譯自法文，而拉丁原本，則久已散佚。約翰柯拉籍隸意大利甘勃那省（Roman Campagna）柯拉邑，爲多敏我派僧人。以一三二九年（天曆二年）八月九日，受教皇約翰第二十二世(John XXII)之命，爲波斯國孫丹尼牙地方之總主教。孫丹尼牙城在古代米底亞國（Media）境內。爲一三〇五年時（大德九年）旭烈兀（Hulagu）之曾孫鄂爾介都（Odjaitu）所建，鄂爾介都建此城後，常駐於此。以後不賽因（Abu Said）亦常駐此。故此城幾如波斯之都城　大可汗國記約作於一三三〇年（至順元年）左右　計自一三〇八年（至大元年）卽在東方，嘗爲調和亞美尼亞教堂與羅馬教堂事，頗著勤勞。久與異教之人相處，故東方情形最爲熟悉。亞洲西部各國之戰爭，皆身親其境。渠亦教會中人，倘渠果曾親至中國，亦必以教務而來者也。大可汗國記所記凡十條；一、國中政治，二、契丹國教皇，三、契丹國風土，四、汗八里及喀綏（Cassay）二大城之治理，五、國中所用貨幣，六、人民生活狀況，七、葬法、八、國中小級僧人（Minor Friars）狀況，九、國中聶派叛教者之

狀況，十、大可汗對基督教徒之恩存。

西班牙國駐阿力麻里城（Armalec）傳教師巴斯喀爾（Pascal），西班牙國維多利亞城（Vittoria）人也。髫齡入聖方濟各教會，及壯被遣往中央亞細亞察合台汗國，阿力麻里都城宣道。瓦丁（Wadding）聖方濟各教會史(Annales Minorum=History of the Franciscan Order）第七冊，有巴斯喀爾事蹟，及遺札一篇。一三三八年（至元四年）八月七日，嘗由該城寄書維多利亞友人，報告情形，書發後，未及一年，為回教徒所戮。馬黎諾里於其死義後一年，奉使往北京，過阿力麻里城，亦得悉其事，故於其奉使記中，有旌表之語。約翰文透吐爾（John of Winterthur）宗教史亦載之。意大利皮撒市（Pisa）人巴拖羅謀（Bartholomew）在十四世紀末葉，著聖徒傳，亦詳記巴斯喀爾死義情形，所記與瓦丁無多出入。其遺札曰：“……………阿力麻里城在米底（Medes）帝國（察合台汗國）之中央，契丹總牧師管理區（Vicariat of Cathay）境內，計由玉龍傑赤、波斯（伊兒汗國）、韃靼（欽察國）邊界起，以至阿力麻里之全途間，余皆終日與薩拉森人為伍。所有言語、行動、衣服，皆遵耶穌基督而行。薩拉森人時以毒藥供余，投余於水，飽余以拳，以及種種損害，有非一函書札所能盡述者。”

然當時來華活動，傳其見聞於西方者，不僅布教僧人，他如威尼斯、基奴亞、皮撒等地商人，自海路活羅於東方者亦甚多；陸地橫斷中亞高原，商販中土之歐西賈人，亦不鮮。此

種情形，據約翰孟德高維奴、馬黎諾里等人記述可知。最足證實者，厥爲裴哥羅梯（Balducci Pegolotti）之商業指南（Pratica della Mercatura）（註七）。是書也，歐洲商人往來極東之結果，東方貿易之指南針也。其中關於中國印度中亞之知識，當然爲商人齎回資料之集成，而使此書出現之必要及可能之環境，亦彼等東方活躍之所賜也　今據此書一瞥當時之東方商路。「由塔那（Tana）至靖塔昌（Gintarchan＝Astrakhan），乘牛須行二十五日，乘馬車約十日或十二日，途間頗有盜匪，由靖塔昌至撒雷（Sara），有河道可通，乘船一日即至；由撒雷至撒拉康科（Saracanco），乘船八日可至，不由水道，陸道亦可至，然由水道，貨物運費頗小也。由撒拉康科至玉龍傑赤（Organci）乘駱駝車二十日可至，帶貨而行，必可獲利。玉龍傑赤商務繁盛，貨到即可消出，由玉龍傑赤至斡脫羅兒（Oltrarre），乘駱駝車，三十五日至四十日可至，若無貨物隨行，可由撒拉康科直至斡脫羅兒，僅十五日程耳！較之繞道玉龍傑赤便捷多矣。由斡脫羅兒騎驢帶貨，四十五日可至阿力麻里（Almalec），途間盜匪甚夥，幾於每日皆可遇之；由阿力麻里騎驢七十日可至州甘(Camexu)，由甘州騎馬四十五日至一大河名曰〇（原文河名缺，意即長江也。），復由河道下行，至京師（Cassai＝Cansai＝Quinsai　即杭州），其地商務最盛，可將隨身之銀錠換紙鈔，鈔名巴立西（balishi），紙鈔四張，值契丹銀錠一索摩（Sommo），由京師至汗八里（Cemalec＝Cambalec）王都三十日程，」按此路程爲多數人所經由者也。

西班牙之加他蘭地圖（Carta Catalana 1375）爲地學學重要資料之一，記入前此未知之裏海沿岸諸地，或係基於基奴亞人之報告。皮徹嘎尼（Pizzigani）兄弟之地圖（1367）所繪裏海更爲詳細。此二地圖之編者似利用多種材料，據此可知基奴亞人所想之裏海，較實在約大二倍。加他蘭地圖爲愛脫利亞海周航記後最初繪印度爲半島形者也。（註八）

元代回教徒旅行家依賓拔都他（Ibn Batūteh 1304–1377）亦甚著，本名曰阿布阿伯特拉摩哈美德（Abu–Abdullah Mahomed），摩洛哥國（Morocco）丹吉爾港（Tangier）人也。生於回教紀元七〇三年七月十七日（西元一三〇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德八年正月），歐洲人所稱中世紀四大旅行家之一也。馬可波羅以外，其鄂多立克及尼哥羅康梯（Nicolo de Conti）二人，皆不及拔都他行程之遠，在外之久，及其記載之詳明也。拔都他遊記卷帙之多，較之馬可波羅遊記，且有過之；唯關於中國部分之詳確，不如波羅而已。拔都他之旅行，始於年方二十二歲，時在回教紀元七二五年七月二日，即西元一三二五年六月十四日（泰定帝二年五月）也 由摩洛哥東行，橫越非洲北部，周遊柏來斯丁（Palestine）、敘利亞（Syria）、默底那（Medina）、麥嘉（Mecca）、波斯、美索不達尼亞、小亞細亞、南俄羅斯、中亞、印度、錫蘭、蘇門答臘等地；經占城至泉州，上陸，歷訪廣東、杭州、汗八里（大都）；再自印度，經西亞、埃及，歸摩洛哥，回教紀元七七六年即西元一三四九年（至正九年）十一月入非斯（Fez）。其後又至西班牙，轉至非洲中部，回教紀元七八一年即西

元一三五四年（至正十四年），再回非斯（Fez）。未久，摩洛哥蘇丹命將其紀程，筆之成書，唯記錄者，非拔都他本人，乃蘇丹之秘書摩哈美德依賓玉隨（Mahomed Ibn Juzai）也，拔都他僅口述而已。回教紀元七五七年即西元一三五五年（至正十五年）十二月，此歷時二十八載，行程七萬五千哩之大遊記，於焉告成（註九）。書成之年，玉隨亦死，依賓拔都他享壽之高，遠過於其筆錄人，唯自是以後 亦不復遠遊，爰常居摩洛哥焉。拔都他遊記全書，醇逾於疵，可信者多，証明馬可波羅遊記及其他中世紀遊歷家者不鮮也。除各種草率謬誤，及偶爾廣泛不精之記載以外，全書中，僅中國北部之記載，因謂使象載重，亦如麥爾爪哇（Mul-Java即暹羅）使人可決其為偽造耳。

承蒙古勃興之後，至十四世紀中葉，東西交通猶盛，東方知識，傳播歐西；自蒙古帝國內亂分裂，此傾向日漸衰微，教皇屢傳布教師之東派，而方向寂焉不明。一三六八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元朝瓦解，朱明統一中華，對基督教，表示排擊，東西聯絡，乃生障礙 加之，中亞西亞回教團之抬頭顯著，極東與歐西之連繫垂絕；東方事情之西傳，殆至絕跡 其後百數十年，因東印度航路之發現，葡萄牙商船現其帆影於印度洋南中國海，世人甚至無知此等土地名稱之嘗為歐西人士所熟悉者。然十四紀中葉至十五世紀末，約一世紀半之間，詩人文士，有時於作品中，點綴以契丹之名；或有自西班牙德意志出使帖木兒之廷者，將傳聞之中華事物，筆之以介紹於西人；或聞之東方旅行者，傳契丹事情於世；或

發揮此等知識於圖上，於地圖學史上，占特異之位置。其中最著者，爲克拉維局（Ruy Gonzalez de Clavijo）。

克拉維局（Ruh Gonzalez de Clavijo 1412故）奉西班牙王命，通好於帖木兒，以一四〇三年（永樂元年），抵撒馬兒罕，留於該城凡二年，至一四〇五年（永樂三年），始歸。將傳聞之中國事情及目擊之各種事務，綴成塔木爾蘭大帝史（Historia del Gran Tam-orlan）一書（註十），據此，關於中國所記雖不多，而於帖木兒行將實行之侵明計劃，領內諸種事情，却詳悉靡遺。研究中亞西亞之史家，甚珍重之。卽帖木兒領內整然之驛傳制度，撒馬兒罕之壯麗建築物，集於此地之學者美術家工匠，帖木兒之宮殿，小亞細亞凱旋後，侵明出發前盛大之燕飲情況，以及帖木兒自身及其諸子諸姪之性行，維持秩序之嚴酷諸規制等，亦皆有正確詳密之記載。一四〇四年（永樂二年）末，去撒馬兒罕，就西歸之途。途中聞帖木兒東行途上殂落，後繼者間內訌勃發，物情騷然云。

明初，又有德國遊客約翰細爾脫白格（Johann Sildtberger）者，嘗至中央亞細亞察合台國；執役於帖木兒（Timur）之軍隊中多年，至一四二七年（宣德二年），始歸德國，著有遊記一書（註十一），其中略記中國，蓋在帖木兒朝廷時所親見者也。

鄂托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昂哥拉戰敗後，甫半世紀又復中興，陷君士坦丁堡，滅東羅馬帝國（1453），歐洲歷史遂惹起一大變動。長期角逐於地中海之威尼斯共和國，

仍以遠交近攻爲策，於帖木兒瓦解後，與波斯同盟，特派使節，駐於塔伯利資，多有留東記或東方紀遊之作，供史家以研究資料，中國傳聞，混在其間。其著者爲覺撒發巴巴羅（Josafat Barbaro）（註十二），駐塔伯利資前，一四三六年（正統元年）至一四五二年（景泰三年），以營商，經南俄羅斯，旅於波斯，紀行所錄，主要爲此時期之見聞。巴巴羅之書，以著者爲有充分教養之士，頗多優點；但因逞其學識，反致有記述不正確之缺點，即記載直接見聞，猶以爲未足；更添加以文獻上之知識，以極粗漫之方法，作古地名之比定，甚之根據，殆不足信。巴巴羅於一四三六年（正統元年），嘗奉使波斯，路過黑海北岸塔那港（Tana），得遇韃靼人某，其人嘗受窩瓦河畔蒙古王（按即拔都後裔）之命，出使中國，至北京，巴巴羅與之會談後，大悅，訪問中國情形頗詳，一四八〇年（成化十六年），巴巴羅自著奉使波斯記（History of the Embassy to Persia），韃靼某君談話亦列入之。

東方知識，又依商人傳至後世，威尼斯商人尼哥羅康梯（Nicolo Conti）之東方諸國歷遊記（註十三），其最著者也。康梯爲商人中鮮見之教養之士，以旅行歐羅巴敘利亞印度間著名。爲最初遊歷印度內地，泛舟恒河之上者，時當一四三〇年（宣德五年）左右也。一四三八年（正統三年）博嘉勃拉其奧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以拉丁語記其口述，收於所著變轉之命運（De Varietate fortunae）第四卷，康梯有歐洲傳統之教養，達於東方

語言，其所見聞，多有可傳。康梯未言明曾否抵契丹，然關於中國，則有一節記錄也。亭利裕爾謂據其內容，康梯必已曾達中國，而亭利考狄則又以爲未至中國，蓋苟曾親至中國，不當再用馬可波羅遊記之古地名，而應用中國人新名，如以後之葡萄牙人也。康梯敍汗八里西亞（Cambaleschia）之景況後，記新營都城南勃台（Nemptai），實際乃指南京，但其名稱，非如裕爾所考，寫南京之音；殆如考狄所謂，乃福州港口閩江右岸之南臺，地與名之相違，亦其未至中國之一證也。

如上所述，東方知識，雖極貧弱，然却能反映於此時代之地圖製作上。康梯遊歷恒河及伊勒瓦第河（Irawadi）流域，頗爲周詳，威尼斯人佛拉毛羅（Fra Mauro），採用康梯之說，製世界圖，今仍存於該市大公爵宮內。再觀十五世紀時始出現之地球儀，即爲奉職於葡萄牙之德人馬丁貝海姆（Martin Behaim）所創，表面所繪，蓋綜合當時之地理知識而爲之者，惟東方諸地，則事實想像相混，未爲正確，可考見此時代知識之水準矣。

此章之末，宜略敘帖木兒嗣子派往中國朝廷使節之見聞記，世所謂沙哈魯(Shah Kukh 1377～1447）使節記是也（註十四）。帖木兒子沙哈魯王派使於明永樂帝時之記事也。成於一行中之畫家火者蓋野素丁（Khwaia Ghaiassuddin）之手，收於阿伯特拉柴克（Abdur Razzak）之沙哈魯史中，傳於今世。

（註十）Streit, Bibl. Mission., IV, SS.39－40 舉有多數參考書，最便者，推A.C.

Moule, Documents releting to the Missions of the Minor Friars to China in the XIII. and XIV. Centuries (Jonrn. Roy. Asiat. Soc., 1914, pp. 546－551) 及該著者之 Chrisc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 Chap. VII: The Mission of the Eranciscan Brothers (pp. 166 ff.)

（註三）傳記，以 A. C. Moule, A Life of Odoric of Prodonone (T'oung Pao. Sér II XXII., 1921, pp, 275 290）最佳。

（註三）詳見B. Laufer, Was Odoric of Prodenone ever in Tibet? (T'oung Pao, Sér. II, XIII, 1914, 405 418）概要見 Xule-Cordier, Cathay, IV 268－9。

（註四）關於旅行記之諸版本，宜讀 Streit, Bibl. Mission., IV, S. 678, A. C Moule, A Small Contribution fo the Study of the Bibliography of Odoric (T'oung Pao Sér. II, XXII, 1921, pp. 301－322）及該氏之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Odoric (T'oung Pao. Sér. II, XXIII, 1922, pp. 387－393）刊本中以校刊精審譯筆正確鳴者，為 Yule-Cordier, Cathay Vol. II 所收本。法文譯文，則推 Cordier, Les Voyages en Asie au XIVe Siècle du B. Frère Odoric de Pordenohe. Paris 1891。最易得者，為 Komroff, ed., The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

（註五）參看 Streit, Bibl. Miss., IV, 80－81.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252-

264. G. Dobner 校刊本，見 Monumenta Historica Boemiae, II, 1768, 79－282. J. G. Meinert 東方部分之德譯，見 Abhandlungen d. K. Bohm. Gesel. d. Wisse-nschaften, VII. Prag 1820。Yule之譯，收於 Yule-Cordier Cathay, III，209－269。根據中國文獻研究之者，有張星烺，中國史上關於馬黎諾里（Marignolli）使節之記載（燕京學報第三期）

（註六）法譯有 Louis de Backer L'Extreme Orient au Mopen age. Paris 1877. 英譯有 Yule-cordier, Cathay. VoeII。

（註七）基於此書，論當時東方貿易者，有 F. Friedmann, Der mittelalterliche Welthandel von Florenz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Ausdehnung（nach der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des Balducci Pegolotti）（Abhdlg. d. K. Geogr. Gesel. Wien. X. 1912）

（註八）參看：O. Pashel, Geschichte der Erdkunde. Müchen. 1903。

（註九）C. Defrémery et B. R. Sangunetti, Voyages d'Ibn Batoutah, texte, arabe, accompagne d'une traduction. Paris 1853—58, 4 vols, 爲有名之法譯精校本。

（註十）英譯：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 D. 1403—6, trans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Clements R. Markham. London 1859, Hakluyt Soc. publ., I: XXVI.

（註十一）德譯本：Reisen des Johann Schiltberger in Europa, Asia und Afrika von 1394—1427, Zum ersten Male nach der gleichzeitigen Heidelberger Handschrift herausgegeben und erläutert von Karl Fr. Neumann. München 1859. 世稱 Bibliothek des Litterarischen Vereins in Stuttgart 之一百七十二卷 Haus Schiltbergers Reisebuch nach der Nürnberger Handschrift, herausgeg von Dr. Valentin Langmantel Tübingen 1885. 爲最善本。

（註十二）參照 Cordier, Bibl. Sin^2., Ⅲ, 2051—54. 全譯本：Travels to Tana and Persia, by J. Barbaro and Ambrogio Contarini. Translated from Italian by Williams Thomas, ……………and by E. A, Roy……………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on by Lord Stanley of Alderley; A Narrative of Italian Travels in Persia,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harles Grey. London 1873. Hakluyt Soc. Publ, 1: XLLX

（註十三）英譯附註本，收於 Richard Henry Major, Ind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eing a Collection of Narrative of Voyages to India in the Century preceding the Portuguese discover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from Latin, Persian, Russian & Italian Sources. Now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London 1858, (Hakluyt Soc. Publ. 1: XXII) Yule 拔萃，見 Yule-Cordier, Cathay. 1, Note XIV quater。

（註十四）參看：Cordier, Bib. Sin[2]., III, 2050—1.

五　十六、七世紀

——明至清初歐西之中國研究

東印度航路之發見，遠因於指南針之發明普及與航海王獎勵東方航路之發見；近因則促其速現者，為鄂托曼土耳其之占據西亞東歐。向來歐亞交通有三大路：一、取道埃及出紅海。二、由地中海東岸登路，至幼發拉底河，順流出波斯灣。三、由黑海取道美索波達米亞（Mesopotamia）出波斯灣。東羅馬亡後，三大路全為土耳其人所扼。歐人之經營東方商業者，不得不更覓他途。是時航海之術日精，歐洲各國政府亦多以獎勵航海為事。此際擁有地利早收成果者為葡萄牙，繼之者為西班牙。從來以地中海為中心之歐洲歷史，於茲一轉，威尼斯基奴亞之覇權衰，海上雄飛之新王國興於伊伯利安半島（Iberian Sen.）因北美大陸之

發現；南美新地之征服，出現大西洋時代；同時因東印度航路之新發現，出現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時代，古來兩兩相對發展之東西兩洋勢力文物，合而為一，眞正之世界史，於焉開幕。（註一）

隨葡國商船隊至中國者，為耶穌會及其他基督教各派教士。（註二）夫西教之入中國也久矣，在唐為景教，在宋為一賜樂業教，在元為也里可温教，是皆在中國書籍碑版，信而可徵者，外史載元代耶教人入中國者尤多　然其教在中國無大關繫，僅如摩尼祆教等，得一部分之信從耳。景教經文傳入中國，雖有譯本，亦未傳播。一賜教經，僅藏於寺，其數更不逮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響。其存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中國耶教之濫，實由於歐洲之宗教改革。

歐洲對宗教改革而起之舊教方面之反對，產生耶穌會（Societas Jesus）之組織（註三）。會祖羅耀拉（Ignacio Loyola）摯友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篤志於東方布教。氏西班牙人，一五四〇年（嘉靖十九年）三月自羅馬赴里斯本，翌年四月）發里斯本，一五四二年（嘉靖二十一年）五月，至臥亞從事布教，一五四五年（嘉靖二十四年）九月渡澳門，更至摩鹿羣島（Molokai Is.）。歸澳門途中，遇來訪之日人安次郎（Angero,Angiro），二人先後返臥亞，安次郎學葡萄牙語及基督教教義，旋領洗，沙勿略（Xavier）得布教日本之許可後，一五四九年（嘉靖二十八年）四月發哥丁（Cochin），

八月抵鹿兒島，翌年至平戶山口，更向京都，自堺歸平戶，再向山口，一五五一年（嘉靖三十年）有葡船至日出，遂前往乘船返哥丁（Cochin），居日本僅二年二月，得信徒甚多，建日本西教弘佈之基。更欲佈教中華，一五五二年（嘉靖三十一年）二月赴澳門，七月出發，八月至上川，死於熱病。

葡萄牙人教士之活躍於日本也，最初毫無障碍，基督教佈教，非常成功，十六世紀日本嘗派基督教徒使節團西赴歐洲。及九州豐後藩主轉宗於基督教，令破壞日本古來之社寺，一五八九年（萬曆十七年）始有破壞教堂令之發佈，傳道師遂自日本入朝鮮，是爲歐人通朝鮮之始。有明中葉倭寇朝鮮（1592—96），傳道師徹斯培底斯（Céspedes）嘗隨倭人至朝鮮，初期傳教士稱朝鮮以舊名，曰高麗（Coria）。

沙勿略後任之范禮安（Alessandre Valignani 1538－1606）派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馬竇（Matteo Ricci）二人自印度赴中國，以繼沙勿略遺志。羅明堅於一五八〇年（萬曆八年），利馬竇於一五八三年（萬曆十一年），先後抵澳門，履中國境焉。西人之中國研究，自此始。從來歐人關於中國之所記，非旅行之見聞，卽事業之報告，距研究之域尚遠。稍具研究之體者，始於此時；且依新來教士開其端。故耶穌會士之東渡，於中國宗教史學藝史上，有極大意義；而論至歐西東方知識之發展，則更屬劃期之事件云。

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那坡利（Naples）王國人，一五七二年

（隆慶六年）入耶穌會，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三年）赴印度，更向中國布教，初居澳門，修中國語，後往廣東肇慶，爲入華最初之耶穌會士，開始布教此地，所著天主聖教實錄（一五八四年，萬曆十二年）爲近代基督教義最初之漢文著作。一五八八年（萬曆十六年）歸羅馬報告，未得再歸。中國布教事業，乃專歸利馬竇之手。

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註四）亦那坡利人，十九歲時（一五七一年，隆慶五年）於羅馬入耶穌會，修業將半，往印度，一五七八年（萬曆六年）抵臥亞（Goa）。四年後，被派往中國，先至澳門，然後自廣東，移肇慶府，著佛僧之衣，習華語，盡力於市民之教化。後脫僧衣，衣儒服，經廣東、南昌，至南京，自布教政策上，先訂交於當地顯官。一六〇一年一月四日（萬曆二十八年末）入北京，謁朱翊鈞，翊鈞喜其方物自鳴鐘之機巧，更欲賜見其他教士，禮部阻之，未果。然翊鈞從利氏請，賜一小屋於京城宣武門內，並賜以內帑，翌年，許其建設教堂，彼等以此爲根據地，弘布教旨，四年得信徒約二百人。要路大官當世名儒與利氏通好者甚多，朝官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諸學者之歸依改宗，爲彼等之一大成功，大有助於其事業之進步擴充焉。利氏更加努力，著交友論、天主實義等書，使華人知其教法，信者之數漸增。且以其精通天文曆算，更受中華人士之尊崇敬重，利氏與徐李二氏共著譯乾坤體義、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有用之科學書，介紹泰西學術，爲西學東漸史上劃一紀元。利氏客死北京後，葬於平則門（阜成門）外，宦官滕氏宅址，通稱柵欄兒之地

。利氏之布教方法，斟酌中國從來之思想習慣，與基督教教義調合之，故成績大舉，深培法門之根蒂焉。

始至中國，從事布教之西人，爲耶穌會士羅明堅利馬竇之徒。然先此雖未布教，而親至中華，觀其風俗習慣聞其歷史沿革者，有數人焉。其著者，爲自新西班牙（墨西哥），隨伴經略菲律賓羣島軍旅之拉達（Martin de Rada〔Herranda〕）。一五六五年（嘉靖四十四年），隨遠征軍，至菲律賓，旋奉派至福建，與同僚馬林（Geronimo Marin）於一五七五年（萬曆三年）七月上陸，經漳州，達福州，九月去而返菲律賓，居中國不足二月半，且未及布教，但成績頗有可觀，馬林歸國，報告國王腓立二世（Philip II），實卽門多薩（Juan Gonzales de Mendoza）中華大帝國史之基礎也。

門多薩（Juan Gonzales de Mendoza 1540—1620），西班牙人，奉命東來，一五八一年（萬曆九年），携腓立三世與中國皇帝親翰，先赴墨西哥，傳聞中國事情，悟當時入國之困難，遂不渡華，空返故國（一五八二年，萬曆十年）。但以拉達（de Rada）之報告及於墨西哥所蒐集其他二三見聞爲基礎，自著一書，名中華大帝國史（Historia del Gran Reguo de China 略稱）（註五），一五八三年（萬曆十一年），初公刊於羅馬。此書爲歐西東方學史上重要文籍之一，實西洋關於中國專籍之嚆矢，包括詳述中國禮俗之西書也。其第十三章漢字之條，有意表天、皇帝、都府之漢字三，世人以此爲西洋印刷介紹漢字最初

之書。除解作郡府之字形，類似城字外，形態發音皆不似漢字，頗難索解。但字形雖不正確，其彷彿漢字之企圖，甚易了解，未可視爲全然之誤謬意想也。

賴麥錫（Ramusio）者，明世宗時，馬可波羅同里威尼斯市之地理學家也。纂有遊記叢書（Navigationi et Viagi），馬可波羅遊記在第二本內。其序言列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d，意大利文爲 Chaggi Memet）談話記，吾人讀之，可以知悉當時中國與西方陸道交通之情況也。哈智摩哈美德（Hajji Mahomed）波斯裏海濱歧蘭省（Chilan）陀拔思城（Tabas）人也，其人嘗親至肅州，談肅州居民之衆，寺院之多，房屋之用磚，物產多大黃，又談及甘州房屋之構造，漆工之衆多，國王之尊榮，寺院之宏大，以及印刷術、魔術、喪服之制。

荷蘭人白斯拜克（Augor Gislen De Busbeck）於一五六〇年頃（嘉靖四十年左右）奉日耳曼皇帝查理第五（Chrrles V）之命，出使土耳其國，駐於君士旦丁堡多時。嘗自土耳其某遊客得聞中國之事一節。後歸國，一五六二年（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德國富蘭克羅特城（Frankfoit）嘗致書於友人，記其事，土國遊客言契丹人精於各種技藝，開化文明，深知禮讓，自有宗教，有印書術已數百年，印書之紙皆極薄，爲蠶絲所製成，僅能一面印字，他面則留空白；城內旅館甚多（城名闕），產麝香，其國不產獅。

當時葡萄牙人握印度之制海權，雖莫臥兒帝國之人民，無葡人之同意，亦不克由海路巡

禮參加，莫臥兒帝國內回教以外之宗教，亦享受同等權利，基督教士之佈教印度者甚多，其中之鄂本篤（Benedict Goes）活動於印度數年後，受命赴契丹（Cathay）之國，中國方面雖有西洋商人、教士之活躍，但當時歐人未嘗注意於自己再發現東達契丹之道也。當時歐人於印度聞支那（China）之稱號，知其同於拖雷美（Ptolemaios）所謂之秦（Sin），而未嘗注意於支那之同於馬可波維（Marco Polo）所記之契丹（Cathay）也；以爲以汗八里爲首府之大汗之國契丹，位於彼等發見之支那之西北某地焉。鄂本篤（Benedict Goes 1561—1605）（註六）葡萄牙國人。一五六一年（嘉靖四十年）生於大西洋亞索烈羣島（Azores）中 聖米圭爾島（St. Michael）之法蘭克多康姆波城（Villa Franca do Campo）。一六〇三年（萬曆三十一年）春，自臘和兒（Lahore）起程，一六〇五年（萬曆三十三年）末至肅州，途中居察理斯（Cialis）者，約三月。遇歸自汗八里之隊商，知利馬竇居北京，且因此邂逅，知汗八里卽北京，目的地之契丹卽秦亦卽支那，換言之，至此時，始發現契丹之爲支那也。此鄂本篤之旅行，爲自當時至十九世紀利用赴華陸路惟一之例，因其中間地帶，屬於回教國，傳道事業既無希望，至於商人，則中央亞細亞之遊牧民，亦非良顧主也。

一六一六年（萬曆四十四年），萬曆帝朱翊鈞從南京禮部侍郎沈漼奏言，禁基督教，命布教師退出中國，幽之澳門，徐光啓上書，帝意稍緩，一六二三年（天啓二年）撤回禁令，

西教恢復舊勢。時東北邊警頻傳，烽火連天，天啓帝朱由校痛感武器改善之必要，於解除禁令之年，遣使澳門，召還嚮所流放之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等，新召西班牙人陽瑪諾（Emmanuel Jr. Diaz 1571—1659），葡萄牙人羅如望（Joao da Roche 1566—1623）諸人，命鑄造小銃火炮；翌年，更迎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o 1582—1647）等，使從其業，同時於基督教勢力挽回，與有力焉。

門多薩之次，著類似之書，屢與並稱者，爲葡萄牙耶穌會士魯德照（Alvarez de Semedo 1585—1658）。氏生之時，正門多薩書初刊之歲也。經臥亞，一六一三年（萬曆四十一年）至南京，先稱謝務祿，明末迫害西教徒之際，幽於澳門，及被釋放，乃改名魯德照，住杭州上海等地，從事布教。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派至西安，實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註七），是碑先此三年或謂五年（明天啓五年或三年）偶然發現於西安郊外者也。留二載，歸江蘇，六年後歸羅馬，覓欲布教中國之教士，一六四四年（清順治元年）爲中國布教區副監，再至中土，晚年於廣東司教務，逝於該地。魯氏有多數著作，最著名者爲葡文中華帝國志（Imperio de la China），是書於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始出版於西班牙京城馬德里，爲世歡迎，亦如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其意譯，最值注意，介紹中國語言文字之章，揭出士王玉等漢字原形，附記正確意義，是爲西籍正確印刷漢字之嚆矢，甚引起學者之興味。

先於魯德照，目睹景教碑之耶穌會士爲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志於中華布教，一六一一年（萬曆三十九年）初至南京，次赴杭州北京等地，更爲徵募傳教師，旋歸羅馬，歷謁各國君主，同優秀教士三十二人，一六一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再還中土。羅雅各、湯若望等人，卽在此一行中，其後往來南昌杭州，一六二三年（天啓三年）至開封，入西安，居至一六二七年（天啓七年），親睹當時偶然發現之景教碑，歐人最初之目擊者也。一六二五年（天啓五年）之碑文拉丁譯，殆出其手，實爲此碑銘譯文之權輿。後世學者論景教碑者，皆據魯德照之記事及其譯文，但金尼閣之功績，亦不可泯也。彼更記述當時基督教中國傳教史，名耶穌教徒中國遠征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主要基於利馬竇自記之回想記，述明末基督教之中國開教史。

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491或1592—1666）者，德意志人，其天文數學機械學砲術之卓越知識，使中華有識之士，認知西學之眞價，更提高傳教師之地位焉。氏一六一二年（萬曆四十年）至中國，天啓末年入北京，援助瑞士耶穌會士鄧玉函（Jean Terrenz [Schreck]），與意大利出身會士羅雅各（Giacomo Rho）共製象限儀、紀限儀、地球儀、平面日晷、望遠鏡等，並著譯進呈西洋側日曆、古今交日考、交食曆指、交食表、新曆曉或、新法曆引、崇禎曆書等。傾其蘊蓄，貢獻於天文曆算，正從來漢人欽天監之誤，所推密合天行，博上下之尊信，一六四三年（崇禎十六年）遂以勅令，廢洪武以來之大統

曆，代以西法。唯明社將屋，終未見施行耳！明末信奉西教者數千人，其中，宗室百十四人，內官四十八，顯官十四人，足見其勢力之一斑。一六四四年（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明亡於李闖之手，滿族入主中原，多爾袞深知西教教士之眞價，廢舊曆，頒行西法曆書，湯氏又重用於新朝，受福臨殊遇，管欽天監印信，賜聖堂邸宅之地，加太常少卿銜，敘通議大夫，旋拜光祿大夫，贈通玄教師之號，眷寵備至。然其晚境，則頗坎坷。康熙初年，新帝幼沖，守舊派領袖欽天監楊光先率一黨，排斥西教西學。自作闢邪論欲陷湯氏，策動奏功，一六六五年（康熙四年）西教士等一併拘禁。湯氏與當時在北京之比利時耶穌會士達於天文曆算之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皆下獄，聖堂毀，西書火，中央地方官吏之歸依西教者皆革職罷免，耶穌教及其教徒，於茲蒙一大難。傳教士因突發之地震，雖一時釋放，而罪案依然。湯氏於幽憤中，以七十五歲之高齡，事件發生之翌年（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八月十五日，客死北京。然以舊曆法常誤日蝕等之推步，正當誅權臣鰲拜，入親政期之康熙帝玄曄，乃舉南懷仁管欽天監，又命司火砲之鑄造，延其他傳教師於內廷，講泰西學術。曄熱心學習，尊重耶穌教徒，但所重乃其齎來之西洋科學，非耶穌教本身。故雖於法律範圍內，未嘗抑壓耶穌教之國內傳道，但亦未嘗信奉之也。

明亡清興之際，明之宗室，據華南各地，欲挽狂瀾於旣倒者，不止一二，就中永明王由榔期間最長，王太后及內官龐天壽，嘗致書羅馬教皇英諾森德十世請求援助。齎此王太后

及麗天壽書，遠渡歐洲者，爲耶穌會傳教師波蘭人卜彌格（Michele Boym 1612—1659），卜彌格於此機會傳中國事情於西方。一六五〇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一月，携親書，發廣東，自臥亞，陸路經波斯，一六五二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九月至小亞細亞之士麥拿（Smyrna），二十九日，於此地教會，講演中國事情，該講演一六五四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於巴黎出版，題曰中國宗室之改宗及中國基督教現狀略說（Relation Briefe de la notable conversion des personnes royales et de l'estat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en la Chine），卜彌格自此由海路向威尼斯，一六五三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一月至羅馬，呈王太后等函於教皇，教皇廳至一六五五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始與答書。翌年卜彌格於維也納印行中國植物誌（Flora Sinensis）小冊，介紹中國珍奇植物，兼及動物，歐洲學者，爲之一驚，尤關心於附載之關於發現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記事，揭於維也納刋原本此碑之篆額，更引諸家注意，德國祈爾歇（Athanasius Kircher）其第一人也。以既有材料爲基，加以研究，揷於所作書中以來，此碑之名益著矣。

祈爾歇（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6）爲考古學者，嘗詳考景教碑，收入中國圖說中，以銅版揭出碑銘全文，併綠卜彌格譯文，此碑文魯德照始介紹之，因卜彌格而著稱，至祈爾歇乃於基督教徒之歐西學者間，博絕大聲譽。此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 全稱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a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æ & Artis Spectaculis, Alio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Amstelodami [Amsterdam] 1667）中，於景教碑記事外，收至中國之種種里程、中國宗教、中國自然界及人文上値驚異之事物、中國建築、中國古文字，以及金尼閣到華當時事情，頗多有趣記載。

卜彌格西歸，於學界引起上述波紋，一六五五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得教皇答書後，再上東渡之途。一六五八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至華，是時兩廣亦入於清，由榔播遷雲南徼外，王太后殂落，龐天壽亦故，教皇答書，無由轉呈，遂流離安南境上，旅中罹大患以故。然當時還歐有貢獻於東方研究者，非只卜彌格一人。類似者有衞匡國（Martin Martini 1614—1661），一六四三年（崇禎十六年）至中國，於明清鼎革之擾亂中，旅行各地，爾後長住杭州，從事布教。此時儀禮問題發端，爲辯護耶穌會方面之態度，一次被派返歐，途中遇暴風，海上漂蕩，經愛爾蘭西方，流至那威方面，經荷蘭德意志，始達羅馬，使命完成後，率靑年傳教師十七人，自葡萄牙乘船，二年始入澳門港，此間於海上再遇暴風，又爲海賊所捕，備嚐苦難，歸杭州後不久，寢疾易簀。衞匡國之西歸，對當時之東方學上，齎有二大重要結果，一爲居荷蘭時，出版中國新圖（Novus Atlas Sinensis）（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爲著名地圖學家江蒲拉（Jan Blaeu）新地圖（Novus Atlas）之一

部。其二爲與當世碩學顧理斯（Jacques Golius）相知，教以中國語，衞氏中國新圖爲歐洲中國地圖有專著之始．附記中國輿地之概說，是亦爲歐洲中國地誌之權輿。圖幅說明皆以明陸應陽廣輿記爲底本，直至後述杜赫德（du Halde）書問世．仍爲最可信之中國地理書，猶能永久維持其聲價云。衞匡國此外尚有重要著述，其一爲一六五八年（順治十五年）刊於德國門興（München）之中國史初編十卷（Sinicae Historicae decas prima），此書記明之滅亡清之入關，及繼此諸種歷史事變見聞原形　雖未必盡屬可信，然多補中國史料之闕，幷傳中國當時實狀於歐人之間。此外，衞氏著有中國耶穌教士紀略（Brevis Relatio de numero & quantitate Christianorum apud Sinas）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一年）刊於羅馬，與前記金尼閣布教史卜彌格現狀記，皆稽考當時西教史之好資料也。

衞匡國自歐歸華之際，新來同伴傳教師中，有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比利時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2—1692，比利時人）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比利時人）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8—1696，意大利人）等清初西學史上著名人物，皆以漢文爲泰西學術宗教之著述，努力於啓蒙工作。其中柏應理爲中國文物之研究家介紹者，著稱於歐西東方學史上，柏氏一六五九年（順治十六年）至中土，先赴任江西建昌，三年間得信徒二千人，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公刊大學及論語最初五篇之拉丁譯，名中國箴言（Sapientia Sinica），是爲中國經書西譯印行之始。

但此書非出於柏應理一人之手，譯筆主要成自郭納爵（Ignacio da Costa 1599－1666），標題注以漢字殷鐸澤郭納爵同述。時楊光先之反基督教運動起，利馬竇等在華西教士皆被捕，逮至廣東，殷鐸澤爲陳情教皇，赴羅馬，途中發表中庸譯本中國政治道德學（Sinarv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一部分印於廣東（1667），一部分印於臥亞（1669），附孔子傳。此書於一六七二年（康熙十一年）再版於巴黎，同時發表法譯，是年中國布教紀要（Compendiosa Narratione della Stato della Missione Cinese）出版於羅馬。所著中國祭祀舉証（Testimonium de Culti sinensi）於其死後一七〇〇年（康熙三十九年）出版里昂。柏應理至華後，駐江蘇一帶，從事布教，與名畫家吳歷（漁山）相知，施洗禮。旋爲報告會務及請增派傳教士，奉會命，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發澳門，向羅馬，使命完成後歸華途中，死。居歐期中，傾其造詣，從事著述，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發布中國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ica latine exposita），是書爲大學中庸論語之拉丁譯，附孔子略傳，爲論語中庸全譯之始，孔子詳傳亦以此爲嚆矢。此書非成於柏氏一人之手，乃經同僚恩格理（Christian Herdtricht－1684 德人）等人之協力而成，成於柏氏者爲卷首進表序文及卷末中國年代表，孔子傳爲恩氏編述。柏氏更著有：1，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巴黎刊行傳教中國之耶穌會士諸神甫名錄（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is Jesu），2，許太夫人傳（Historia nobilis feninae，

Candida Hiu）3，中國史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2952 B. C.—1683 A. D.]Paris 1687）4，傳教師流謫廣東後布教情形（Relatio de statu et qualitate missionis Sinicae, post reditum patrum Cantonensi exilio sub annum 1671）等。

柏氏更助他人編述，又教漢語漢文，以促進中國研究，前者如監督南懷仁康熙朝歐洲之星學（Astronomia Europaea sub Imperatore Tartaro—Sinico Cám Hy）之刊行（北京，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刊）；後者如教授普魯士醫師門策爾（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華語是也。門策爾學習結果，著有拉漢小辭典（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Characteristici）及中國小年表（Kurtze Chinesiche Chronologia oder Zeit-Register aller chinesischer Kayser）等。又盡全力於中國語初步（Clavis Sinica）及中國辭彙（Lexicon Sinicum）之編纂，此二書未刊，今藏柏林國立圖書館。門氏所著，皆甚幼雅，但足爲歐西之中國研究沿革史上一插話也。

門氏研究，雖無何價值，但爲居歐學者受傳教師刺激而研究中國之一例。即開英之海德(Thomas Hyde)德之米勒(Andreas Müller)法之多爾普羅(Barthelémy d'Herbelot)研究中國之門徑，意義匪淺。海德（Thomas Hyde 1636—1705）得種種研究材料於渡歐華人沈福宗（Michel Tchin Fo-tsung），著中國度量衡考（Epistola de mensuris et ponder-

ibus Serum seu Siuensium. Oxford 1688）等論文，為英國東方學之先覺。海德關係於當時析斯忒（Chester）僧正窩爾呑（Bishop Walton）監督刊行之各國語對譯聖書一六五七年（順治十四年）版之編纂，自德來襄助此事業者，有學僧米勒（Andreas Müller）。留英京期中，起學習華語之志，歸國後，努力於中國研究，為德國東方學之開祖。主要著作，為：1，馬可波羅遊記校本（Marci Pauli Veneti, Historici fidelissimi juxta ac Praestantissimi de Regionibus orientalibus. Coloniae=Köln, 1671），2，景教碑考（Monumenti Sinici Berolini 1672.），3，中國地理歷史論考（Disqnistio Geographica & Historicade Cathaja. Berolini 1671）4，中國雜事七講（Hebdomas Observationum de Rebus Sinicis. Coloniae=Köln 1674），5，中華帝國地名彙錄（Imperii Sinensis Nomenclator Geographicus. Berolini 1680），6，北京官話辭典標本（Specimen Lexici Mandarinici. Berlin 1684），7，漢文選釋（Speciminum Sinicorum. 1685 刊地未詳），8，阿布答拉被答威中國史譯註（Abdallae Beidavaei Historia Sinensis. Berolini 1689）。9，中國帝王列名（Basilicon Sineuse 刊年刊地未詳）。2，5，8，後日收於其論文集東方論纂（Opscula nonnulla orientalis. Frankfurt a/M 1695）中，再公於世。

法蘭西類此二人者，厥為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之敘利亞語教授多爾普羅

（Brthelémy d'Herbelot 1625-1695），氏巴黎人，十七世紀漢學史上重要人物也。精通阿拉伯、希伯來、波斯諸語，不嫻華語，其所著十七世紀東方學綜覽之東方文庫（Bibliothāque Orientale）收入關於中國項目甚多，予極東歷史文物研究者以南針。為百科全書之體，著者生前，未見上梓，其死後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始刊於巴黎。

（註一）參看：向達，中西交通史，民國二十二年，中華版。中西交通小史，民國二十二年，商務版。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四傳注釋，民國二十三年，燕京哈佛學社。

（註二）明末以來耶穌教布教史，參考：1. Catholic Encyclopaedia, Vol. III New York 1908. P. 672 以下所收之 Cordier 執筆 Society of Jesus 等項。2. H. Havret, La Mission de Kiang-nan. Paris 1900 最初二章。3 Alph. Favier, Pé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éking 1897. 2 vols. 布教史之條。4. 燕京開教略（前書布教史條之漢譯）三冊。5. 黃伯祿（Pierre Hoang）撰，正教奉褒二冊，上海，光緒三十年（1904）三版。6.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30. 7. 葉德祿編輯，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叢，民國三十二年二月，輔仁大學圖書館出版。8.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論叢，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三）會士列傳，參看 Aloy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

ques sur les mission de l'ancienne de Chine, Changhai 1932－1935.（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商務版）

（註四）參看：P. Pelliot, La Peinture et la gravure europeennes en China au temps de Mathieu Ricci. T'oung Pao 1920－1.

（註五）英譯：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compiled by parde J.G.de Mendoza, ed. by S. G. T. Staunton,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R. H. Major. London 1853.

（註六）參看：C. Ritter, Die Erdkunde von Asien. I. Berlin, 1832.

（註七）參看：馮承鈞著，景教碑考，民國二十年五月，商務版。

六　十八世紀

——清代中葉歐西之中國研究

西洋教士既陸續東來，其地位亦日益增高。然直至康熙初年，急於西學之移植，緩於中國之研究；華人受於西人者多，西人傳自華人者尠。洎至康熙中葉，召至內廷之教士，或盡力於中國一般事情之報告，或盡力於領內之測量製圖，各展所長：更助長此傾向，且提高歐洲本國之中華文物探求心者，爲儀禮問題（Questions des Rites）之勃發（註一）。儀禮

問題者，爲新來西教士間討論耶穌教本義與中國從來之禮俗間能否妥協之理論上問題，但實際視爲耶穌會派教士與他派基督教士間之勢力爭奪，亦無不可。初利馬竇之傳道中華也，許改宗者保守舊來之慣習儀式，對祖先之祭祀，孔子之崇拜，皆寬容不問。且以爲祭天儀禮，與耶穌教之尊崇上帝，亦未必矛盾。乃獲有多數信者，博得聲望，成功之因，亦在於此。然耶穌會派所執布教方針，爲後至之他派傳教師，即多敏我派（Dominico）與斯定派（Augustin）海外傳道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等教士所非難，此等異論者一致團結，訴之羅馬教皇，教皇克萊孟第十一世（Clemente XI）於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下詔書，宣告：中國從來之祭祀，墮於偶像崇拜，禁止耶穌教徒之容認習合，翌年安谷（Antiochia）大僧正鐸羅（或作多羅 Cardinal de Turnon 1668—1710）奉教皇命至北京，謁康熙帝玄曄，奏教皇意，玄曄雖優待禮遇之，但不從其請，說明中國崇拜祖先之眞意，縷述羅馬教皇對中國人民無制定法令之權。鐸羅（de Turnon）在北京時，又得克萊孟第十一世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所發教書，更非難耶穌會派傳道方針，嚴禁其實行，但觀望四周情形，不敢發表，先懇請設置統轄在華各會派傳教師之總主教，及承認其權限。玄曄納耶穌會派諸師勸告，拒之，諭以違旨教士之放逐，結果，放逐自始斡旋此問題之海外傳道教會嚴嘉樂（又名閻當，Charles Maigrot —1730）於澳門，鐸羅（de Turnon）大僧正一旦至南京，考慮雙方之妥協點，在京所收教書，仍不敢發表，以待

時機；終以無望好轉，乃決意作教書之摘要，爲聲明書，以己名宣布之，反駁玄曄之見解，命不從克萊孟諭旨之教士退出中國，一七〇七年（康熙四十六年）二月事也。玄曄立卽逮捕鐸羅（de Turnon），送至澳門，命葡萄牙人監視之，葡人關於耶穌教之宣布，素掌握東方傳道之特權，惡他國人之侵占，令鐸羅（de Turnon）大僧正未至里斯本受葡王允許，擅自來華，已激發其感情，加以蔑視臥亞大主教之統管權，欲別爲中國教區總司教之創置，更加葡人嫌惡之心，乃藉此好機，嚴重監禁，鐸羅（de Turnon）於無限憤懣中，客死獄裏。然羅馬教皇廳仍不改前態，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派亞力山大利亞大主教嘉祿（Giovanni Ambrogio Mezzabarba）請於清廷，無效，卒歸故國。至是，玄曄方針與克萊孟主張，完全乖離對立，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重令，嚴禁未經勅許之教士留居國內，守利馬竇教風者，允其滯留布教；教皇廳依然持反對態度，此後傳教師之立場，乃甚感困難矣。

儀禮問題與起結果，各派傳教師，皆爲擁護己派，詳研中國禮俗，其報告論難，大刺激歐洲教界，西人對於中國文物之知識，乃見一大進展，此近代歐西東方知識發達史上重要事件也。雍正之世，對耶穌教傳道，仍採禁制方針，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勅，除以學術供奉內廷者外，不問對儀禮問題態度如何，禁所有外國傳教師之居住國內，中國西教陷於非常悲境，其子弘曆大體襲此方針，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宣布除奉職宮廷者外，放逐全國

各地西洋教士，敢犯禁者，或拘禁，或刑戮，以彈壓之，於是西教徒更遭苦難時代。至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以排他爲世非難之耶穌會，因猛烈之他派嫉視，法國波旁（Bourbon）家之壇頭羅馬教皇之壓迫等政治理由，遂有教皇克萊孟第十四世（Clemente XIV）禁止結社傳導之命，乃至解體分散，其活動舞臺中國方面之西教傳導，更墮窮境，遣使會（Lazaristes）及從來之多敏我會（Dominico）代之，僅保餘喘。此諸派更因法國大革命之結果，失羅馬正教之保護者，亦深嚐艱難，故傳教師之中國研究，頗形寂寥。但此期間，清朝歷代皇帝對於西洋學問，或尊重之，或愛好之，故出入內廷之特殊教士，不絕其跡，關於觀象編曆，直至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高守謙（Monteiro da Serra－1826）以疾退職，就歸國之途，舉爲欽天監監正或監副者相繼。成於彼等手中之中國研究，雖細且微，然亦未嘗絕也。

漸次發展之傳教師中國研究及關聯而起之居歐學者之東方學勞作，至十七世紀末期，更一進轉。路易十四世爲振興中國文物之研究（註二），更積極東派優秀傳教師，當時儀禮問題，更增糾紛，益提高彼等探究中國事情熱度，此等形勢，相爲表裏，中國研究乃有新局面之展開。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科爾伯特（Colbertt）設立之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ances），爲補訂從來地理學星學之知識，派會員於歐美各地，中國方面則以耶穌會傳教師任之，此爲對華新方針實現最初之機緣，俟秀布教師新向東土。一八六五年（康熙四

年）三月三日，精通數學之耶穌會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李明（Louis Lecomte）劉應（Claude Vesderou）白進（或作白晉，Joachim Bouvet）張誠（Jean François Gerbillon）等六人上航海之途。當時葡萄牙對法國之東進，甚感不快，不欲法人之自澳門入華，故便乘廣東華商王華士蓬船浮海，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月抵浙江寧波。清廷據浙江巡撫金鋐報告，以未携護照為理由，命其歸國。但以其中或有通曆法者，廟議一變，乃使其入京，洪若翰等於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八日入燕，三月二十五日（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以徐日昇之嚮導，謁玄曄於乾清宮。結果彼等或受命留京，或被派至地方，盡忠清帝，同時努力於本來使命之進行。

李明（Louis Lecomte 1655－1729）法蘭西人，生於波爾多（Bordeaux），到北京後，先至陝西，後跋涉各地，其間試為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出現之彗星觀測及其他諸種天文觀測，於此方面，甚著功績。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奉會命，為報告中國傳道狀況，赴羅馬，旋歸故國，著中國現勢新誌（Nouveaux Mémoires sur 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a）三卷，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至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出版於巴黎。此書一面傳當時中國事情，一面關於儀禮問題辯護耶穌會士之主張，出版後，深為世人所注意，第一卷公刊翌年（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第二卷出刊，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第三卷出版，然此書有推稱華人過度之評，著者更撰中國儀禮論（Surles Cerém-

onies de la Chine, Liege 1700)，以代解嘲。但儀禮問題之論爭，更加激烈而不已。

劉應（Claude Visderou 1656－1737）生於布勒塔涅（Bretagne），到北京後，派至山西地方，從事布教，居二載，困於生活，轉任南京。其後一赴廣東，旋歸北京，司新入信者之教育，更努力於漢籍之研究，遂至精通；結果發見關於儀禮問題，其僚友卽耶穌會所屬諸教士之見解，於立論基礎上，頗有誤謬，披瀝於鐸羅僧正，以功任貴州司教，然以當時玄曄之新方針，不得繼續住華，一七〇九年（康熙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去中土，至印度。劉應居華，於儀禮問題以外，最注意研究者，爲中國歷史，尤其塞外民族之歷史，彼素讀東方文庫，頗資參考，以其未據中國史籍記載爲缺點，自譯漢史關於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記載，專取材於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並集後世史家考證，作稿本四冊，送至歐洲，韃靼史（Histoire de la Tartarie）是也。然不幸此稿本不爲當世所注意，及附錄於前述東方文庫再版，漸得學者關心，東方文庫再版以後，以有此著及劉應勞作景教碑文新譯，而與東方學結締深緣。景教碑文之翻譯考釋，魯德照（Alvarez de Semedo）卜彌格（Michele Boym）嘗試爲之，至劉應益形進步，譯文更較正確，劉應如專心於漢學方面之述作，業績必多可觀，但以出入儀禮問題，奔走無暇，史學文學著述之少，爲可惜耳！

張誠（Jean Francois Cerbillon 1654－1707）法蘭西凡爾登（Verdun）人。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來華，翌年至北京，以其語學天才，不久熟達滿洲語，受玄曄眷寵

，參與外交樞機，與徐日昇共列於尼布楚會議（1689），對該條約之成立，爲清廷斡旋者甚多，其後更博玄曄信任，屢扈從北狩。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俄羅斯（莫斯科大公）使臣來華之際，奉勅以意大利語當折衝之任，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洪若翰歸國後，繼之爲中國布教長，旅行蒙古地方者八次，旅中見聞之一部，收於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編中華帝國全誌第四卷，爲有力史料，裨益後世。

白進（Joachim Bouvet 1656—1730）生於法國魯滿（Le Mans），居華時，甚得玄曄之寵，與張誠同爲曄師，講述數學，日夕親炙其側，深知其性行及公私生活全部，了悉其全貌。所撰聖祖本紀（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表裏描寫，毫無疏漏，爲考究曄傳者，所必參稽之書。玄曄因白進而深佩法國耶穌會士之學識，使白進一旦歸國，圖更招致多數優秀之士。白進奉命於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歸法，携玄曄贈與路易十四世之漢籍四十九冊，收於巴黎王室文庫（Bibliothèque royale 今國民圖書館之前身）；當時藏於此文庫之漢籍僅四冊，至是稍增其數。白進於故國新得優秀宣教學僧十八人，翌年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率之來華，其秋入燕，宣教之外，從事於中國文物之研究，又受曄命，分擔清朝領內各地之實測，努力於地圖之製作。此十傳教師之渡來，及此後二三十年間渡來法國傳教師之學術活動，實位於西教教士中國研究之頂點，爲西人極東研究史上放一異彩也。

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六日，由海國西海岸洛瑟爾（La Rochelle）港出發之商船安非特利特（Amphitrite）號，載白進等十教士，赴東方，七閱月，十月六日至上川島，此安非特利特（Amphitrite）號，爲最先至中國之法蘭西商船，搭乘此船之宣教師，在東方研究史上，皆佔重要地位。船之派出目的，在於貿易，法國東印度公司及得登（Durden）所命，促其實現者爲白進。十宣教師中須特記者，爲馬若瑟（Joseph Henri de Pré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雷孝思（Jean Baptiste Régis）三人。

馬若瑟（Joseph Henri de Prémare 1666—1736），生於哈弗爾（Le Hanre），逝於澳門，來華後，於江西省袁州府從事布教，注意於中國文物之學術研究，與白進、傅聖澤（Jean François Fouquet 法人，一六九〇年，康熙二十六年來華）共同檢討易、春秋、老子、淮南子等古典，於此尋求與基督教同一論旨。別爲太古史之述作，著有書經所見以前之時代與中國神話之關係（Recherches sur les temps antérieurs à ceux dont parle le Chou-King et sur la mythologie Chinoise），當時未出版，一七七〇年（乾隆三十五年）始附載於宋君榮（Antoine Gaubil）書經卷頭問世。而馬氏一代大著，厥爲中國語劄記（Natitia Lingarae Siniceae），正確傳中國語之性質構造於歐人之最初專書也。至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始由英國倫敦傳道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經營之馬拉加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上梓，有英文譯本。馬氏尚譯有元曲百選中之

趙氏孤兒，附錄於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中華帝國全誌，對法國文學頗有影響。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生於柏松山（Besançon）附近之類策（Leutre），渡華後，至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逝於北京，甚得玄曄之寵，備政治外交之顧問，奉命從事於華語滿語之學習，雖無學術上特殊研究，然於對俄交涉，多有功勛。至上言清帝，從遞領內之實測製圖，肇端之績，有足多者。

雷孝思（Jean Baptiste Régis 1603－1738）生於布羅溫斯（Provence）伊斯特爾（Ister）地方，嘗翻譯易經（Y-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備極勤勞，爲此書最初之西文全譯；而監督中國全土之實測製圖，更屬殊勳。實測始於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年），促進此事業者，爲巴多明，而任其事者爲雷孝思等教士，自關外各地始，漸及於內地各省，行天體之觀測，以定經緯度；施三角測量，以度地之廣狹，更加西藏朝鮮。於杜德美（Pierre Jartoux）督董下，綜合統一，作總圖一幅，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竣工，上之朝廷，賜名皇輿全覽圖。原圖存否不明，乾隆丙子所作原本，鈔圖四十一張，存瀋陽故宮，影印題名滿蒙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乾隆庚辰所作原本，鈔圖百四張，存北平故宮，影印題名乾隆十三排銅版中國圖。地圖原稿教士送至法蘭西，今藏巴黎外交部古文書館，由此可知初稿面目。任測地事業者，除雷孝思外，有白進、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9－1720 法人）、費隱（Fridelli 1740 歿 德人）、麥大成（Cardoso 葡人）、潘如（Guillaume Bonjour 1670－1714 法人）、湯尚賢（Pierre 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4 法人）、馮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 法人）、德瑪諾（Roman Hinderer [Henderer] 1669－1744 法人）諸人，各著功績。

洎乾隆時代歐人之中國研究，仍以法教士爲中心，其業績視前期毫無遜色，宋君榮（Antoine Gaubil）錢德明（Jean Joseph Amiot）韓國英（Pierre Marchal Cibot），其著者也：而馮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7－1748）大作之問世，亦在此期。氏生於伊細爾（Isere）之邁拉（Mailla），一七〇三年（康熙四十二年）來華，通漢滿文，治中國史。康熙時滿譯朱子通鑑綱目，彼乃參考滿譯及漢文原本，譯爲法文，又譯明商輅等之續通鑑綱目，補宋末元明史實，更就東西諸書及所見聞，追補明末清初事，書成，寄其故國，一七七七年（乾隆四二年）至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始陸續刊於巴黎，爲中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 Kang-Mou）十二卷，歐人由此書更易知中國史之要略矣。法國考狄（Cordier）名著中國通史，淸以前仍多取資於此書云。

宋君榮（Antoine Gaubil 1689－1759）爲此期教士之最邃於漢文者。生於南法上郎格多（Haut Languedoc）之加雅克（Gaillac），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來華，留北京

三十六載，繼巴多明授滿洲青年拉丁語，以備對俄外交，其傑作，爲卒後十二年一七七〇年（乾隆三十五年），巴黎出版之書經法譯（Chou King），禹貢篇尤爲歐西學人所常引用。生前出版者，有成吉斯汗及蒙古史（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 ses Successeurs, Conquérans de la Chine. Paris. 1739）。其大唐史綱（Abrégé de l'Histoire Chinois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Paris 1791—1814）及其附錄中國紀年論（Traité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Paris 1814）均於其歿後刊行。蒙古史本明邵遠平元史類編所編述，大唐史綱刊於中國雜纂第十五卷及第十六卷中，其未刊之稿，尚有蒙古史關係類考，歷史地理論考，書簡等。

宋君榮之次，如德人魏繼晉（Florian Bahr）法人吳多祿（Pierre Foureau）孫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湯執中（Pierre d'Incarville）汪達洪（Jean Mathieu de Ventavon）等耶穌會士，皆身居北京，有所研究，及錢德明（Jean Joseph Amiot）出，殆集大功於一身焉。錢德明（Jean Joseph Amiot 1718—1793）一名王若瑟，生於土倫（Taulon），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入北京，凡四十二年而卒，通漢滿語文，研究中國文物史實，精賅倖宋君榮，而博雅過之。主要著述：1，乾隆帝御製盛京賦之法釋（E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 Paris. 1770）。2，中國兵法考（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 Paris 1772）。3，中國音樂古今記（De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Paris 1780）、4，孔子傳（Vie de Koung-tsée. Paris 1786）。5，滿法辭典（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français. Paris 1789-90）三卷。6，滿洲語文典（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 Paris 1787）等。孔子傳畢載孔子系譜，自其先世以訖乾隆時之衍聖公，聳動歐人。滿法辭典插入滿洲活字，印刷困難，以法教育部之獎勵，得竟其業。此外短篇論文，多刋入中國雜纂中。

歐人之東方旅行，至十八世紀，始有完全出自學術上之目的者，安克底耶杜佩倫（Anquetel Duperron 1731-1805）之印度旅行是也。氏研究東方語言於巴黎，爲研究祆教（Zoroastra），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赴印度，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歸國，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發表蘇魯阿士德之書阿維斯塔之全譯（Zend-Avesta, Ourrege de Zoroastra），功績不顯於時，甚至有謂其所譯原文爲僞書者，今日始被崇爲此方面之先驅者焉。氏別著印度之歷史的地理的研究（Recherches 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 sur l'Inde 1787），印度與歐羅巴之關係（L'Inde et rapport avec l'Europe 1790（註三）

西伯利亞則俄羅斯於克薩克東進後，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舉行最初之探險，所謂第一回堪察加（Kamchatka）探險是也。蓋依大彼得帝之意志而實行者。主要目的爲調查亞細亞與亞美利加之間有無海峽，任命仕於俄羅斯之瑞典人白令（Vitus Bering）爲探險隊長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自鄂霍次克（Okhotsk Sea.）起程，一七三〇年（雍正八年）歸，此時雖未達亞美利加海岸，但知亞美兩大陸間確有海峽。此後不久，因元老院書記官長奇利羅夫（Kirillov）之計劃，派遣大規模探險隊於西伯利亞各地，是爲第二次堪察加探險，白令亦參加焉，踏查今日之白令海峽，調查堪察加半島，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死於白令島。（註四）

是時居華西教教士之中國研究，至以法人爲中心之測量製圖而達極點。於斯時也，本國傳教師中，亦有相當業績，而最著者，爲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 Bastiste du Halde 1674－1743）。氏法人，生於巴黎，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十八歲入耶穌會，專司編纂。該會士盧．哥比安（Le Gobien 1653－1708）死後，監督海外傳教耶穌會士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s）之續輯刊行，其第九卷至第二十六卷，實杜赫德親自校訂上梓者也。氏之志於中華帝國全誌之編述，蓋於校訂書簡集中得讀多數傳教師報告之結果也　杜赫德將集於身邊之布教師書簡報告研究等，巧加安排，進行中華帝國全誌即中華帝國及中國領韃靼之地理的、歷史的、年代記的、政治的、博物的記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之編述大業。書凡四卷，第一卷記利用於本書編纂之手記作者，凡二十七人。爲明末迄於當時歐西中國研究百五十年成績之一大集成，西洋漢學空

前之金字塔，可誇於世界之紀念碑也。

中華帝國全誌挿入康熙時西教士之中國實測圖，是圖爲當時名振一世之製圖家王室技師丹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ignon d'Anville)及部下門生改描刻版者也。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於荷蘭海牙出單行本，曰中華新圖(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往日中國地圖流布本，多據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胡林翼刻於武昌之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大清一統輿圖）；此武昌圖，亦不過丹維爾圖之覆刻翻字而已。

中國雜纂（Memoires concernant des Chinois）爲北京各教士研究中國史實學術風俗藝術習慣之結集，全稱：北京在住布教師撰關於中國歷史學術藝術風俗習慣等之論考(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爲十六冊之大論叢，收集各家論考，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刊第一卷，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刊至十六卷，歷四十年，爲十八世紀中國研究之紀念叢書。當編訂出版之任者，主要爲耶穌會學僧蒲叟梯（Gabriel Bretier）及歷史家布雷其尼（L.G. Oudart Feudrix de Brequigny），最後獨步當代之東方學者薩栖（Sylvestre de Sacy）任之。此書有意大利人潘廷章（Giuseppe Panzi）所畫弘曆肖像，潘氏與同國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法蘭西人王致

誠（Jean Denis Attiret）艾啓蒙（或稱艾納爵，Ignatius Sickelbarth）蔣友仁（Michel Benoit）等，皆介紹泰西藝術於中國之重要人物也。

上述中華帝國全誌與中國雜纂，爲十八世紀漢學雙壁，如更加一書，則鼎立而三，其爲耶穌會士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歟？書簡集爲當時歐洲人中國研究之源泉，集旅居中國及東印度教士之書牘報告，分類編纂，一七〇二年（康熙四十一年）創刊，迄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共刊三十四卷，當其任者爲耶穌會士盧哥比安（Le Gobien），杜赫德（Du Halde）等。

歐洲本土之中國研究，日益進展。有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者，幼學於麻薩蘭學院（Collège Mazarin），後任家庭教師。時有福建興化人黃某，游學海外傳道教會（Missions Etrangères）所屬之巴黎神學校，教皇路易十四令傅爾蒙從之習華語，著華語入門書。後爲法蘭西學院阿拉伯語教授，仍繼續研究漢文。黃卒後，保存其遺稿。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刊中國文典（Grammatica Sinica），爲五百餘頁之鉅冊，此書祇以西班牙教士維洛（Francisco Varo）之華語官話文法爲藍本，譯成拉丁文而已。氏又嘗襲取馬若瑟中國語劄記，而疵議之。其學詣品性，頗無足取，惟法國初期漢學者德經（Joseph de Guignes)等，均出其門，其中國研究篳路藍褸之功，終不可沒焉。傅爾蒙姪

戴早萊(Michel-Ange-André Le Ronx Deshauterayes)繼之爲王室文庫譯官，治漢滿語，校刊馮秉正中國通史，爲世所稱。

傅爾蒙之出藍弟子爲德經(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執贄傅門，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傅爾蒙中國文典成書，曾偕之共謁教皇，受賜金。師歿後，與同門戴早萊共任王室文庫譯官，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刊匈奴突厥起源論(Mémoire historiqu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於巴黎，名重一時。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刊巨著北狄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taux, avant et depuis J. C. jusqu'à présent)，又二年，而全書告成。以中國史籍與歐西記述對照，比較異同，爲十八世紀法國漢學界傑著。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大革命起，全國雲擾，氏服務一博物館，仍能不廢所業，曾試譯春秋，而未成書。氏以漢民族爲埃及之移民，發表中國人爲埃及殖民說(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雖爲錢德明等教士所駁斥，而當時頗多信其說者。其子小德經(Christian Lonis 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繼父學，曾任廣東領事，受拿破崙第一命，著漢法拉丁對譯字典，刊於一八一三年(嘉慶十八年)，體勢堂皇，象徵大帝事業之一斑，唯實以意大利人姬茂納(Basilio de Gemona)之漢字西譯(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

稿本爲據，附以法譯而已。

巴黎之東方語學校（E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於一七九六年（嘉慶元年）六月二日正式開學，其倡議設立者，爲藍歌籟（Louis Mathieu Langlès 1763—1824），氏以教授任校長，授波斯滿洲馬來語，時當大革命之後，國力凋敝，艱難締造，裁成多士，樹立法國東方研究發展之基礎，其畢業生且受俄皇亞力山大第一之聘，入俄國，開法國東方學之支派，藍氏著有滿洲字母論（Alphabet tartare-mandchou. 1787，乃參考錢德明稿本而成，爲以活字印滿文之始。復有王室文庫所藏滿文典籍考（Notice des livres tartars-mantchoux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乾隆欽定滿洲典禮考（Rituel des Tartars-mantchoux, rédigé par l'Ordre de l'Empereur Kien-Long. Paris 1804）等書，其人滿文造詣，實至淺薄，其著作爲後人所譏議。唯創立之學校，則日趨發展，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一年）設中國語正式講座，一八八四年（光緒七年）設遠東歷史地理講座，爲法國遠東外交官研究者之胚胎地。

（註一）參看：1，R. C. Jenkins,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ordinal de Tournon An Examination of Conflicting Evidence and an Attempt at an Imperial Jndgement. London 1894. 2，A. Huoder, Der chinesche Ritenstreit, Aachen, 1621. 3，岩村忍・支那のキリスト教に關する文献，蒙古史雜考，昭和

十八年二月，白林書房出版。

（註二）關於十八世紀歐洲中國趣味之流行，即文學美術建築造庭等之中國化，參看：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e. Geistige und Künstliche Beziehungen im 18. Jahrhundert. Berlin 1923. 英譯爲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25. (Hist. of Civiliz Series)。

（註三）關於西人之印度研究，參看：M. Winternitz, 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teratur. 3, Band. Leipzig. 1909-1920.

（註四）關於俄人之經營西伯利亞，參看：V. Bartol'd (W. Barthold) Istoriya izucheniya Vosteka v Europe i Rossii, izdanie 2-oe. Leningrad 1925. 德譯本 Die geographische and historische Erforschung des Orient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ussischer Arbeiten Aus dem Russischen übersetzt von Dr. E. Ramberg-Figulla.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Erdund Kultur kunde. VIII), Leipzig 1913. 日譯本：外務省調査部譯，歐洲殊に露西亞における東洋研究史，昭和十四年六月生活社出版。周傳儒，西伯利亞開發史，民國三十二年七月，正中書局出版。

七　十九、二十世紀

——鴉片戰後漢學之發達

東來教士及歐洲本土學者，相携並進，至十九世紀，漢學（Sinology）於焉確立。東方研究，日益進步，實源於科學思想之發達；殖民政策之進步。十九世紀歐洲自然科學者因技術之改良，觀測實驗方法之確立，蒐集多數實物材料，立新假設以說明諸現象；但東方學部門之研究方法，尙無異於昔也。語言學　歷史學、人種學至十九世紀研究方法完成，因之此等知識部門，始得科學體系之性質，乃漸次自覺適用同樣方法於研究東方諸語言東方諸民族之歷史及生活樣式之必要。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蘇格蘭人瓦特（James Watt）發明蒸汽機關，而世界之變，卽肇於是。產業革命，製品過剩；生產力增，資料不足，乃不得不求諸域外。清初沿明例，澳門葡人至廣東市易，及平台灣，開海禁，設権關，而西洋諸商舶，來者益衆，康熙間，英人屢來互易，然未嘗立約通商，其立約通商者，惟俄羅斯。鴉片戰（1840）後，海禁大開。日本於一八四五年（咸豐四年）因美國彼里（Perri）之來航而開國。英法殖民地之競爭，法歸失敗，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印度莫臥兒帝國亡；翌年，全國行政，直隸英王。西力東漸，於斯爲烈。於是利用其科學方法，研究此新登世界舞台之遠東。（註一）

1. 法蘭西

法蘭西漢學（Sinologie）之得完成一種專門學問，實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等之業績，氏生於巴黎，爲一侍醫之子，因墜樓盲一目，十一歲著神話小辭典，十四歲著英國王室之系譜年表，十七歲喪父，投身刀圭界，入四國宮（Palais des Quatre-Nations）之中央學院（Ecole Centrale）習醫。幼即嗜植物學，因欲讀本草綱目，手傳爾蒙文典，以獨學通漢文及滿洲語，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發表中國語言文學論(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時僅二十三歲。一八一二年（嘉慶十七年）發表漢文及滿文所記一銘文之解讀（Explication d'une Inciiption en chinois et en mandchou）於伊塞爾縣報（Journal du Département de l'Isère）第六號，一八一三年（嘉慶十八年）二十五歲時，以研究中國醫藥之論文，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巴黎法蘭西學院（Cellège de France）於一八一五年（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創設漢學講座，氏爲首任教授，翌年一月十六日開課講演，述歐羅巴中國語研究之起源進步及效用（Sur l'Origine, lès Progiès et l'Utilité de l'Etude du chinois en Europe），後日收入其論文集亞細亞雜纂第二卷。當時並刊行漢滿語言文學講義要目（Progarn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 et de tartare-mandchoue）。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四月五日，被選爲金石文藝院（Académie des Ins-

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會員，一八一八年（道光二年）與德國漢學者克拉勃羅德（Klaproth）等協力，發起亞細亞協會（Société Asiatique）於巴黎，刊行亞細亞學報（Journal Asiatique），雄視漢學界。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於藍歌額（Langlès）卒後，任王室文庫東方文籍部主任，更爲盲啞教育改革委員，王室印刷局東方鈔本出版委員等，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任內政部文藝調查委員，一八二九年（道光九年）任亞細亞學會會長，是年一月一日發行普遍(L'Universel)，盡忠於守舊派，翌年七月，革命爆發，遂廢刊。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六月三日以虎疫卒。氏研究範圍廣博，譯著甚富，著書有塞外民族語言考(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1820)、漢文啓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法顯傳(佛國記)譯註等。論文多收入亞細亞雜纂（Mélanges asiatiques 1825－26)新亞細亞雜纂(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1829)遺稿雜編（Mélanges posthum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Orientales. 1843）。其著作目錄，詳見中日雜纂（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第1卷（1863）八一頁。

繼雷氏之講座者爲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王韜謂其「在國中譯習我邦語言文字，將四十年。於經史子集，靡不窮搜遍覽……所譯太上感應篇、蠶桑輯要、老子道德經、景德鎭陶錄，鈎疑抉要，蝬積條分，駸駸乎登大雅之堂，入述作之林矣。癸申以來，潛心內典，考索釋宗，所譯如大慈恩三藏法師傳、大唐西域記，精深詳博，殆罕比倫。於

書中所藏諸地，咸能細參梵語，證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與法國儒蓮學士，見王弢園尺牘中）。氏曾譯灰闌記（元李行道所作劇）、白蛇記等曲本小說，研究絹之製法，任教職四十餘年，卒於光緒初元。

名弟子畢甌（E. Biot 1803–1850）研究竹書紀年，著中國教育論（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Paris 1847），而法譯周禮，尤推盛業，自敘譯文，以爲不在巴比倫亞述發掘業績之下。巴參（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 1799–1863）以譯戲曲名。至繼儒蓮之大學講座者，爲其高足德理文（De Saint Denys 1823–1918），曾譯文獻通考四裔考，予當時人種學研究者以重要資料　更譯唐詩及屈原離騷。

繼德理文之講座者，爲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 1865–1918）生於里昂（Léon）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來華，任譯官於使館，回國繼任巴黎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選任學士院會員，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經西伯利亞再東遊，訪興京清陵遼化等處，探求史實，史記法譯爲漢學界蓋世名作。譯文旣正確詳盡，且有豐富之底注，創見旣多，考証及比較法亦復精細，書分五冊，名曰司馬遷史記（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u-Ma Ts'ien 1895–1905）譯文至孔子世家而止。在此書前後，氏曾著兩漢時代之石畫像（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de Han 1898）及北華訪古錄（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1905–

1915）二書，圖像豐富，解說精細，由此開西歐研究中國古代藝術之風尙。較史記譯注稍後者，則爲泰山誌（Le T'ai-Chan 1910），啓發後之學者以社會學研究漢學之途徑。其他重要著作，若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 Kine［Turcs］Occidentaux 1903. 馮承鈞譯，民國十四年三月，商務版）。除吾國史料以外，更探求其他國家民族之記載，爲治西北史者不可缺之書；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譯註（Mémoire sur les bonzes qui allé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1894）爲治西域史學之佳作；與伯希和（P. Pilliot）合著之中國摩尼教考（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1913）爲研究摩尼教之佳著；中國佛藏中五百故事選（Cinq cent comtes et Apoloques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 1910－1911）爲研究中國佛教傳說必知之書，其他重要論文不下七八十種，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主辦西歐唯一漢學雜誌通報，著述講授，巍然爲歐洲漢學泰斗。

繼沙畹之漢學講座者，爲馬伯樂（Henri Maspero 1883－1944），父馬加斯東（Caston Comille Charles Maspero）本意大利人，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入法國籍，以埃及學者名，曾任開羅博物館長。氏學於沙畹考狄，於河內遠東法蘭西學校（Ecole française d'Extrêtme-Orient）教授有年，二次大戰時，爲德人所害。以研究中國古方言古韻爲專長，安南史語亦有其貢獻，又轉向於道教研究。所著中國古代史（La Chine anti-

que 1928）最負盛譽，多獨到之點；唐代長安方音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as T'ang B. F. E. O. 1920）在古音學上極有貢獻；安南古代之歷史（Etudes d'histoire d'Anuan. B. E. F. E. O. 1910. 1916）亦治安南史之重要書籍。其弟喬治（Georges Máspero）著占婆史（Le Royaume de Champa. T. P. 1910－11. 馮承鈞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商務版）首尾完具，爲今日占婆史空前撰述。

法蘭西學院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特爲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設中央亞細亞歷史地理考古學講座。伯希和者長馬伯樂四歲，光緒四年生於巴黎，習文學於法蘭西大學文科，研討於安南河內遠東法蘭西學校（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遠東法蘭西學校乃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安南總督杜麥（Doumer）所創立，在西貢，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移於河內，有圖書與博物館，集中學者，刋行校刋，爲法國東方學研究之重要機關。庚子拳亂時，伯氏曾受圍於北京使館，以一兵士奮戰，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至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旅行中央亞細亞，從事於考古。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三月，於甘肅敦煌縣東南鳴沙山麓莫高窟中，發見唐及五代人寫本及雕本古籍，選其精品，携以過北京，並爲巴黎國民圖書館置大量漢籍，返國後考訂研究，以敦煌學名世，推爲學士院會員。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曾爲羅馬教皇圖書館編漢文書目，並出席美國波士頓之英法美亞細亞學會聯合會。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再遊華，並過日

本，參觀東方文化學院、帝國大學等處歸國。氏於漢籍目錄校勘，賅洽爲當代歐人第一；廣通語文，方法謹嚴，研究範圍泛涉東方學各部門；考狄卒後，主編通報，名滿天下。著書不多，而論文則宏富，且極博洽深刻，書籍中如與沙畹合著之中國摩尼教考，前已言之。他若敦煌圖錄（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6 vols. 1920-26（六本，乃刊印敦煌藝術者，論文多爲書評式。

傅舍（Alfred Foucher 1865-）爲佛教美術研究之權威，巴黎大學教授。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被派至安南、暹羅、闍婆，作學術探險，齎多數考古學蒐集品於羅佛兒（Louvre）博物館，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及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至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任河內遠東法蘭西學校校長，其後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至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再渡印，二一年（民國十年）入波斯，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至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爲法蘭西之阿富汗考古學探險隊長，歸法途中（1925）留日本及北京，留日時，爲日法會舘學監 佛教美術學識之宏汎，研究之綜合精緻，爲當代第一。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以來，數回踏查犍陀羅地方之結果，成巨著犍陀羅之希臘佛教藝術(L'art grees-bouddhique du Gandhāra. 2 vols. 1905, 1918-22），詳細綜合，包羅無餘。又於尊像學，有佛教尊像學研究（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bouddhique. 2 vols. 1900,1905）。

東方現代語學校（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遠東史地講座之名教授，爲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生於美，學於法，研究於英倫，一八六九（同治八年）曾遊學中國，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歸國，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任職東方現代語學校，推爲亞細亞學會會員，地理協會總裁，撒爾明奴（Sorbonne）大學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研究員，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與荷蘭漢學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創辦當時西歐惟一漢學雜誌通報（T'oung Pao），以英法德文字合刊，爲國際漢學刊物之權威，久任編輯。氏通中國史地法制經濟外交等，尤能博覽典籍，薈萃各家之說，加以有條理之總集。其所編漢學書目（Bibliothèca Sinica 1878－1885. 增補及再版 1904－1924），日本學書目（B. Japonica 1912），安南學書目（B. Indiasinica）久爲世人所喜用，分類得體，子目詳細，爲治東方學必備之書。此外中國與西洋各國外交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a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2. 3vols.）三冊，尤享盛名。充分利用西歐各國之外交檔案，尤以法國爲甚。氏曾補註裕爾（Henry Yule）之馬可波羅遊記（Sèr Marco Polo）及東域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譯註鄂多立克東方行紀（Les Voyages en Asie au XIVe Siecle de Cdoric de Pordenone 1891），均關中西交通史者。晚年更編四本中國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1920－1921），以第四本最爲精，加入珍貴

之外交史料甚多。

繼考狄教授於東方現代語學校者，爲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淸末民初曾任職北京法國公使館，從事漢學研究。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回國，繼沙畹之後，任巴黎大學宗教科學部遠東宗教研究導師，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著中國古代節令及歌謠（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Paris 1919）一書，由詩經國風中之資料，以研究當時民間共同體之遺制，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自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兼任東方現代語學校史地法制教授，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爲中國高等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教授兼校務長。氏受漢語文於沙畹，習社會學於杜爾幹（Emile Durkheim），喜以現代社會學觀點釋中國古典，爲其特色。則著有中國人之宗教（La religion des Chinois. 1922），繼上書說明後世之宗教情況，如山川樹木等之信仰，乃由於對節令祭祀之共同聖地之原始宗教而興起。中國封建時代之媵制（La polygynie et le sororat dans la chine féodale 1920），說明民間共同體時代團體結婚之遺制，卽姊妹同嫁及妻死娶妻妹之習俗。中國舞蹈及傳說（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 1926. 李璜節譯本，名中國的跳舞與神秘故事，民國二十二年，中華版）闡明宗教結社之成立至覇權社會發生之變遷。中國上古文明論（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1929）第一部爲政治史之簡述，第二部純係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之研究。

列維(Sylvain Levi 1863－1935)精梵文，爲名佛教學者，曾遊華，講學北京大學，留日數年，曾與日本高楠順次郎監修法寶義林（P.Demieville, Dictio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rpres les sources Chinoise set Jeponaises. Tokyo. 1929－）、著龜茲語考(Le"Tokherien B"Langue de Koutcha, Journal Asiatique, Ⅱe sere 2, 1913）、王玄策使印度記（Les missions de Wang Hiuen-tsé dans l'Inde, J. As.,1900）（二文均有馮承鈞華譯，收入史地叢考，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商務版）。

格魯塞（René Grouset）著遠東史（Histoire de l'Extrême-Orient. 2 vols. Paris 1929. 馮承鈞譯其一篇，爲蒙古史略，民國二十三年，商務版）。爲遠東通史之世界名著。

亞細亞學會秘書費瑯（Gabriel Ferrand）以治南洋交通史名，著自八世紀至十八世紀極東關係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之旅行記及地理書（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ks relatifs a l'Extrême-Orient du VIIle au XVIIle siecles. Paris 1913）、崑崙南海航行記（Ancient Voyages to Condor Island and The China Sea. Journal Asiatique 1919. 馮承鈞譯，民國十九年，商務版）。

沙海昂（Antoine Charignon 1872－1930），鐵路技師，馬可波羅之研究家，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來華，入民國，任交通部技正有年，歎馬可波羅書之無法文普及本，乃

以鮑節(Pauthier)本爲藍本，利用新元史、新疆西域圖誌、元史譯文証補、歷代地理沿革圖等中國最近諸研究，成馬可波羅行紀三冊(Le Livre de Marco Polo. 2 Vols. Pekin 1924. 馮承鈞譯，民國二十五年，商務版)。

梅布(Ch. B. Maybon 1872—1926)通華語及安南語，安南近世史(Histoire Moderne du Pays d'Annam 1527—1820)爲其代表作，受法國學士院賞，安南史之重要概說書也。

晚清以後之法國教士，以上海徐家滙河北獻縣天主教堂爲中心，從事漢籍之研究與譯述，其業亦多可觀，最著者爲顧賽芬(Seraphan Couvreur 1839—1919)與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顧賽芬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入耶穌會，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來華，習華語於北京，後居河間天主教堂，爲神甫有年，嗜古典，能文章，著法華字彙(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1884)、漢法大字典(Grand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1890)、法文及拉丁文譯中國詔令奏議公文選集(Choix de documents, lettres officielles proclamations édits, memorioux, inscriptions……Texte Chinois avec traduction en Francais et en Latin 1894)，並法譯四書、詩經、禮記、春秋左傳、儀禮。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亦耶穌會士，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來華，以醫師而研究中國歷史哲學風俗，著中國宗教之信仰及哲學思潮史(Histoire des cro-

yances religieuses et opinions philosophique en Chine 1917)、近代中國風俗志(Folklore Chinois moderne 1894－1908)，譯莊子、淮南子等書。

此外，步日耶(Abbé H. Breuil)及桑志華(Père E. Licent)與德日進(Père Teilhard de Chardin)之中國史前舊石器時代之研究，則早已震驚世界之治史前史及人類學者。

法國對於東方文獻之蒐集，極爲注意。基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多中國美術工藝品，羅佛兒(Louvre)博物館東方部有圓明園之刼掠品；伯希和之中亞發掘物。巴黎國民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收羅漢籍，歷史悠久，於量於質，雄視全歐。伯希和於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復舉敦煌秘籍及在北京所蒐羅以益之，孤本珍抄，美不勝收。此外巴黎法蘭西學院中國研究所，由葛蘭言任董事，伯希和負蒐集之責，雖少天壤孤本，而採訪最勤，購求極備，甚適研究之用。至私人收藏，則有羅道爾(Robert des Rotours)者，系出名門，能華語，善讀書，嘗譯新唐書選舉志，營邸宅於巴黎近郊維羅孚拉(Viroflay)，擁書十數萬卷，爲歐洲私人第一漢籍收藏家。

法人所主持之東方研究刊物，有：1，通報(T'oung Pao 略稱 T. P.)，創刊於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專以研究東亞各地歷史地理語言風土爲目的，而關於中國之論著尤多。考狄、沙畹、伯希和先後負責編輯，執筆者多歐洲名士，有英法德文論著。書報介紹，取

材宏而別擇精，對於歐洲漢學家之身世傳記，亦多刊佈。編輯部在巴黎，發行部在荷蘭萊頓。2，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略稱 J. A.）由亞細亞學會刊行，雷慕沙等創刊於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爲世界有數之東方學術研究刊物。其研究目標以印度西亞埃及爲主，間亦涉及中國，年分二卷，每卷二冊，發行所爲巴黎保提奈兒（Paul Pauthner）書店。3、河內遠東法蘭西學校校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略稱 B. E. F. E. O.）創刊於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年出一卷，後改爲年刊二次，以研究安南及中國爲中心。安南在文化上民族上與中國關係非常密切，故常綜二者而論之。撰稿者多該校教授研究員，率用法文。書評犀利，有通報之風。4，巴黎又有亞洲藝術評論（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略稱 R. A. A.）。創刊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執筆多各國名家，年刊四次，巴黎美術書店發行。

2. 荷蘭

荷人當十七世紀時，雄飛遠東，據有南洋，並曾佔領台灣，故其遠東研究，發軔甚早。十七世紀初教士休爾紐斯（Justus Heurnius）於爪哇得華人之助，著華蘭拉丁語彙，爲荷蘭人漢學之祖師。又萊頓（Leiden）大學阿拉伯學碩學高留斯（Jaco dus Goleus）曾從名耶穌會士衛匡國習華語，事在十七世中葉。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荷蘭人於爪哇成立巴達維亞（Batavia）學藝會，曾爲歐人亞細亞學會之濫觴。

萊頓大學之設漢學講座，則始於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教授爲霍夫門（J. J. Hoffmann 1805—1878），曾從華人習語言，爲荷蘭東印度公司書記，治漢學與日本學，著作目錄有四十篇，以語言學爲基礎，所涉甚廣，關於日本之知見，至是乃有學術的組織。

繼之者爲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曾任通事於香港，歷訪華南各都邑，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歸國，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任萊頓大學漢學教授，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與法國漢學者考狄（H. Cordier）協力創刊通報（T'oung Pao），久任編輯。著星辰解源（Sing Chin Khao Youen. Uranographie Chinoise 1875），介紹中國天文學於泰西，其華蘭辭典（Ho Hoa Bûn-Gi Lui-Tsian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r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ea lin Nederlandsch Indië. 1886—1890.）則煌煌四冊，沾溉後學。

施古德卒後，繼其講座者，爲哥羅特（Jan Jakob de Groot 1854—1921），氏著有中國宗教心及宗教迫害（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2 Vols. Amsterdam 1903），而中國宗教體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psect. 4 vols. Leyden 1892—1901）一書，尤爲成名之作。任職十年，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應德人聘，轉職柏林大學。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戴溫達克（J. J. L. Luyvenduk 1889－）專任漢學教授，成立漢學研究會，並刋萊頓漢學叢書（Sinica Leidensia）。氏以外交官久居吾國，精通華語文，曾譯商君書，潤色美人德布斯（Dubs）之漢書英譯，其治學範圍亦廣，由伯希和推爲通報編輯者。

近年荷蘭人教士之治漢學者，有哈克曼（Heinrich Friedrich Lic Hackmann 1864－），曾任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講師，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至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渡華，居上海傳道，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至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旅行中亞東亞，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歸國，爲涵塘（Amsterdam）大學宗教史教授，著述頗多。

荷蘭人漢籍之蒐集，視英法等國有遜色，卽十七世紀高留斯（Jaco dus Goleus）由衞匡國所得漢籍，及休爾紐斯（Justus Heurnius）之華荷拉丁語彙稿本，今皆入於大英博物館。

萊頓之東方學刋物，除通報外，復有東方學報（Acta Orientalia 略稱 A. O.），爲荷蘭、丹麥、挪威東方學會聯合會之機關雜誌，用法英德文撰述，每年四期，亦偶有漢學論文。

3. 德意志

雷慕沙以法國漢學者教授於巴黎大學時，對此，德國亦有中國學大師，曰克拉勃羅德（Heinrich Julius [von] Klaproth 1788－1830），氏先雷慕沙五年，生於柏林，本化學家子，幼好化學鑛物學植物學等，長嗜東方語學，獨力學之。十八歲時，草亞細亞雜誌（Asiatisches Magazin）第一第二兩冊，於中國歷史佛教文學，有所論列，名重當世。巴黎大學予以語言博士學位。後應俄國聘，一八〇九年（嘉慶十年）俄皇派加羅夫金（Karovkin）爲大使，附以學術調查團，以克拉勃羅德（Klaproth）爲譯官，十月抵恰克圖。次年入庫倫，因議覲見禮不合，二月折回。克氏此行調查蒙古民族，蒐集漢滿藏文書籍，並晤日本商人五郎次於伊兒庫次克，因編纂日本語彙。及還京，俄皇賜金，命爲學士院特別會員，以犒其功。一八一〇年（嘉慶十五年）發表阿富汗族語言起源考（Sur la langue des Afghans）於學士院彙報（Imperat. Russk. Akademii Nauk），爲快心大著。是年學士院上梓其論考集亞細亞文學歷史語言雜稿（Archiv für asiatischen Literatur, Geschichte und Sprachkunde）第一冊，旋受教育部大臣命，編俄國學士院所藏漢滿圖書目錄，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爲督造所需漢字，赴柏林，留十四月，任畢，乃辭俄聘。當時歐洲天地，爲拿破崙之舞臺，戰雲瀰漫，德以戰敗國，備嚐辛酸，學術研究，甚屬困難。克拉勃羅德不改素志，繼續鑽研，一八一二年（嘉慶十七年）發表回鶻語言文字考（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於巴黎，附刊華夷譯語中之高昌譯語，論回鶻爲士

耳其種。一八一五年（嘉慶二十年）入巴黎，由普魯士王資助，乃專心於東方學之研究。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刊對照亞細亞語彙（Asia Polygrotta），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創刊亞細亞雜誌（Magasin asiatique, ou Revue géographique et hiotor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septentrionale），登載中亞北亞史地論文。一八二四年（道光四年）至二六年（道光六年），刊亞細亞歷史地圖（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depuis la Monarchie de Cyrus jusqu' á nos jours），彩色地圖二十七葉，爲東方歷史地圖之鼻祖。其小論文，則集錄於亞細亞雜考（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 contenant des recherc heshistoriques, géographiques et philosophiques sur les peuples de l'Orient. 3 tomes Paris, 1826－28）。記清俄國境、滿族起源、蒙古歷史、運河原委、台灣琉球之地誌，以至長白山攀登記、紙幣起源考，所涉極廣。氏深通滿洲文學，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著滿洲文選（Chrestonathie mandchoue. Paris 1828），爲滿洲語之入門書，並附刊教士錢德明（Amiot）譯乾隆帝御撰盛京賦之滿文，造成西人由滿文以接觸漢籍之機運，影響極大。研究範圍之廣，著述之多，邁越雷慕沙，故考狄（Cordier）盛稱之，惟其著作，多用法文，影響於國外者，較日耳曼人爲多。

克拉勃羅德（H. J. Klaproth）之後，有古滋拉夫（K. F. Augustus Gützlaff 1803－1851），以教士東來，爲英國商務局譯員，久居香港，著道光帝之生涯（The life cf

Taou-Kwang, late emperer of China 1851），並譯中國古文，咸豐初卒於香港。同時有內曼（K. F. Neumann 1803－1870）者，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以修學爲目的來華旅行，爲慕尼克（Munich）及柏林圖書館購漢籍數萬卷，爲德國漢學圖書樹其基礎。惟其所收之書，僅塵封於圖書館，旣未編目，讀者亦至少。

十九世紀初，有奚伯爾德（Phili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者，學地文民俗，對東方研究，早生趣味，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任荷蘭東印度公司陸軍醫院外科少校，至爪哇（Java），旋任日本出島商館醫師，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八月到任，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去日，非僅荷蘭商館一醫師，並受命研究日本之萬有學，渡日後一年，開學塾於長崎市外鳴瀧，研究西洋醫學及一般科學，試臨床講義，授藥局之處方，日本西醫自書籍之研究，入於實驗應用之域，西洋學術之研究，有劃期之發達，氏之日本研究業績，收集於所著日本（Nippon, Archiv zur Beschreibung von Japan und dessen neben und schutzländen: ……. 2 vols., Leyden 1834）一書中，爲日本鎖國時代歐人記述日本之最詳最佳者。

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普魯士東亞考察團東來，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中德正式締約，德人對於遠東，漸爲注意。地質學者李希霍芬（F. F. Richthofen 1833－1905）於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四年間，踏查中國十一省，著中國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5 vols. Berlin, 1877—1912）一書，其黃土風成說、晉魯礦產等調查，雖爲全世界所注意，然與德人之中國研究，反有不良影響。蓋李希霍芬不能讀漢書，竟克成此鉅著，因使人覺中國研究與漢籍無關也。李書之引古證今，旣多舛誤，而雨後春筍之屛棄漢書之中國研究，益無足觀。

舉十九世紀末期，德國漢學者可得三人。一爲曉特（Wilhelm Schott 1862—1889），以語言學者研究中國塞外民族及佛教。關於蒙古韃靼之論文，至今爲人重視。一爲甲柏連（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通滿洲語，由滿語以譯四書、詩經，並有滿德辭典（Mandschu-Deutschen Wörterbuch. Leipzig 1864）、漢文典（Chinesische Gramatik 1881）等著，以語言學者貢獻於漢學研究。成績最偉者，爲葛魯貝（Wilhelm Grube 1855—1908），氏本俄人，治中國語文，通女眞語，入德國，服務柏林人種博物館東亞部，爲東方語言學校教授。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來華，留北京二年。著中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Leiqzig 1902），爲治中國文學史者必讀之書。其女眞語言文字考（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öen 1896）尤爲治斯學者之寶筏。氏雖俄人而卒於柏林附近，且事業生涯均在德國，著作亦以德文發表，故可視爲德國漢學者。

德國倣法國巴黎東方現代語學校之例，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於柏林創立東方語言學校（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內有華日語兩部，爲造就外交及商業人材而設，對於漢學之高深研究，則未遑致力。時德國二十一大學中，印度學、埃及學、巴比崙學之講座具備，而無純粹之漢學講座。柏林大學自一八九二年（光緒十九年）甲柏連卒後無漢學科，自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葛魯貝卒後無漢文課程。碩儒夏德（Friedrich Hirth）失望於故國，乃赴美講學，以傳其衣鉢焉。

柏林大學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正式設漢學講座，聘荷蘭人哥羅特(J. J. M. Groot)爲教授。時爲租借膠州後之第十四年。氏邃於中國宗教史之研究，深得威廉第二之優遇，爲大學研究所購置典籍，倡導漢籍直讀，忽視文法。以大戰之故，其所策劃，未能全部實現。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福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6）繼其任。氏生於德國哈慈（Horz）邦，習梵文於哥廷根大學，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於柏林習華語，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供職德使館，服務北京上海廈門各地，博讀中國古籍。返國後於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至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任中國駐德使館德文參贊，嗣任漢堡大學教授，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移講壇於柏林。一九三〇年（民國二十一年）退休，專精著述。著中國史料所見之中亞突厥及西羌民族（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s der Türkvölker und Skyther Zentralasiens, Abh. Kgl. Preuss.

Ak, Wis., 1904）中國土地制度論（Die Rechtsverhältnisse am Grundeigentum in China, Leipzig 1903），其畢生大著，爲中華帝國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1903）。任德國學士院會員，提携後進，爲漢學宗師。中國政府嘉其溝通中德文化之功，曾贈以榮譽奬章。

來比錫（Leipzig）大學爲德國漢學課程有悠久歷史之學校。甲柏連謝世後，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繼之。氏之研究以語言學爲基礎，博雅老壽，推爲薩克遜邦學會會員，著有中國藝術史上最古之證件，屈原所著天問之研究（Das älteste Dokument zur chinesischen Kunstgeschichte. T'ien wĕn, die Himmelsfragen des Küh Yuan. 1931）。

佛蘭克府（Frankfurt a. M.）大學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設漢學講座，以衞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任教授。氏以傳教士渡華，居青島爲譯官，歐戰後任使館譯官，前後留華二十五年之久。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並曾授德文於北京大學。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以後，任佛蘭克府大學教授，發起中國學院（China Institut），講演宣傳，聳動國內。中國政府於衞氏逝世（1930，民國十九年）後，特於學院中設衞禮賢紀念講座，以酬其溝通中德文化之功績。氏迻譯漢籍，計有論、孟、大學、易經、禮記、老子、莊子、呂氏春秋、列子、太乙金華宗旨。譯文精審流暢，可以方英之理雅格（James

Legge)、法之顧賽芬（Couvreur），可謂德國漢學研究之最基本工作。又有中國文化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Müchen. 1928）等著，闡揚東方文化，不遺餘力。

漢堡殖民地學院，自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設中國語言及文化系，福蘭閣、佛爾克（Alfred Forke 1866 ）、先後任教授。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以通譯練習生來華，居北京。後爲廈門、上海、天津等地領事，一八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爲譯官，次任上海總領事，兼北京東方協會上海皇家亞細亞學會書記，博通漢籍，多所撰著。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至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應美人聘，至柏克萊（Barkelegy）各大城市講授漢學，歸國後授華語於柏林東方語言學校，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繼福蘭閣爲漢堡教授。氏曾譯墨子及王充論衡，又曾譯漢六朝詩選、唐宋詩選，而其最精者爲哲學史之研究，著中國人之宇宙觀（The World-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 London 1925）、中國古代哲學史（Geschichte der alt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Hamburg 1927）等。

貝特林（Otto von Böhtlingh 1815—1904）梵文學者，生於彼得堡，一八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至柏林，二十四歲出版巴尼尼文典（Pānini's Grammatik, hrsg., übers., erläut., Leipzig 1887），梵語學史上之劃期業績也。一八二四年（道光八年）任俄國學士院屬員，返彼得堡。其後出版梵文學名著之原典並發表重音研究（Ein erster Versuch

über die Accent 1843），更轉而研究居住西伯利亞土耳其種之雅庫特語（Über die Sprache der jakuten, St. Peterburg 1851），解明此學界未知之語言。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着手於多年宿望之梵文辭典之編纂，得杜比根（Tübingen）大學梵語教授陸德（Rudolf Roth）之協力，前後二十年而完成之（Sanskrit Wörterbuch, 7 Ede., St. Petersburg 1855—1875）。一八六八年（光緒七年）至耶那（Jena），爾後三十五年，居德，晚年患目疾，享年九十。

哈木兒（Joseph Freiherr von Hammer- Purgstall 1774—1856）通曉蒙古史，可與多桑（D'oh son）並肩，一七九六年（嘉慶元年）任外交官，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至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二年）駐土耳其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其後居維也納，迻譯出版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書籍，著鄂託曼帝國史（Geschichte der Osmanischen Reiches）、金帳汗國史（Geschichte der golden Horde d, i, der Mongolen in Persien, 1842—1844. Darmstadt）、哥里米汗國史（Geschichte der Chane der Krim 1856.）等。

柏林人種博物館存有哥隆維德（Albert Grünwedel）勒苛克（Le Cog）等先後四次探險新疆發掘吐魯番庫車等地所得之古物壁畫文書等。哥隆維德（Albeat Grünwedel 1856—）著有中國土耳其斯坦古代佛教祠堂（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e Turkestan, Birlin, 1912.）、古庫車（Alt- Kutscha Berlin 1620）等。勒苛克（Le

Cog 1860—1930）以考古所得資料，著書冊高昌（Chotscho. Berlin 1913）及中亞後期古代佛教藝術（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ilasien 1922—1925），亦不朽之盛業也。

哥隆維德及勒考克所得資料，博物館長米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1863—1930）主持研究，以實物漢籍互證，闡明十世紀中亞宗教美術文化交通史蹟，使魯吐番學與英法之敦煌學並重於世。氏於伊蘭、土耳其、東方語言學無不貫通，考證摩尼教景教佚亡經典斷片，並譯中古突厥語金光明經、大白傘蓋陀羅尼方廣大莊嚴經普門品、尊勝陀羅尼爲德文，聲譽甚著。

氏卒後，繼任博物館長者，爲曲梅路（Otto Kümmel 1874—），以研究東方美術著，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至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曾經美國日本，來華蒐集資料，主編東亞雜誌（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於闡揚中國美術，頗著功績。有東亞藝術（Die Kunst Ostasien 1920）、日本之美術工藝（Die Kunstgewerbe in Japan 1919）等書。

柏林普魯士國立圖書館藏中文書籍之多，僅次於巴黎國民圖書館，自二十年前，繼續收集，迄未間斷。如宋槧蜀大字本李鼎祚周易集解，本清內府書，亦流落於此；漢文部長侯來（Hulle），協助學人研究，能舉其職。普魯士學士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

senschaften）有哥羅特（J. J. M. de Groot）之遺書。佛蘭克府之中國研究所（China-Institut, Frankfurt a/M.）有衞禮賢（Richard Wilhelm）之舊藏。柏林大學中設有漢學研究圖書館。東方語言學校、人種博物館亦藏有漢藉。來比錫大學有葛魯貝文庫，保存此名漢學者之珍貴遺書，並續有所收集。慕尼克有內曼之遺書。此外哥廷根、伯恩（Bonn）、哈雷（Halle）等大學，亦藏有漢藉。

德國出版遠東研究刊物，有1.東亞雜誌（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略稱 O. Z.），一九一二年創刊，由曲梅路(Otto Kümmel)主編，側重東亞藝術研究。2.全亞季刊（Asia Major 略稱 A.M.）創刊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爲研究中國之重要刊物，年出一卷，凡四冊，發行者爲全亞季刊發行所(Verlag Asia Major)。編輯者爲孔好古(August Conrady)弟子辛得勤(Bruno Schindler)及韋來(Friedrich Weller)二氏。撰稿者不限德人，於漢學推進，貢獻甚偉，惜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廢刊。3.佛蘭克府中國學院之漢學雜誌（Sinica, Zeitschrift für Chinakunde und Chinaforschung. 略稱 Sinica），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由衞禮賢創刊，初爲年刊，次數無定。自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起每年發行一卷，卷爲六冊，爲德國漢學刊物後起之秀。4.柏林東方語言學校校刊（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略稱 M. S. O. S.）出版已四十年，時有漢學論文。5.北平輔仁大學

出版之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年刊兩冊，爲德人鮑潤生（X. Biallas）及雷冕（R. Kahmann）謝禮士（E. Schierlitz）等所主持。中德學會刊有中德學誌，爲德人福克司（Walter Fuchs）、福吾康（Wolfgang Franke）所主持，亦可附於德國刊物焉。

4. 英吉利

海德（Thomas Hyde）之後，治中國語文者，仍極罕見。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馬戛爾尼（Macartney 1737—1809）奉命聘華，求譯才而不可得。乃由意大利那坡里之中華書院，得華人解拉丁意大利語者二，重譯將事。（事詳劉復譯乾隆英使覲見記，民國五年，中華版）。副使之子名司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者，年十二，從韶來遊，熱心研究，遂通華語漢文，北平故宮藏有彼爲馬戛爾尼手繕之國書。雖語滯字劣，而意皆可辨，齠齡得此，殊爲難能。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復從英使羅爾美都（Lord Amherst）入北京爲譯員。後供職東印度公司。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與高普洛克（Colebrooke）協力發起皇家亞細亞學會，寄贈漢籍三千冊。氏於一八一〇年（嘉慶十五年）譯大清律例，傳佈歐洲，爲英國外交官治漢學之開山。

同時有倫敦會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從倫敦華僑粵人楊善達習華語，一八一七年（嘉慶十二年）以佈教經美至廣州。交司當東，殫精中國語文，曾爲洪秀全譯新舊約爲漢文，創英華書院於澳門，一八二四年（道光四年）歸國。一八二八年（道光

六年）再來華，從事譯著。得東印度公司資助，成英華字典六冊，其譯經及字典，後此教士皆奉爲圭臬。助馬禮遜共譯聖書者有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亦耶穌會士，曾任英華學堂校長，一八一七年（嘉慶二十二年）譯聖諭廣訓爲英文。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英人由南京條約據香港，開五口通商；又八年（1850）由天津條約得設使館於北京，並自由佈教於內地，一三五九年（咸豐九年）由北京條約割九龍，天津開港。自是外交官教士星羅棋布於各地，中國研究之範圍既擴大，內容亦日趨充實。迄十九世紀末，牛津劍橋倫敦等大學，先後設中國語文講座，聘教士外交官之歸國者爲教授，而要其學風，重概念，尙實用，多從事於政治地理商業語言之研究，與法德空氣略異。

牛津大學自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始設中國語文講座，理雅格（James Legge 1815–1897）爲首任教授，氏卒業於阿伯敦（Aberdeen）大學，擅拉丁文。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五年）至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始習華語文於大英博物館之圖書館，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爲倫敦會傳教師，至澳門。年二十八，曾任澳門英華書院院長，後移於香港。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洪仁玕曾從之領洗，即其後參與太平天國革命，封爲干王者，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始漫遊華北歸國，留華三十餘載。任牛津教職逾二十年，卒年八十二。氏之主要貢獻爲中國古典之英譯，其譯書目的爲欲理解中國文化，屏除曲解主觀，減少宗教附會，譯本皆附詿釋序論。長州名士王韜，實助成其業。（韜號弢園，別署天南遯叟，能詩工駢

文，曾創刊香港循環日報。）計先後譯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書經、詩經、春秋左傳，均刊於香港，及歸國又譯易經、禮記、孝經、道德經，入繆納（Max Müller）編東方聖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中，晚年神明不衰，刊法顯佛國記（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1886）、秦始皇帝（Ch'in Shih Hwang Ti, Le Lotus. VI－VIII 1887—1888）、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研究（The Nestorian Monument of Hsian Fu 1888）。其逝世之前二年（1895，光緒二十一年）且刊離騷英譯，可謂精力絕人矣。氏與法之顧賽芬（Couvreur）德之衞禮賢並稱為漢籍歐譯三大師，亦英國漢學界之鳩摩羅什、玄奘也。

繼氏教授於牛津者為蘇熙洵（Soothill），本循道會教士，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開教溫州。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轉任山西大學校長，輔助李提摩太（Jimathy Richard）之義賑傳教事業，聲譽甚著。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山西大學移歸華人，氏乃歸國，任職牛津，著有中國之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ondon. 1913）等書。

牛津復有中國哲學宗教講師名休中誠（E. R. Hughes）者，留華二十餘年，為牧師，久居福建，喜胡適馮友蘭之書，有紀元前三四世紀中國之理想派及現實派（Political Idealists and Realists of China of the Fourth and Third Centuries B.C. J.N.C.B.R.A.

S, 1932. Vols 63. P.P. 46—64）等著。

斯密斯（Vincent Arthur Smith 1848—1923頃）爲印度學學者。講印度史於牛津大學，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奉職印度政廳，益深研印度史，著阿育王傳（Asoka The Buddhist Emperor of India, Oxf. 1901. 3rd ed. 1920）。其學生印度史（The Oxford student's history of India 1858, 6th ed, 1916.）、印度史（Oxford history of India, 2nd ed., 1921），爲印度史入門之名著。

劍橋大學之漢學講座，後牛津十二年（1888．光緒十四年）而創設，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95）爲首任教授。氏少理雅格三歲，理以傳教成名，威則以外交起家。一八三七年（道光十六年）從遠東派遣軍東來，參加鴉片戰爭；補書記官，爲上海副領事，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至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爲駐華公使，結芝罘條約。歸英後任劍橋講座，有華語入門書數種，創威妥瑪式拚音法（Wade System），爲歐拚漢字最流行之方式。

威卒後越年（1897），翟理斯（Allen Herbert Giles 1840—1984）來繼其任。氏生於博雅好古之家庭，少治古典。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年二十二，爲駐華領事館學習譯員，嗣任汕頭、廈門、寧波、上海等地副領事領事，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辭職。越四年而設壇劍橋。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牛津贈以名譽法學博士，並選爲法國學士院會員。

氏著有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1911. 參看鄭振鐸評Giles的中國文學史，見中國文學論集中）、中國古代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 [Religions, Ancient and Modern Seres.] London & Shanghai 1905）、中國畫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London. 1918）、中國人名辭典(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and Shanghai 1898)、中國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London 1911)、中國與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ork 1902）。此外介紹中國國情之通俗撰著甚多 曾譯千字文、莊子、老子，而其平生精力所萃爲英華字典（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1892—1912），晚年猶從事於三度修訂，主講壇約三十年，年八十九而卒。博洽老壽，侔於理雅格，而聲譽之隆過之。

繼翟氏漢學講座者爲莫爾（A. C. Moule），曾遊學中國，著元代基督教史（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並曾與伯希和共譯釋馬可波羅書，不失爲篤實學者。

倫敦大學附設東方語言學校中有華語。其漢學教授畢爾（Samuel Beal 1825－1889）於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就任。氏爲英國駐華艦隊牧師，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東來，習華語，著有法顯傳及宋景傳（Travels of Fa Hian and Sung Yun, Bu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1869）、佛教經典之連鎖（Catena of Bnddhist Scriptures 1872）、佛陀奇異傳說（Romantic Legends of Buddha 1875）、中國佛教（Buddhism in China 1881）、慈恩傳（The Life of Huen Tsiang 1888）、譯大唐西域記（Si-Yu-Ki，Buddhist Records of Western World 2 Vols. 1884）、最古佛典四十二章經（The Sûtra in 42 Sections, J.roy. As. Soc. 1862），開中國佛教文獻學研究之先河。

曼徹斯特（Manchester）大學教授有巴克爾（E. H. Parker）曾任駐華領事，著有中國古代史略（Ancient China Simplified. London. 1908）、韃靼千年史（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London. 1924，有向達黃靜淵譯本，民國二十六年，商務版）等書，氏研究範圍頗廣，其書亦盛行於英語讀者間。

顧令（Samuel Couling 1859－1923）曾任山西大學校長，皇家亞細亞學會華北分會名譽書記，著中國百科辭典（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1917），有來華宣教師中國學者等項目，並有漢字，實其特色。

大學以外之漢學者，亦大率出於外交官與教士。香港總督倫敦人戴維斯（J. E. Davis 1795－1890）略與威妥瑪同時，初以東印度公司書記爲貿易監督官，著中國概覽（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Lo-

ndon 183C)，普遍介紹中國國情，譯爲法德意荷等文，風行一時，又曾譯元雜劇漢宮秋(Hang-Koong 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 1829)等，蓋達官中之學人。

何其孫(Brian Houghton Hodgson 1800-1894)十八歲入東印度公司，二年後赴波斯，旋任尼泊爾副公使、公使。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退隱，爲外交官，爲學者，爲文士，集尊敬於一身，九十四歲身故。居尼泊爾者二十餘年，開佛教研究之新生面，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發表尼泊爾及西藏之語言宗教撮記(Notices of the Languag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於亞細亞研究第四卷，引起大反響於歐洲學界，所蒐集梵語聖典，凡三百八十一部，分贈印歐學術機關及學者。

包爾(James Dyer Ball 1847-1919)爲殖民政治家、中國語學者，任職香港政廳，從事於中國研究，著中國人民風土事物記，爲中國風土人民事務之小百科辭典，逐項有詳細解說。包爾死後，王那(E.C. Werner)增補之，(Things Chinese, or, Notes connected with China. 5 ed., Hongkong 1926)。

倫敦會教士衞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9)尤稱碩學，與理雅格爲雙璧。氏以學習華語，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至上海，年三十二，爲倫敦會印刷所監督。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北京條約成，得旅行內地之許可，受大英聖書公會囑，踏查十七省，洞悉幽隱，搜羅文獻，熱心研究，並習俄滿藏梵語，左右採獲，留華三十年，一八七七年(

光緒三年）始歸國，賅博爲十九世紀英人第一。氏以敏學，晚年失明。著漢籍解題（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57）、前漢書西域傳註釋（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us. transl. from the Tsëen Han Shoo. J. authrop. instit. 1880）。氏所蒐羅之典籍，爲上海皇家亞細亞學會華北分會圖書館之基礎。

里斯本人霍渥斯(H.H. Howorth 1842－1926)，以研究中國西北邊疆史著。氏赴任印度有功，爲皇家考古學會總裁，著述甚多，而蒙古史（History of Mongo's from the 9th to 19th Century. London 1876－1928），全四卷，流行尤廣，第四卷刊於易簀後，一卷爲蒙古本部部族史，二三卷爲欽察汗國史，四卷爲伊兒汗國史，末附補遺及索引。

愛爾蘭人瓦達斯（Thomas Watters 1840－1901）與霍渥斯年事相若，同治初（1862來華，任譯官領事，並曾于役朝鮮。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隱退歸國，活躍於倫敦皇家亞細亞學會，著老子－中國哲學之一研究（Lao-Tzu a Study in Chinese Philosophy 1870)，孔子廟碑（A Guide to the Tablets in a Temple of Confucious. Shanghai 1879），而大唐西域記考釋（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1904）恢宏前輩畢爾（Beal）之業，用力甚勤，至今爲治此學者所稱道。

甘爲霖（W.Campbell 1841－）清教派長老教會宣教師，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至台南，爲台灣史研究家，著荷蘭人統治下之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1930），爲荷蘭治下台灣史之根本資料，卷末附多數參考文獻。

亨利裕爾（Henry Yule 1820－1889），蘇格蘭人，曾從軍印度，旅行各地，著有東域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1913－16)，法人考狄爲之補訂，爲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權威。並曾校譯馬可波羅東方遊記（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Newly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Notes, London. 2 Vols. 1871），稱爲善本。然皆據西籍以考中國關係事實，未履漢土，不能直讀漢籍以相印證。關於印度及其附近，著有辭典（H. Yule & A.C. Burnell, Hobson－Jobson. 2 ed.,London 1903），收載多數日常會話之單語單句及語言歷史地理諸字，以英語翻譯解說之。

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é ie 1845－1895）法國之東方學者，後入英國籍，於倫敦深受亨利裕爾（H. Yule）之影響，著有中國古代文化西方起源論（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 D.London 1894），比較中國古代文化與巴比倫文化，謂中國古代文化淵源於西亞，漢族自此移住者也。一時轟動學界，其結論今雖已成過去，但於東西文化交流上，予以甚多暗示，其功不可泯也。

西藏之研究調查者柏爾(Charles Alfred Bell 1870－)，著西藏人民生活(The People of Tibet. Oxford 1928)、西藏之過去與現在（Tibet,Past and Present. Oxford

1924）等書，全據十餘年之直接見聞。蓋氏曾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至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出席中英藏會議，締交達賴，深通藏語，久居拉薩，所記詳密正確，轉非漢籍中所可見者矣。

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2—）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Budapest），仕於印度政廳，自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至一九三四年（民國十九年）由印度政府派遣，探險新疆甘肅等地，前後四次，得兩漢魏晉人木簡壁畫雕塑品佛經等，先伯希和發見敦煌古籍，携精品二十餘箱以去，所得分存於大英博物館及德梨（Delhi）之印度博物館。著有古和闐（Ancient Khotan. 2vols. 1907）、近印度（Serindia. 5vols. 1921）、契丹之荒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 2vols. 1912）、亞洲極中部（Innermost Asia. 4vols. 1928）等書。（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為探險之綜合報告，二十五年，中華書局出版）。英人以其有功學術，賜爵為貴族，推為考古學會評議員。

供職博物館之職員有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 1838—1913）者，曾任職英國駐華公使館，歸國後典守博物館珍貴漢籍，參與亞細亞學會會務，著有成吉斯汗傳（The Life of Jenghiz Khan 1877）、歐洲與遠東（Europe and the Far East 1904. 2nd ed. 1913）等書。

翟林奈（Lionle Giles 1895—）承名父（翟理斯）之學，主持博物館東方部漢籍科寫本股

，氏曾遊學比奧俄大學，負笈牛津，助其父撰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中國語文者，又以博物館命，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索引，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出版。並有關於老子列子孫子戰術道教教養之論著，校釋韋莊秦婦吟（有張蔭麟譯本，見燕京學報一卷一期），淵雅可觀。

以鑑賞蒐集美術著者，爲巴沙爾（S. W. Bushell 1844－1908）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曾任駐華使館醫官，留三十年，喜古泉金石磁器，著有中國美術（Chinese Art. Londin 1910. 有戴嶽漢譯本，商務版）。譯陶說（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being a translation of T'ao-Shuo. 1910）等書。與氏同時之外交官有霍布金（L. C. Hopkins 1854－）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來華，任上海、芝罘、天津等地領事，曾考訂殷墟甲骨文字，研究古泉，刊於亞洲會報，爲歐人此種論著之最早者。

比年以研究東方畫名，多所撰著者爲賓容（Robert Laurence BinYon 1869－），氏學於牛津，自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供職大英博物館，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任東方繪畫部長，著有遠東之畫（Painting in Far East. London 1908）、英國蒐儲之中國畫（Chinese Paintings in English Collections. Paris 1927）等書。

倫敦大英博物館多收古物古籍，東方部藏書逾五萬冊，所藏敦煌寫本、與巴黎國民圖書館所有並稱，所謂人間逸書，天壤瑰寶也。英人關於中國美術工藝品之蒐集研究，極爲努力，公私庋藏，頗多珍品。如相傳爲現存最古之中國名畫，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即經宋徽宗宣

和御苑清內府，以歸於大英博物館。皇家亞細亞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有司當東蒐集（Sir George Staunton Collection），倫敦傳道協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總會（L. M. S's Hause）有馬禮遜（Rev Rebort Morrison）之遺書，劍橋有威妥瑪（Sir Thomas F. Wade）之藏書。

英國刊行關於東方研究之定期刊物，重要者凡三：1.大英皇家亞洲學會會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 略稱 J. R. A. S.），爲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在倫敦成立之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總會機關誌，一八三四年（嘉慶十四年）七月創刊。對於印度學埃及學西亞學皆有重要貢獻，而探討中國研究西藏之論文，亦數見不鮮。該報初年刊四次，自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七月至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四月止之第一卷起，至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之第二十卷止爲初集（First Series），於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又改爲一年一卷制，並自此年起稱爲新集（New Series）之第一卷，洎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刊至二十一卷。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廢號卷名稱，改爲某年某月號，每期由皇家亞洲學會編行，2.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報（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latic Society 略稱 J. N. C. B. R. A. S.），刊載研究漢學之論文講稿雜俎等，創刊於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至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刊行兩卷，稱爲初集

，自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起，續刊新集，年出一卷，由上海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刊行。該會於公共租界博物院路有附設之博物館及圖書館，藏書萬册，擁會員六百人，爲英國遠東研究之中心組織，3.東方學院學報(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略稱B. S. O. S.)創刊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編輯及發行者爲英國倫敦之東方語學校，論文以英文爲主。

5. 俄羅斯

俄羅斯自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成立，卽與中國有正式國交。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我教士首次來華，於是北京有俄羅斯館，淸廷並於國子監附設俄羅斯學，以便俄人來京子弟讀書，內閣理藩院亦設俄羅斯學，以便八旗子弟習俄文，其傳佈希臘正教之傳道團，率十年更迭一次。自雍正初(1723)放逐西洋耶穌教士後，俄人在西人中，獨擅研究中國之便利。惟研究成績，以視耶穌會士，於質於量，大有遜色。留華教士外交官以漢學名者，有以下諸氏：

夏真特(Hyacinthe 1770—1853)生於教士家，少修學於喀山(Kazan)修道院。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三年)選爲第七屆赴華傳道團長，次年抵北京，習漢文甚勤，搜羅研究資料，以交遊猥雜，怠於教務，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被控歸國。次年任外交部亞洲司譯官，乃從容整理其研究資料。曾譯前漢書及中國史料多種爲俄文出版，又譯有蒙古最初四汗史

(History of the first four Khans of Mongolian empire)，蓋即元史中之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本紀也。

與氏同時有德人史密德（Isaac Jacob Schmidt 1779—1847）任俄學士院會員，習蒙語，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以德文著蒙古語文典（Grammatic der Mongolischen Sprache. St. Petersburg 1831），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成蒙德俄辭典（Mongolische-Deutsch-Russisches Wörterbuch, nebst einem deutschen und einen russischen Wortregister, St. Petersburg 1835），並註譯蒙古源流，所據原文視漢譯底本爲佳，譌脫亦少，蒙德文合璧，尤便對照，爲治史者所重。氏終老俄國，故可視爲準俄人也。

薩哈陸夫（Ivan Ilich Zakharov 1814—1885）一八三九（道光十九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留北京傳道團，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任聖彼得堡大學正教授，講滿洲語，著滿俄大辭典（Polnylj Man'jursko-Russkii Slowar'. St. Petersburg 1875）、滿洲語文典（Grammatika man'jurskago yazyka. St Petersburg 1876），至今爲此方面之權威著作。

後雅撒特三十三年，於中英鴉片戰爭中，隨俄國第十二屆傳道團至北京，其後以漢學名者，爲帕雷底阿斯（Kafaróv Palladius 1817—1878）。其父爲教士，學於喀山（Kazan）修道院，一八一〇年（道光十二年）來華，年二十三，留六年歸國。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

八年）率十三屆傳道團再蒞華，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歸國。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率十五屆傳道團三次東來，遊烏蘇里江流域，從事人種及考古學之研究。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因病歸國，卒於馬賽（Marseilles）途中。氏曾譯元朝秘史、長春眞人西遊記、皇元聖武親征錄、淸聖武記、張德輝塞北紀行等書；又註譯馬可波羅北遊記，介紹中土歷史文獻於歐人，爲俄人治中國宗教史之先導。其中俄大辭典於氏卒後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由福拉必安（Flavian）神甫爲之印行，收漢字一萬一千八百餘，並附各科專門名詞，爲溝通中俄文化奠基之作，後於馬禮遜之英華字典約七十年。

雅撒特、帕雷底阿斯均以留華教士治漢學，而白萊脫胥乃德（Emill Bretschneider 1833－1901）則以駐華使館醫士成業，亦一具異彩之學人也。原任職交通部；一八六六年（同治六年）以使館醫官赴任北京，迄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始歸國，留華凡十八年。研究中國植物及中亞之歷史地理，退休後居彼得堡，從事撰著。法國文學研究院聘爲通訊員，巴黎地理學會聘爲會員。歷史地理方面，有大秦國記（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the Arabs and the Arabian Coloni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mentioned in Chin 1898）、中國中古西行旅行家（Notices of the Mediaeval Travellers to the West 1875）、中世中西亞洲地理歷史（Notices of the Mediaev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ud Western Asia 1876）、馬可波

羅北遊記疏解(Elucidations of Morco Polo's Travels in North China, drawn from Chinese Sources. 1876)、東亞中古史料(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2vols. 1910)。植物方面之貢獻尤大，以所發見中國植物標本分贈於彼得堡植物園及歐西植物學家，至有以其名中國植物者。著有歐人初期之中國植物研究(Early Europi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London 1881)、中國植物學(Botanicon Sinicum 1892)、歐洲中國植物發現史(History of Europian Botanical Descoverlies in China 2vols. London 1898)等著。

十九世紀初葉以前，俄人之中國研究一以在華傳道團爲中心，或聘用他國漢學者。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始於莫斯科附近之喀山(Kazan)大學設蒙古語講座，以鮑波夫(Al. Vac. Popov)、柯瓦斯基(O. M. Kovalevsky)爲教授。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增設漢語文講座，任第十次北京傳道團團長達尼爾(Sivillov Daniil)爲教授，並由達尼爾之手以廣蒐漢籍。繼之者窩伊郝夫斯基(Vaihovskii)，乃曾參與傳道團之醫生。蒙漢文講座後移於彼得堡。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創東方語學校於海參崴，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增設東亞學院，由學士院派探險隊，深入新疆蒙古，調查發掘。東清鐵路則從事於北滿之調查研究，於是帝俄時代中國研究之機構略備。十九世紀末葉，大學教授之名漢學者有魏西里夫與伊凡諾夫斯基。

魏西里夫(Pavloritch Vasilev 1818－1900)學於喀山大學，研究佛教。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隨十二屆傳道團來華，留北京十一年，咸豐初(1851)返國，繼窩伊郝夫斯基任喀山大學滿洲語及華語教授。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轉職彼得堡大學東方學部，繼任部長。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任爲學士院會員。著中央亞細亞東部之歷史及遺址(Istorija i drevnosti vostocnoi Casti srednei Azii)，氏年八十二而卒。其在學術界活躍，凡半世紀之久，故聲華籍甚。著作多譯爲德文，惟以其學術上之極端懷疑主義，未能形成學派。二十世紀初之俄國漢學學風，承受法國沙畹之影響，反較氏爲多。

後魏氏三年逝世之伊凡諾夫斯基(A. O. Ivanovskii 1863－1903)，亦通漢滿蒙藏文，任教於彼得堡大學，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至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曾踏查東北，著有滿洲研究(Mandjurica 1894)。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蘇維埃新政權成立，關於東方學之研究，於列寧格勒有東方科學研研院，有東方現代語學校，於莫斯科有中國學院。初期仍多由帝俄時代之專門學者主持，如印度研究之名宿鄂登堡(S. F. Oldenburg)任物質文化學院院長，主持探險考古及博物館文獻之研究整理。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至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俄學士院曾派鄂登堡於新疆吐魯番焉耆庫車等地考古，著有俄羅斯土耳其斯坦探險報告，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復赴新疆考察，其後所得古器物文書，多藏列寧格勒之博物館圖書館等處。

土耳其學大師巴爾拖德（W. Barthold 1896—1930）授東方研究史於東方現代語學校，任東方學會會長，物質文化研究院副院長。著歐洲與俄羅斯之東方研究史（Istoriya izuchniya Vosteka v Europe i Rossii, izdanie 2-oe. Leningrad 1925），蒙古侵寇時代之土耳其斯坦（Turkestan down to Mongol Invasion.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2ed, London and Leyden, 1928）。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曾任彼得堡大學漢學正教授之伊鳳閣（A. L. Ivanov），則於十月革命後，隨蘇聯遠東全權代表越飛（A. Joffe）東來，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任駐華使館參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 發表西夏國書說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923,12）。

與氏同任彼得堡大學之漢學副教授阿里克塞夫（Vasilii M. Alexeif）則任職東方科學研究院，氏爲魏西里夫伊凡諾夫斯基卒後蘇俄之第一漢學者。於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卒業彼得堡大學東方學部，治漢滿蒙語，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得學位，遊學法英德，爲碩儒沙畹之入室弟子。曾數次渡華，從沙畹考古華北，治中國語文思想宗教，皆能深入。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由鄂登堡推爲學士院會員。著有聊齋志異譯註等書。

俄人之東方研究，自昔以西伯利亞、東北、蒙古、新疆之調查考古爲中心，西伯利亞則自十九世紀前半，俄羅斯學士院派遣多數探險家。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至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學士院派大探險隊，調查西伯利亞之極北及東部，以米登賓爾夫（A. T.

Middendorf 1815－1894）為隊長，其成績居十九世紀西伯利亞探險隊之首位，雖以自然史方面之研究為主，米登寶爾夫留意於地方住民之研究，收集多數雅庫特（Yakut）人通古斯人語言及民族文學之研究資料，著有西伯利亞極北及東部旅行記（Reise in den aussers-en Norden und Osten Sibiriens 1848－75）。

自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有學士院雪來克（Leopold von Schrenk 1826－1894）之科學的調查，其結果成黑龍江地方之旅行及調查（Reisen und Forshungen im Amur-Gebiet 1858－1895），其第三卷黑龍江地方之人民（Völker der Amurlandes），據民族學的調查，究明吉里迷（Giriyak）與通古斯族之差異，樹立新舊亞西亞族之概念。

自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至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東西伯利亞總督派蒲兒久瓦利斯基（Nikolai Mikhailovich Prjevaliskii 1839－1888）探險於烏蘇里地方，其結果成卓越之烏蘇里地方旅行記（Puteshestvie v Ussuriiskom Krae 1867－1869 G. S. Peterb-urg 1870）。

為語言學上之研究而實行調查西伯利亞之旅行中，最有名者，為芬蘭之卡斯特楞（M. A. Castren 1813－1852）之旅行（1845－1849），其研究成果發表通古斯語特性論（Gru-ndzüge einer tungusische Sprachlehre），始提倡分薩摩耶（Semoyed）語，芬（Huns）

語、土耳其語、蒙古語、通古斯語五羣之烏拉爾阿爾泰（Ural-Altai）語系說。關於芬語方言資料之外，更蒐集關於研究薩摩耶（Samyoed）人及土耳其人所需資料。其活動雖與俄羅斯學術機關全無關係，但所蒐資料則由俄羅斯學士院出版。

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俄羅斯地理學協會成立後，西伯利亞研究，歸其主持。五四年（咸豐四年）時，協會派探險隊於西伯利亞，以天文學者胥瓦爾斯（Schwartz）為隊長，不僅西伯利亞之天文學的觀測，並蒐集多數關於蒙古山岳河川之研究資料。自烏拉爾（Ural）至堪察加及白令海峽之西伯利亞全土調查，其後以協會之委託，屢屢行之。於地理學人種學語言學經濟學方面，皆有相當貢獻。

斯特貝（Leo Y. Sternberg 1861—1927）人種學者，關於東部西伯利亞造詣尤深，以政治運動，流放庫頁島，流謫期間，研究吉里迷（Giriyak）蝦夷（Ainu）與洛克（Or-okhos）之語言生活，著極東北庫頁島之旅行（A Journey to the Extreme North of Island of Saghalien 1895）。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得官憲許可，作黑龍江地方之研究旅行，蒐集民族法、考古學、人種誌學上之資料甚豐，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滿刑，歸彼得堡，與拉道羅夫（F. W. Radloff）盡力於學士院附屬之人類及人種誌博物館之創設。革命後，創人種誌學研究會，後合併於列寧格勒大學，任地理學人種誌學主任教授，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出席太平洋學術會議，赴日本東京，又舉行蝦夷調查，赴北海

道，著太平洋俄羅斯調查(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on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The Parific Russian Investigation 1026)、原始宗教豫言選(Devene Election in Primitive Religion 1926)。

關於東北，則十九世紀末，海參崴有東方語學校、極東研究所、博物館、黑龍江地方研究會，以爲研究之中心。革命後則蘇俄地理學會之海參崴分會最爲活躍。東清鐵路公司亦曾從事於種種調查研究。其最致力於通古斯民族研究者，爲前清華大學教授施祿國(Shirokogoroff)，著有滿族之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1924)、極東北通古斯族之移植(Northern Tunguses Migrations in the Far East, J. North Chin. br. 1926)、北通古斯族之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 of Northern Tungus 1929)等書。

哈爾濱博物館之特爾馬徹夫(V. Y. Tolmachev)調查札賚諾爾、海拉爾、顧鄉屯等石器時代遺蹟。並考查金上京會寧府遺址白城。於東北考古研究，頗多貢獻。著有滿洲之石器時代(Sur le páleolitique de la mandchourie [Eurasia septèntrionalis antiqua 4] 1929)等。

俄人之蒙古研究，其主要業績爲包德寧(G. N. Potanin)於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至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兩次探險，著西北蒙古概說(Ocerke Severo-Zapednoi Mo-

ngolii），記遊之外，廣羅蒙古考古學人種學民間文學資料，至今爲學人所重。

柯智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於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至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探險蒙古，於甘肅張掖額濟納河畔黑城（Kharabhoto），發掘西夏遺蹟，得漢藏西夏古文書，以解讀西夏文之辭典番漢合時掌中珠公於世界，使西夏文化得以闡明。氏又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在外蒙土謝圖汗塞楞格河上流，發掘秦漢時代匈奴人古墓二百餘座　得絨氈絹布漆器玉器黃金飾板等，著有北蒙古探險報告（Comte rendus des expéditions pour exploration du Nord, de la Mongolie 1925），究明西元前後王莽時代，匈奴貴族生活之狀況。

拉道羅夫（F. W. Radloff 1837－1918）則於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勘查亞德林潡夫（Jadrincev）於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所發現之鄂爾坤河畔之唐開元中闕特勤碑，予突闕文研究以曙光。著蒙古之突闕碑銘（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ie 1894），突闕碑銘之歷史意義（Die historische Bedeutung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1899）等篇。氏又發現蒙古故都喀拉和琳故址古碑，確定其位置在今鄂坤河上流右岸之額爾德尼招，皆歷史上之重要公案。

蒙古史之作者，以烏拉吉米素夫（Boris Jokovlevici Vladimirtsov 1884－1931）爲巨擘，著有成吉思汗傳（Chingis-Khan 1922），在現有成吉思汗傳中，爲最饒學術價值

者。其蒙古之社會組織——蒙古之遊牧的封建制度（Obshehestvennyi stroi Mongolov, Mongoliskii kochevoi feodalism 1934），係未殺青之遺稿，然其價值已為世所公認矣。

蒙古法制之研究，以黎亞扎諾夫斯基（V. A. Rjazanovskii）為最活躍，著有蒙古民族之習慣法（Obychnoe pravo Mongol'skikh Plemen [Mongolov, Burjat i Kalmykov], Vestnik Azii, 1923－4）、蒙古法習慣法歷史概說（Mongol'skoe pravo premushchestvenho obychneo istorcheskii ocerk 1931）、蒙古法之基礎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ongol law 1937）。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人之探險中央亞細亞，前後不下二十起，視各國為獨勤。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萬國東方學會開會於德國漢堡，拉道羅夫倡議各國協力探險中亞，於是組織中亞及遠東之歷史的語言的人種的探險國際學會（Associations international pour l'Expédition historique linguistique et éthnographique de l'Asie Centrele et d'Extrême-Orient），設總會於彼得堡，設分會於各國。

蒐集典籍，則列寧格勒國立圖書館，數量甚富，並有滿文蒙古文之寫本刊本。該市舊學士院亞細亞圖書館，由來甚古，駐北京俄羅斯使節於一七三〇年（雍正八年）時，得漢籍於耶穌會士，送歸故國，以後續寄，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達二百二部四百二十一冊，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中日書籍凡二千九百八十三冊云。他如列寧格勒大學、外交部亞細

亞局貯藏亦頗多。

雜誌之最主要者，爲學士院彙報(Izviestiya Akademii Nauk)，揭載多數關於東方學之論文。並蒐集其中關於東方學者，別刊亞細亞論纂(Aziatskii Sbornik)，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停刊，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復刊，發行新編(Novaya Seriya)第一冊。

6. 美利堅

美國完成獨立在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六年)，及釋奴戰終，統一南北之集權政府成立，已在十九世紀中葉(1865，同治四年)，收夏威夷菲利賓在十九世紀末(1898，光緒二十四年)，其注意禹域，視歐人晚甚。其國民尚科學重實用，於中國文獻歷史之研究，初極忽視。有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者，紐約人，本神學者，於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由公理會派來華布教，曾編刊中國寶庫(The China Repository)，乃由教會援助於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創刊廣東之月刊雜誌，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停刊。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至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爲美國駐華使館秘書，晉至代理公使。歸國後授中國語文於耶魯(Yall)大學，著華語字典及讀本等。其中國總覽(The Middle Kingdam 1848)一書，凡兩巨冊二十六章，敍述中國地理歷史人民政治文學社會藝術等概況，後由其子爲復刊，流傳甚廣，爲美人中國研究之見端。

於氏逝世之年(光緒十年)蒞華，亦以外交官貢獻於中國研究者爲羅志意(W. Wood-

vil Rockhill 1854－1914），費城（Philadelphia）人，學於法國，年三十來北京美使館，為二等書記官，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至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探險西藏，一九○五年（光緒三十一年）至一九○九年（宣統元年）為駐華公使，踏查蒙古，後歸國。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袁世凱聘為顧問，卒於火奴魯魯途中。前後留華十五年，研討梵藏文，於外交官生活之餘，撰著關於蒙藏研究論文、旅行記等，受英國地理學會獎章。譯註羅柏魯遊記（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Londen 1253－－55），又與夏德合譯宋趙汝适諸蕃志，（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1512. 有馮承鈞譯本，民國二十九年，商務版。）於中世紀東西交通，多所闡發。

與氏同時有費諾羅薩（Evnest Eenollosa 1853－1908）者，於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受東京帝國大學聘渡日，研究東方美術，歸宗佛教，協助岡倉覺三創立美術學校，留日八年，影響明治美術史極大。氏著有中國日本藝術史綱（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1912. ，有賀長雄譯註本，大正十年，東京刊）、以深邃之美學知識，闡明東方美術之特質，亦美國東方學者中一異彩。氏歐遊中病卒於倫敦，遺稿係由其夫人編訂刊行。

二十世紀初葉，正美國國力發展，一日千里之時，遠東研究之興味，日趨濃厚。是時法有沙畹、伯希和；英有翟理斯、斯坦因；德有米勒、哥隆維德，以中國考古、敦煌吐魯番之

發現，喧囂於世界。事事力爭上流之美人，乃始禮聘異邦學者，蒐集中國古物文獻，謀美國漢學之建設。

哥倫比亞大學之首任漢學教授爲德人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蒞任，供職十五年，年八十餘，終老於美。氏於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來華，年二十二，又三年（1870）始供職於中國海關，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至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任職上海統計局，公務之暇，兼治漢學。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至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聘爲總裁，前後留華二十五年，於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中西文化交通及繪畫源流，無不研討，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去職歸國。考狄之創刊通報，夏德曾爲文於創刊號。避地慕尼克（Munich），讀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內曼東遊所蒐、塵封已久之漢籍。其名作有中國與東羅馬（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爲研究中國與西亞細亞交通史傑作；其中國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y of China 1908. 西山榮久日譯本，張繼序，大正七年刊）。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印行，述由盤古至秦之統一，乃夏氏在哥倫比亞大學之講義，爲當時名著，氏又曾與羅志意合譯諸蕃志。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至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間與夏德同時主講東方學於哥倫比亞大學者有勞佛爾（Berthold Laufer 1874－1934）。氏生於德國科崙（Köln），

肄業於柏林大學，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得來比錫大學博士學位。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渡美，參預基索浦北太平洋探險隊（The Jesups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踏查庫頁島及東西伯利亞一帶。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來華，留長安數載，旋復入布拉克斯頓夫人探險隊（The Mrs. B. Blackstone Exp.），二次踏查我國西部及西藏高原，時爲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至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其後任職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歷主亞洲部人類學部，殫精研究著述，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隕樓而卒，年六十。氏通希臘、拉丁、西藏、西夏等語文，能讀漢籍，賅博與法之伯希和埒。關于考古學、宗教學、人種學、滿、蒙、藏文，皆有述作。其重要者爲中國古玉考（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1912），搜羅中國古玉，旁證博引，以考古方法詮釋古今玉之演進，以玉器爲中心資料說明中國古代文明與禮教發展。蓋欲從玉器之制溝通古代禮教所含之基本宗教觀念，闡發其對於政治思想關係，亦別開生面之作。漢代之陶器(Chihese Pottery of Han Dynasty 1909)爲陶器之系統研究，第五章揭明秦漢時代受西伯利亞藝術之影響，亦爲創解。中國伊蘭篇（Sino-Iranica 1918. 章鴻釗譯其金石部，並補證爲中國伊蘭卷金石譯證，爲地質專報乙種三號，民國十四年六月版。向達譯書中葡萄考及苜蓿考，刊自然界四卷三、四號，白壽彝譯波斯錦，刊禹貢四卷十二期），爲中西文化交通史上傑作，其書博大浩瀚，於中國植物金

石稱謂沿革，搜求中外記述，一名一物之微，詳加疏證，誌其出處始末，非曩之考證家，砙砙守一家言與一國文字者所能爲。此外有中國泥象考（Chinese Clay Figures 1914）、中國耶教藝術（Christian art in China 1910）、中國磁器起源考（The Beginnings of Porcelain in China 1917）、金剛石考（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1915）等著。

曾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教授者復有卡德（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氏於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來華，留十年，習語文，讀史乘，喜與學者周旋。歸國後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任教哥倫比亞，著有中國印刷術源來史（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 Its Spreal Westward revised edition 1931. 劉麟生漢譯本，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商務刊），以博學稱。

以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著名之德人衞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7—)亦張講筵於此校。氏有中國之經濟與社會（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a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ise einer grossen asiatischen Agrargesellschaft, 1931 有平野義太郎日譯本，中央公論社出版。）用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之研究方法，對亞細亞一大農業社會之中國，爲科學的分析。特別着重於其生產諸力，生產—流通過程，學術價值甚高。

耶魯大學有拉脫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 1884－）生於奧勒功（Oregon）市，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渡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爲耶魯歷史講師，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爲洗禮會牧師，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以後爲耶魯教授，著有中美之初期交涉（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New Haven 1917），中國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829）。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刊中國歷史及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2vols 1934. 有岡崎三郎日譯本，生活社刊），第一卷述先秦至現代史實，第二卷分述文化史各項，各章附西文參考書目，頗便初學，爲中國史入門書之名著。關於日本，有日本之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New York 1918. 有梁大鵬漢譯本，商務版）。

哈佛大學近年爲推進漢學研究，創設遠東語文科，由法國禮聘艾利塞夫（Serge Eliseeff）爲主任教授，授日本文學，以賈德納（Charles S. Gardner）魏爾（J. B. Ware）爲副教授，授中國文學史學，成立哈佛燕京學社，擁艾利塞夫爲社長。氏生於俄羅斯帝室御用商人家，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卒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後歸國。俄國革命後歸化法國，授日本文學於法蘭西學院，入美後，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創刊哈佛燕京學報，年刊四次，舉行大規模之漢英字典編纂，自爲監督。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旅行中國

，觀察哈佛燕京學社之合作學校與事業，爲學術界所注目。賈德納治中國史，著有中國舊史學（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1938），多取泰西學者論著，於劉知幾章學誠之書，未及論列，殆亦後起之英，銳意撰述，而其學尙疏者。

芝加哥大學之名漢學教授，爲馬克奈阿（Harly Farnsworth Mac Nair 1891－）學於哥倫比亞（Colonbia），得博士於加利佛尼亞（California），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主編中國評論週報（China Weekly Review），歸國後，任職芝加哥大學，著中國人之發展（The Chinese Abroad, 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 Shanghai 1924）、中國之新國家主義（China's New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 1925）、中國之國際關係（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Essays 1926）、現代中國史（Modern Chinese History, Shanghai 1923）、革命中之中國（China in Revolution, An Analisys of Politics and Militalism under the Republic. Chicago 1931）等，並與摩斯（H. B. Morse）共著極東之國際關係（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1）。

摩斯（Hosea Ballou Morse 1855－）美國駐華海關稅務司，中國經濟研究家，著一六三五年至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記錄（The Chronicl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5vols. Cambridge and Oxford 1926－1929）

，爲英國對華貿易，廣東澳門東京廈門寧波等地當時之貿易狀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之對華貿易及當時所起諸種事件之根本資料。中國之行會(The Gilds of China. London 1909），與英國之行會比較研究，研究行之宗教的方面，行之起源、資格、管理、收入；交易之之統制、統制力、旅商等，並包含會館、公所、牛莊汕頭廣東行商之研究，其比較研究，甚屬重要。中華帝國之國際關係（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vols. 1910）詳密研究葡萄牙人東來後至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中國之國際關係，爲中國近世外交史研究之一大傑作，分門爭時代(1830－60)屈服代時(1861－93）服從時代（1894－1911)三卷，據列強之外交文書，參考考狄(H. Cordier)等之研究，內容正確詳備，爲綜合的研究。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London 1921 Third edition）記政府之組織、性質、收入、支出、通貨、度量衡以及內外貿易等。

美國學術團體聯合理事會，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議決廣聘學者，迻譯漢籍，後得羅氏（Rockfeller）及克氏（Conegie）兩基金團之資助，經賈德納等議定，首譯漢書，聘德布斯（Homer H. Dubs）主其事。德氏治哲學，於吾國學藝用力甚勤，嘗譯荀子，並著有古代儒教之建設者荀子（Hsü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London. 1927）一書。其譯漢書，劃分爲五册，一册至三册爲諸帝本紀，四册譯班氏敘傳，兼評班書體例及諸註家得失，末册詮釋字義訓詁名物，名曰語彙。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

）首冊成，計高惠呂后文景諸紀共五卷，卷首有導論，卷末有附錄。聘華人爲助，由荷蘭漢學者戴溫達克爲之潤色，以王先謙補注爲藍本，更博採諸家之說，蓋沙畹譯史記後之偉大計劃也。

記美國漢學研究，有一不可不特別敘述之畸士，爲留華逾五十年之福開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4）氏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卒業於波士頓大學，次年（1887，光緒十三年）渡華。其後爲南京大學南洋公學校長，爲盛宣懷之秘書，爲端方黎元洪之顧問，爲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爲新聞報上海時報經理，縱橫活躍於中國社會各方面，以其餘力研究中國藝術，著中國藝術綜覽十冊，爲青銅器、石器、書法、畫集、玉翠、陶器、建築、家具、紡織品及其他藝術之探討。復有歷代著錄吉金目（二十八年一月，商務版）、歷代著錄書目（二十三年，南京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刊）、中國畫（Chinese Painting. Chicago 1627）、中國藝術大綱（Outlines of Chinese Art. Chicago 1919）。爲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秘書會長，爲該會會報編輯，主編中國雜誌（China Journal）。捐贈所收古物於古物陳列所，故宮博物院聘爲顧問，乃一精力絕人之學人。

高因（Herbert Henry Goweu 1864—）本英人，入美籍，神學博士，華盛頓大學語學教授，爲日本文化研究之權威者，歷任東方研究會長，紐約日本人協會會長等職。著有日本史綱（An Outline Histoiy of Japan 1927），爲日本史入門之名著。

美人之中土探險，先有本伯利（Raphael Pumpelly 1837－1923）於二十世紀初旅行華北華中中央亞細亞等地，於地質考古學多所論著。繼有安德魯（Roy Chapman Andrews 1884－）曾由安南入滇而出緬甸，更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夏入蒙古，次年返北京，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入陝西，分遣學者於各地，與北京地質調查所合作，調查四川古生物。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之蒙古高原探險，發見後期舊石器時代人遺跡。

美國以雄於貲，比年對於東方研究資料，蒐羅不遺餘力。紐約國會藝術博物館，波士頓（Bcston）美術博物館，費城（Philadelphia）藝術博物館，賓省（Pennsylvania）大學博物館及芝加哥（Chicago）堪薩斯（Kansas）等博物館，無不有中國繪畫古器物圖書，設東亞部，附研究室，從事於蒐羅探討。寶雞發見之銅禁禮器，易州之齊侯四器，均歸於紐約。曲陽崇光寺之隋大理石彌陀像，重二十噸，亦入於美。唐太宗昭陵六駿，其二陳於費城，乾隆之九龍圖、守作之觀音像，均入波士頓。名畫如江參百牛圖卷、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巨然烟江疊嶂圖、馬賁百雁圖卷等，均散見美各博物館中。私人如煤油大王羅克斐萊（Rockfeller）等，以貲本家而喜東方藝術，所集多精絕之品。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爲美國圖書館最大者，藏漢籍逾十三萬卷，並有滿蒙藏及朝鮮文書，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起聘華人爲東方學部秘書、編輯。此外各大學之漢學研究亦時聘華人導師，並獎勵留學生以中國資料撰著論文。哈佛燕京學社且以美國資力資助華人之國學研究事業。憑藉雄厚，朝氣彌

漫，駸駸乎有凌駕歐人之勢。

美國主持之關於東方之刊物如下：1.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略稱 H. J. A. S.）爲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所刊行之雜誌，創刊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由艾利塞夫、賈德納、魏爾等主編，年刊一卷，共四期，用英法文，內容分論著書評書報介紹等。2.美國東方學會會報（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略稱 J. A. O. S. New Haven）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創刊。3.東方藝術（Eastern Art 略稱 E. A.）費城（Philadelphia）大學藝術協會（The Collogе Art Association）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創刊。4.中國研究所會報（China Institute Bulletin）紐約美國中國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創刊，介紹中國主要雜誌之論文撮要，以備彼邦學者參考。5.中國雜誌（China Journal 略稱 C. J.），原名中國科學美術雜誌（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文學美術方面由福開森編纂，科學方面由蘇瓦畢(A. de. C. Sowerby）編輯，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創刊於上海，初爲兩月刊，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起改爲月刊，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始分一年爲二卷，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改上名。

7. 瑞典

瑞典於十九世紀初，有多桑（Baron Abraham Constantine Mouradgea D'ohsson 1780—1855）者，爲蒙古史研究家，善土耳其、阿拉伯、波斯諸語，著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z Khan jusqu'à Timour Bey ou Tamerlan. 4vols. Amsterdam 1852. 有馮承鈞漢譯本，田中萃一郎日譯本）充分利用波斯等西方資料，爲歐洲蒙古史研究之劃期大著，考証精密，紀載正確，迴無倫比，爲蒙古史研究家必備之書。含有多數根本資料，富史料價植，成吉斯汗及其以前之部分，含有不見於中國載記之資料甚多。

近年瑞典學者之活躍甚可注目。大旅行家地理學者斯文赫定（Seven Hedin 1865—）探險中亞，前後歷新疆境五次，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至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並與中國學術界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古於新疆甘肅蒙古等地，其旅行調查報告，譯爲各國語，風行世界。南西藏（Southern Tibet: Discoveries in Former Times Compared with my own Researches of 1906—1908. 1917—1922）一書，本文九卷，地圖三卷，凡十二巨冊。

地質學者安特生（John Gunner Andersson 1874—），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應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聘來華爲所員，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發掘遼寧省錦西縣沙鍋屯洞窟，調查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至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

）採訪甘肅各地古蹟，發現中國原始土器與彩紋土器，闡明新石器時代中國與中亞及西南亞文化關係。著有中國遠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Oct. 1913 P. P.1－68）、奉天沙鍋屯洞穴之遺蹟（The Cave－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 Palaentologia Sininca, Series D, Vol 1, Fas 1 Peking 1923）、甘肅訪古記（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1925）等書，氏留華將二十年，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歸國，爲瑞京四埰澳（Stockholm）遠東古物博物院院長，從事於蒐集品之整理研究。

治中國繪畫者有四埰澳大學教授西林（Osvald Siren），著北京之城與門（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London 1924）、五世紀至十四世紀之中國彫刻（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4vols. London. 1925）、北京之宮殿（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 2vols. Paris 1926）、中國古代美術史（Histoire des Arts Anciens de la Chine 6vols. Paris 1929－1932）。

瑞典漢學者中治中國語文者有高本漢（Bemhard Karlgren 1889－），久留禹域，於古音多所發明，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歸國，主東亞語文講座於哥德堡（Göteborg）大學，著有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 sur la Phonologu Chinoise, Arch. d'Et. orient.,

XV, 1915－1916)，中文解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chinese. Paris, 1923)，語言學與古代中國(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Oslo 1926)等。其論文多刊佈於通報亞洲學會會報，每一篇出，輒爲世人傳誦。吾國治語音學者甚重其書。陸侃如曾譯其左傳眞僞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Götebory 1926.)等論文三篇爲一書(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商務刊)。

瑞典王太子博雅好古，蒐羅中國古物，故其國庋藏埒於英法德俄。國都歷史博物館藏有斯文赫定所得古物。

雜誌有遠東博物院學報(Bulletin of the Muesum of Far Eastern Antiguities 略稱 B. M. F. E. A.)，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創刊，安特生(John Gunner Andersson)主編，爲北歐中國學研究之中心刊物。

8. 匈牙利

喬瑪(Alexánder Csoma de Käris 或作 Körösi Csoma Sandor 1798－1842)旅行家，現今西藏學之開拓者，一八二〇年(嘉慶二十五年)東遊，赴埃及，經中亞至西藏，習西藏語及佛教，一八五〇年(道光十年)至孟加拉，任職於亞細亞協會之圖書館，著藏英字典(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1843)，藏語文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1843)。

9 奧地利

維也納大學有羅安圖（Arthur Elder von Rosthorn 1862－）教授者，亦以漢學名。曾任奧國駐華公使，關于中國古籍批判之研究頗多。有中國史（Geschichte Chinas, Stuttgart－Gotha, 1913. Vol. 10 of Weltgeschichte in gemainverstandlicher Darstellung, edited by L. M. Hartmann.），中國勢力擴張史（Die Ausbreitung Darstellung der Chinesischen Macht, in südwestlisher Richtung bis zum vierten Jahrhundert nach Chr. Prague, 1895.）等書，爲奧地利之第一漢學者。

10 日本

日本明治初葉，治中國史者，讀十八史略、通鑑輯覽而已。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明治十九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創設史學科，德人黎斯（Ludwig Riess 1891—1928）受聘爲教授，與坪井九馬三同主講席，始以藍克（Lespald von Ranke 1795－1886）之史風，西洋近代之史學研究法，移植于日本；輔助學科之重要，演習（Ubungen）之實行，史學科國史科之一體化，均由黎斯指示，而得明確體認，坪井則担任史學研究法，指導後學。當時日人以國史、支那史、西洋史，鼎足而立，市村瓚次郎以漢文授支那史於學習院；那珂通世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至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刊支那通史五卷，亦用漢文，爲以西方體例著中國史之濫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年（光緒二十年、二十一年，明治二十七八年）中日甲午戰後，日人侵我愈急，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那珂倡議，中等教育設東洋史科，以與西洋史對立，宮本正貫之東洋歷史二冊，富山房版，實爲東洋史教科書之嚆矢。自是而後，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有籐田豐八之中等東洋史，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明治三十年）有市村瓚次郎之東洋史要，翌年有桑原隲藏之名著中等東洋史（有金爲漢譯本，光緒三十四年，商務發行。又山陰樊炳清譯，名東洋史要，二冊，有光緒二十五年，王國維序）。所謂東洋史者，卽以中國爲中心，說明東方諸國治亂興亡之大勢，與西洋史相對，爲世界史之一半。亦卽亞細亞之綜合的歷史也。

東京帝大史學會，成立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爲日本最早之史學學術團體，翌年十二月刋史學會雜誌，（明治二十六年改稱史學雜誌），關於中國史初期研究之重要論文，全部刋佈於此。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明治三十三年）萬國東方學會於羅馬開第十二次大會，坪井九馬三代表日本出席，提出白鳥庫吉著闕特勤碑文考、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二論文，爲東方學者夏德（Hirth）等所稱許，自是日本之東洋史學遂取得世界聯繫，當時東京帝大爲唯一之東洋史研究中心，玆觀其歷任主要講座：林泰輔（Tai-suke Hayashi 1854－1922），千葉縣人，治朝鮮史、金石甲骨及中國古代史，曾與白鳥庫吉展開古代史論戰。著有朝鮮史、朝鮮通史（有陳清泉譯本，民國二十三年，商務版）、朝

鮮近世史、周公及其時代。論文集支那上代之研究。那珂通世(Michiyo Naka 1881－1908），盛岡縣人。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至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刊支那通史五卷，漢文，止於宋代。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羅振玉翻印於上海，用爲教科書，嗣復補元明事蹟，改題爲歷代史略。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三年，昭和十三年）和田清譯原本爲日文。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明治三十六年）至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明治三十七年）校點崔東壁遺書，刊於日本。氏治中國通史，至元代，因資料缺乏，漸絕筆而專攻元史，由文廷式得蒙文元朝秘史（元朝秘史十五卷，不著撰人，有楊氏連筠簃叢書本，又葉氏觀古堂刊本，爲十二卷，淸李文田有元朝秘史注十五卷，光緒二十三年桐盧袁氏漸西村舍刊，又上海文瑞樓縮印本。），於是習蒙古滿文，廣參中西典籍，譯纂成吉斯汗實錄十二卷。別有論文集，名那珂通世遺書。市村瓚次郎（Sajiiro Ichimura 1864－），茨城縣人，研究中國古代史。著有東洋史統，論文集名支那史論叢。白鳥庫吉（本作倉吉，Kurakichi Shiratori 1865－1942），千葉縣人，主持東洋史研究機關，如東洋文庫研究部、滿鐵滿鮮地理歷史調查部、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曾以德文發表烏孫考於匈京東方評論雜誌，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大正元年）代表日本出席歐洲亞細亞學會，能多種語文，爲日本東洋史研究泰斗。著有論文百餘篇，論文集有西域史研究。藤田豐八（Toyohachi Fujita 1899－1929），字劍峯，德島縣人，清末受羅振玉聘，在上海農學

社譯農書，並曾任北京農科大學總教習；光緒二十三年王國維曾從之習日文；民七赴粵，主嶺南日報；卒後，羅振玉爲撰墓表。氏著有東西文涉史之研究、分西域南海二篇。箭內亙（Wataru Yanai 1875—1926），號尙軒，福島縣人，以研究蒙古史著稱。論文集名蒙古史研究（商務刋有陳捷陳淸泉所譯論文數種，名蒙古史研究、元朝制度考等），並著有東洋讀史地圖，爲世所稱。池內宏（Hiroshi Ikeuchi 1878—），東京人，以朝鮮史著，長於史料批判。著有元寇之新研究、通講（有錢稻孫漢譯）等，並刋行論文集滿鮮史研究。加藤繁（Shigeshi Kato 1880—），東京人，以治中國經濟史名，日本東洋經濟史學之開山者也。著支那古田制研究及經濟史論文多數，其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有僞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譯本），曾受帝室恩賜獎金。和田淸（Kiyoshi Wada 1890—），神奈川縣人，以東北史及中國近代史，爲世所稱。著明初之蒙古經略（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十三）、明初之滿洲經略（滿鮮地理史研究報告十四）等論文，其支那一書（岩波書店岩波講座東洋思潮之一），爲中國通史之權威名作。並補訂箭內所著東洋讀史地圖，刋有論文集東亞史論藪。原田淑人（Yoshihito Harada 1885—），東京人，以考古學名重於世。發掘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刋有報告。著有支那唐代之服飾、西域發見繪畫中所見服飾之研究、漢六朝之服飾、東亞古文化研究等。自文獻遺物二方面，考査古代文化。常盤大定（Daijo Tokiwa 1870—）字楷邱，宮城縣人。專攻中國宗教史，尤邃於佛教研究。仁井

田陞(Noboru Niita 1904－)，東京人，研究法制史，著有唐令拾遺、唐宋法律文書之研究、支那身分法史等書。鳥居龍藏(Ryûzo Torii 1870－)，德島縣人，現執教燕京大學，研究人類學考古學，爲鳥居人類學研究所長。著有由考古學所見遼之文化、契丹黑山黑嶺考(燕京學報二)等。關野貞(Tadashi Sekino 1867－1935)，新潟縣人，東洋建築史學者，曾主持朝鮮平壤樂浪古蹟之發掘，著有朝鮮美術史、支那之建築與藝術等書。伊東忠太(Chuta Ito 1876－)，山形縣人，研究中國建築，著有支那建築史(陳淸泉譯補爲中國建築史，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商務版，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一)。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京都帝國大學始設文科，次年九月，開史學講座，於是西日本之研究中心確立。內藤等爲西京東洋史學重鎮。內藤虎次郎(Torajiro Naito 1866－1934)，號湖南，秋田縣人，曾任大阪朝日新聞記者，主京都帝國大學講座十七年，前後遊華九次，工書畫，爲史料蒐集家，著書有支那論、清朝衰亡論等數十種，文百數十篇，其研究史學，頗受文廷式、陳毅之影響，與王國維、羅振玉等亦有往來。論文論集有讀史論叢、研幾小錄、東洋文化史研究數種。桑原隲藏(Jitsuzo Kuwabara 1870－1931)，福井縣人，任東京高師教師約十年，京都帝大教授二十一年，與那珂通世、白鳥庫吉並稱日本東洋史三大師。著有蒲壽庚之事蹟(有馮攸漢譯本，改題唐宋元時代中西交通史，民國十三年九月，商務版。又陳裕青補譯本，題蒲壽庚考，民國十八年，中華版，南京中

國史學會叢書之一）。最膾炙人口，曾受帝室獎金。以宋末泉州阿拉伯人蒲壽庚爲中心，論當時南海貿易交通。論文集有東洋史說苑、東洋文化史論叢、支那法制史論叢、東西交通史論叢數種。今西龍（Riu Imanishi 1875－1932），岐阜縣人，柯紹忞門人，以朝鮮史著。自文獻考古二方面研討朝鮮史事，著有朝鮮史之栞、新羅史研究、百濟史研究。濱田耕作（Kosaku Hamada 1881－1924）號青陵，大阪人，曾任京都帝國大學總長。盡力於科學的考古學之建設，舉不朽業績，促進日本東洋考古學之發達。著有東亞考古學、東亞文明之黎明（有張我軍譯，刋輔仁學誌二卷二期，又汪馥泉譯，黎明書局版，又孟世傑譯本）、東洋美術史研究等。矢野仁一（Jinichi Yano 1872－）山形縣人，爲著名之帝國主義學者。著有近代支那史、近代支那之政治及文化、近世支那外交史、近代支那論、支那近代外國關係研究、清朝史、現代支那研究、近代蒙古史研究、近代西藏史研究、滿洲國歷史等書。羽田亨（Tohru Haneda 1882－），京都人，曾任京都帝國大學總長，以研究西域著稱。著有西域文明史概論（有錢稻孫譯本，壽泉東文書藏，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印。又鄭元芳譯，民國二十三年，商務版）。岡崎文夫(Fumio Okazaki 1888－)，字煥卿，富山縣人。著有南北朝通史，首爲內藤虎次郎漢文序，謂其：「潛研乙部，夙曉義法，洽覽博稽，莫不折衷，而天數世道潛運默移之故，猶燃犀而燭照，可謂良史之才。」氏別有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亦名著也。梅原末治（Sueharu Umehara 1893－），大阪人，考古學者。著有戰國式銅器

之研究，殷墟出土白色土器之研究、漢以前古鏡之研究、歐美之中國古鏡、歐美蒐儲中國古銅精華等書。河南安陽遺寶、河南安陽遺物之研究，尤名於世。狩野直喜(NaoYoshi Kano 1868—)，熊本縣人，以經學名，著有支那學文藪。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二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受編述清國行政法之囑託，織田萬乃與同僚狩野直喜從事其業，編成清國行政法七冊(其第一冊有清國法學研究會譯本，光緒三十二年七月，清國留學生會館發行)，爲研究清史之重要參考書。小川琢治(Takuji Ogawa 1870—)，和歌山縣人。爲研究中國地理沿革者，著有支那歷史地理研究正續二冊。新城新藏(Sinzo Sinjio 1873—)，福島縣人，前京都帝國大學總長、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長。著有東洋天文學史研究(沈璿譯其論文爲東洋天文學史，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上海學藝社版)。新城與飯島忠夫均從天文學研究考訂中國古籍，大要飯島主張中國天文受西方影響，左傳乃僞書。新城則據天文史實，以證一部古籍之眞，謂中國二十八宿之定，先於印度天方，古代天文曆法乃華人自行發明。

東京私立早稻田大學於一九〇八年(光緒四年，明治十一年)九月始設史學科。私立慶應義塾大學於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明治四十四年)九月設史學科。比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大正三年)，歐戰勃發，日本經濟有長足進步，除東京京都兩帝大外，有東北(仙臺)九州(福岡)京城(朝鮮)臺北(臺灣)等帝大之增設，文科中大率設有東洋史學講座；

同時各私立大學亦相率昇格或增設文科，設立關於中國史之講座。裕仁之世，高師昇格，爲文理科大學，亦有史學科。東洋史之研究者，日以增加。早稻田大學之津田左右吉、朝鮮總督府修史官之稻葉岩吉等，皆東方學之大家也。津田左右吉（Sokichi Tsuda 1873—）東京人，治中國思想史，於秦漢時代，用力最勤。有左傳之思想史的研究、周官之研究、道教之思想及其展開、支那思想與日本諸作。稻葉岩吉（Iwakichi Inaba 1873—1940），號君山，新瀉縣人。治東北史，著有清朝全史（但燾譯，中華版）、滿洲發達史（楊成能譯）、朝鮮文化史研究、支那社會史研究。

日本對於漢籍蒐集甚勤，如宮內省圖書寮多宋元舊槧，且鑒別甚精。內閣文庫多小說戲曲，有宋元孤本。而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之成立，對於日本東方學研究之貢獻尤多。東洋文庫者，蓋源於英籍澳大利亞人莫利遜（Dr. G. E. Morison 1802—1920）之文庫。氏任倫敦泰晤士報通信員，一八六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以後，久居北京，蒐集研究東方問題之圖書雜誌地圖畫片，古今兼綜，細大不捐，爲研究東方問題各國文獻之總匯。一九〇〇年（宣統二年）左右，莫利遜文庫之名，已嘖嘖於各國東方學者之口。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莫氏辭泰晤士報通信員，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府顧問，欲出售其文庫，一八一八年（民國六年）遂以全部售與日本岩崎久彌男爵，凡書籍二萬四千冊，地圖畫片一千幅，包括英、法、德、俄、荷蘭、拉丁、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丹麥、波蘭、匈牙利、希臘、芬蘭

等各國東方撰著，而涉及中國者尤多。馬可波羅遊記多至四十餘種，此外，如明末以後歐西耶穌教士研究中國文物之報告論文，各國亞細亞學會、東方學會發行之學報刊物，以及各種可供參考之非賣品，應有盡有。岩崎以三萬五千磅得此文庫，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二年，大正十二年）成立東洋文庫於東京本鄉，並繼續蒐集有關典籍，派羽田亨攝取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illiot）在中國敦煌所發見之古代文書全部，蒐集中國全國方志家譜，舉辦東方學講座及展覽會，刊行東洋文庫論叢，成立研究部，文庫公開於有志研究之士，蔚爲日本東洋史研究之有力社團。靜嘉堂文庫，爲故岩崎彌之助男爵之私立文庫，取詩經大雅篇「籩豆靜嘉」之意命名，其始僅有十三經十七史等漢籍，後陸續搜求，稍有增益。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明治四十年）以十萬元收浙江歸安陸氏皕宋樓書入庫。陸氏名心源，字剛甫，號存齋，生於清道光十四年（1834），卒於光緒二十年（1894），夙究許鄭之學，尤喜顧亭林之書，故名其堂曰儀顧。心源曾備兵南韶，權總閩鹺，饒於財。時丁喪亂，藏書之家不能守，書賈奔赴網載以歸之，凡得書十五萬卷，爲皕宋樓、十萬卷樓，皕宋樓藏宋元舊槧，十萬卷樓收明後秘刻手校手鈔及近儒著述。別建守先閣，藏尋常刻本及鈔本之無異者。據島田翰靜嘉堂文庫略史，稱北宋刊本七部八十冊、宋刊本一百一十四部二千六百十一冊，元刊本百九部千九百九十九冊。有明後之遺書，有天壤之孤本。靜嘉堂文庫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大正十三年）改爲圖書館組織，復廣收朝鮮及日本古本，成立現

代圖書館於岩崎祖塋附近紅葉岡，公開於研究漢學者。

東方學或有關於東方學之重要刊物，有：1.東洋學報，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創刊，每年三期，自十一卷起，改爲每年四期之季刊，長篇鉅著，藉以刊佈；末附彙報，並刊歐美新書目錄。2.東方學報，日本以庚款一部，設立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於東京京都二處，分別設立研究所。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昭和四年）正式開院，擇定題目，從事研究，並刊行各種研究報告，其論文則別刊行東方學報，東京京都兩研究所分別刊行，不定期。3.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後藤新平伯爵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時，倣臺灣舊慣調查之例，以滿洲歷史地理之研究調查，委託白鳥庫吉。自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明治四十一年），白鳥即偕稻葉岩吉等數人，在滿鐵會社中歷史調查室內，開始研究，滿鐵所刊滿洲歷史地理二卷（民國二年、大正二年），即其研究之結果。關於朝鮮史地方面，亦由滿鐵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大正二年）刊行朝鮮歷史地理二卷。至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大正四年）一月，以其事業委託東京帝國大學。帝大即囑託箭內亙、池內宏和田清等，從事調查，一有所得，即由東京帝大發行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4.史學雜誌，東京帝國大學史學會發行，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創刊。5.歷史學研究，東京歷史研究會發行，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昭和八年）創刊。6.史林，京都帝國大學研究會發行，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大正五年）一月創刊。7.支那學，支那學社

發行，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大正九年）九月創刊。8.東洋史研究，東洋史研究會發行，季刊。9.青丘學叢，朝鮮京城之青丘學會發行，創立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昭和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昭和十四年）十月三十號終刊，爲研究朝鮮之重要刊物。

11 篇末附識

自海通以還，九州一家，環奇俊偉之士，競集其目光於東方，幾於國有作者，年有傳人，本篇所及，只其涯略耳。

（註一）關於近代漢學，參看：1.中法漢學研究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法國漢學，民國三十二年五月。2.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班，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自刊本。3.于式玉劉選民，一百七十五種日本期刊東方學論文篇目附引得，一九四〇年二月，哈佛燕京學社出版。4.石田幹之助，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昭和十七年六月，創元社出版。5.青木富太郎，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昭和十五年六月，螢雪書院出版。6.石濱純太郎，東洋學の話，昭和十八年四月，創元社出版。7.歷史學研究會，明治以後に於ける歷史學の發達，昭和八年二月，四海書房出版。8.歷史學研究會，滿洲史研究，昭和十一年三月，四海書房出版。9.岩村忍，支那關係歐米名著略解，昭和十五年，タイムス出版社出版。10遠藤元男、鈴木俊、原種行、田中正義，史籍解題，昭和十一年，平凡社出版。11池內宏、橋本增吉、濱田耕作、矢野仁一監修，東洋歷史大辭典，昭和十四年，平凡社發行。

12 S.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1917. 13 K. Inostrancev, Hun-Nu i gunnŭ. (Bibliogr. obzor teorii o proishozdenii naroda Hun-nu kit. letopisei, o proishozdenii evropeiskih gynnov, o vzaimnŭh otnosenijah etih dvuh narodov)——SPB, tip. kn. V. P. Mescerskogo, 1900, 日譯本：蒙古研究所譯，匈奴研究史，昭和十七年一月，生活社出版。14 H. Maspero 於 Revue historique 五十年紀念號 Histoire et Historiens depuis cinquante ans 所著 Chine et Asie centrale 之項 Paris 1927. 15 H. Maspero 於 Société asiatique 慶賀百年紀念冊 Livre du Centenaire 所著中國之部 Paris 1922. 16 倫敦 Ryoal Asiatic Socity 百年紀念冊 Centenary Volume. London 1923. 17 法國教育部編纂 La Science francaise. Paris 1916 第二卷所收 E. Chavannes, Sinologie. 18 O. Franke,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 Beiträge zum Verständnis der politischen u. kulturellen Entwicklungs-Vorgänge im Fernen Csten. Hamburg 1911 附錄 19 L. C. Goodrich,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XV, 1, Apr. 1931, PP. 62—77. 20 K. S Latourett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VI, 4, 1921; Vol. XXXV, 4, 1929. 21 E, C, Carter, China and Japan in our university curricula, Now York, 1929. 22 B. March,

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 Chicago, 1929. 23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4—08. 24 K. S.Latourette, 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2vols., New York, 1934. 25 M. S. Bastes（貝德士），西方東方學報論文舉要（An Introduction to Oriental Journal in Western Langues），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乙種之一，一九三三年四月。

（註二）關於莫利遜文庫及東洋文庫，參看：1.東方文庫圖書目錄（Catalogue of the Asiatic Library of Dr. G E. Morrison），大正十三年，日本東方文庫刊。2.東洋文庫十五年史，昭和十四年刊。

（註三）關於陸氏藏書及靜嘉堂文庫，參看：1.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2.島田翰，皕宋樓經籍源流考，武進董氏刊本。3.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秘籍志五十卷，昭和五年刊。4.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附錄靜嘉堂文庫略史。

參考書舉要：

一、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滙編，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民國十九年五月出版。
二、石田幹之助，歐人の支那研究，現代史學大系第八卷，昭和七年四月，共立社出版。

三、石田幹之助，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昭和十七年六月，創元社出版。

四、青木富太郎，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昭和十五年六月，螢雪書院出版。

五、後藤文雄，支那文化と支那學の起源，昭和八年六月，第一書房出版。

六、岩村忍，十三世紀東西交涉史序說，昭和十四年九月，三省堂出版。

七、池內宏、橋本增吉、濱田耕作、矢野仁一監修，東洋歷史大辭典，昭和十四年，平凡社發行。

八、Sir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New Edition by H. Cordier. Vol 1: 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 London 1915.

九、V. Bartol'd (W. Barthold) Istoriya izucheniya Vosteka v Europe i Rossii, izdanie 2-oe. Leningrad 1925. 德譯本 Die geographische and historische Erforschung des Orient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ussischer Arbeiten Aus dem Russischen übersetzt von Dr. E. Ramberg-Figulla.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Erd-und Kulturkunde, VIII), Leipzig 1913. 日譯本：外務省調查部譯，歐洲殊に露西亞に於ける東洋研究史，昭和十四年六月，生活社出版。

十、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d. I. Berlin 1877. (II. Abschnitt: Entwickelung der Kenntniss von China.)

十一、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 from the Eariest Times to 1800. London 1931.

十二、Richard Henning, Terra incognitae. B III Leiden. 1938.

十三、Sir Percy Sykes, The Quest for Cathay. London. 1930.

十四、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4—08.

十五、T'oung Pao 通報。

本书根据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1月版影印

汉学发达史

莫东寅著

上海书店 影印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1/2 插页 1

1989年 3 月第一版 198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

ISBN 7-80569-006-5/C·1

定价 2.60元

封面设计：黄　穗

BN 7-80569-006-5/C·1

定价：　2.60 元